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關向光博士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large, faint watermark of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ogo. The logo is circular with the university's name in Chinese characters '國立政治大學' at the top and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t the bottom. In the center is a stylized emblem with the characters '政大' (Chengchi University) inside a cloud-like shape.

中共軍事路線的轉變—
黨內鬥爭所扮演之角色 (1949-1976)

研究生：黃宇松

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

謝 辭

熬了近四年才畢業，不知已聞幾次「你何時要畢業」這詞，真是聽到耳朵都快長繭了，如今終於要畢業了，開心之餘，不免有些感傷，面對著不確定的未來心裡的徬徨可想而知，畢竟學生與出社會本來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性質，加上這幾年的情況……，實在不願多想。

在東亞所近四年的歲月中，除了給我知識上教導，也給了我之前未嘗試過的各種經驗；這些事務，是當初決定要考東亞所時所未想到的，事後回想當初要考東亞所的決定，其實是一個蠻莫名的過程，莫名的決定要考、莫名的準備、最後莫名的考上。家人對於我考上這個從名稱上完全看不出來在幹啥的研究所，仍願意支持我完成這項學業，並在碩班初期給予物質上的援助，這些都令我滿懷感激的，爸、媽、大哥、兩位姐姐，感謝你們的全力支持。

老師部份，第一個要感謝的是我的論文指導：關向光老師，在我寫這本論文毫無頭緒的時候，老師給予我一些寫作靈感與方向，讓我不斷地突破寫作上瓶頸，最終得以順利寫完這本論文，而老師細心且耐心的閱讀我的論文，使得這本論文得以字句流暢，將錯別字的情況控制在最小的情況；此外老師對於課業外的關懷，也讓我感到溫馨。兩位口委施哲雄老師與丁樹範老師，在口試過程中提出很多有益的意見，同時給予我鼓勵，使得這本論文能夠有更好展現。所上其它老師：邱坤玄老師與魏艾老師，除了課業上的指導外，平常時候對於學生問候、關懷，這些都讓我在東亞所的歲月裡備感溫暖。

另外要感謝三位工作上的老闆：吳得源老師、張執中老師與董立文老師。在三位老師的帶領下，讓我學習到做學問的態度與方法，三位老師也都藉由碰面的機會多次講解做人處事的道理，並對我的生活近況予以關心，您們的關懷與教誨我會勞記在心的。

所上助教張姐，是我必須報以十二萬分謝意的人。在東亞所的這段時間裡，張姐對我的照顧是難以用文字形容的，雖然你總是以「我幫你很多忙」來回應你對我的照顧，但是你對我的幫忙，以及對我的信任，使我能夠更順利的完成學位，真的非常感謝你。

揪甘心的雅鈴學姐，在學業與生活上給我的提點與幫助，讓我在所上的求學歲月能夠順利，雖然有時你會變身為「壞心」的學姐，但我還是會懷念與你一同去買星巴克和剖析各種大小小事的日子，這些東西將是永恆的回憶。總是笑的很詭異的文翔學長，大家都說你是個很機車的人，我認為……哈，那段差點凍死在新疆天山的經歷，想必你我永難忘；也感謝你幫我在中研院借書，使得這本論文內容得以充實，真的很感謝你。我心目中的永遠正妹于蓁學姐，很訝異能跟你變得這麼熟且無話不談，你在某些地方給我的提點我會銘記於心的。

大學系出同源的國書、為元、振諭三位學長，在我要準備考東亞所時給我在讀書的方法與考試技巧的指導，使我能夠順利考上東亞所；在我剛進來就讀，台北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介紹許多人事物與打工機會，使我得以站穩陣腳，謝謝你們的照顧。忠信學長將許多珍貴書籍移轉給我，使我的論文資料能夠詳實，給我很大的幫助。

長期窩在所辦的結果，讓我認識許多學長姐，阿sir學長、欣潔學姐、敬智學長、顧霈學姐、張廖學長、心儀學姐、欣儀學姐、偉峰學長、意植學姐、信成學長、孟達學長，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無法一一具名，但你們對我的關心，是我成長的動力。

與我同在一起奮鬥的東亞所第四十屆同學們，很高興能和你們一起讀書、一起歡樂、也一起畢業，雖然我們相處的時間並不長，然而大家一起同甘苦、共患難的結果，卻使得我們更加緊密連繫在一起。我的好搭檔政泰，在你領導下的各項活動，你都能夠想辦法利用現有資源使命必達，也能有效帶領我們完成一個又一個艱難的挑戰，在你領導下的我始終是心情愉悅的。另一個戰友學典，我們也一起經歷各式挑戰，我們一起緊張過、生氣過、抱怨過，但最終總能安全下莊，這些經驗也都將留在我的腦海中。家銘，你是我第一個認識的班上同學，你對每個事務的專注是我一直要努力學習的。阿姐雅妃與玫今，一起走絲路的旅程是一個相當難得的經驗，這段旅程也會成為一個難忘的回憶。

彥榕、聖紘、聖琳、毅陽、勁垠、欣秀、育伶、易穎、俊傑、兆崑、千瑛、姿秀、瑞婷，與你們一起相處的日子雖然不長，但這些求學時代的回憶將會是我們的集體記憶，在十幾二十年後重新聚首，將會是很好的共同話題。

大學的好友黑毛，謝謝你的一路上的鼓勵，以及幫我搜尋資料，我才能得以順利畢業，而其它好友老余、哈利、帥哥、花蓮人、小比克、盈秀、興恆、老人，在我剛來台北人生地不熟狀況下，偶爾聚會吃飯，讓我不會覺得「台北沒朋友」，哈！

夜半寂靜，在寒冷的夜晚寫完這份謝辭，代表著我的碩士生涯正式結束，即將航向未知的未來，突然想到《隱形的翅膀》這首歌末段部份：

我終於 看到 所有夢想都開花
追逐的年輕 歌聲多嘹亮
我終於 翱翔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裡會有風 就飛多遠吧

希望我能乘著這個風，飛得更遠吧！！

2010.01.16 凌晨 1 點
于指南路二段 77 巷 3 號 3 樓

摘要

中共自古田會議之後明確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在黨軍一體的情況下，中共的黨內鬥爭或多或少地對軍隊造成影響；也因為黨與軍隊高階領導人存在著「雙重菁英」的身份，軍隊往往被捲入黨內鬥爭之中，這都為中共的軍隊建設造成深遠影響。而中共建國後為改善軍隊長期存在的山頭主義、游擊氣息，致力於軍隊管理、訓練納入統一的制度下；同時 1950 年中共參與韓戰，體驗到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運用現代武器所帶來的震撼。這些狀況都讓中共開始思考開展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問題。此外，革命化的建軍路線，並未隨著共軍開展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而被揚棄，政治工作仍是共軍建軍路線的重要環節。因此毛澤東時期共軍的軍事路線，呈現出現代化、正規化、革命化三者並行的現象，但這三者比例，隨著彭德懷、林彪與葉劍英先後主掌軍委日常工作，而有不同的偏重。

關鍵字：共軍軍事路線、黨內鬥爭、雙重角色菁英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2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11
第四節 研究架構.....	12
第二章 黨內鬥爭	15
第一節 黨內鬥爭的性質.....	15
第二節 建國後黨內鬥爭.....	20
第三節 黨軍關係.....	31
第三章 邁向現代化、正規化時期（1949-1957）	35
第一節 建國初期的軍事建設.....	35
第二節 軍隊正規化與四大制度確立.....	44
第三節 內外環境對中共軍事路線的影響.....	51
第四章 在正規化與革命化之間擺盪（1958-1965）	59
第一節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正規化的衝擊.....	59
第二節 革命化的建軍走向.....	74
第三節 持續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	81
第四節 正規化與革命化兼容下的矛盾.....	89
第五章 文革的建軍方向（1966-1976）	93
第一節 軍事正規體系的破壞.....	93
第二節 文革的建軍路線.....	103
第三節 軍隊的重新整頓.....	109
第六章 結論	117
參考書目	127
壹、中文.....	127
貳、英文.....	135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毛澤東曾言：「槍桿子出政權」，這句話可解釋中共戰勝國民黨而取得政權最關鍵因素。軍事的重要性從中共建黨三年後即創立軍事部可以看出來，¹但一直到八一南昌暴動後，中共才擁有自己的軍隊，這也才出現軍事路線的制定問題。

中共建軍以來，始終強調著「黨指揮槍」的原則，一直到現在，「支部建立在連隊之上」的原則仍舊存在，也因為黨與軍隊的緊密結合，導致軍人高度參與黨內事務，同時在黨國一體的情況下，軍人對於政府運作亦有相當影響力，尤其是毛澤東主政時，權責劃分不清，加上中共是以武力取得天下，開國元勳大多具軍事背景，更使得軍隊在中國政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與西方民主國家強調的「軍人中立」有相當大的差距。然而共軍對於中共黨務、政務究竟發揮多少影響力？是否能將中共政治劃歸為軍人當政呢？

中共建黨後，其內部出現多次的權力鬥爭，鬥爭的結果均造成最高領導階層更替，在毛澤東正式被定於一尊前，被鬥爭下來的中共領導人，無不是被冠上「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毛在一次談話也指出中共自建黨以來存在著 10 次「路線鬥爭」，²但郭華倫曾指出，「中共的路線鬥爭基本都可看成是權力鬥爭」³。然而不論是權力鬥爭或路線鬥爭，在中共內部出現衝突時，軍人往往是不容忽視的力量，而且在共產國際對中共的影響力日漸式微與國民政府加緊對中共的軍事攻擊下，軍隊地位與重要性的提升使其在黨內鬥爭中日益重要。在軍隊捲入黨內鬥爭後，對於中共的建軍路線造成何種影響？除了「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外，中共對軍隊的角色認定、戰略戰術的制定執行與建軍方向，隨著時、地、人的轉變而有不同的型態出現，在此前提下，黨內鬥爭必然會出現軍事路線的變化嗎？這兩者之間的關連性為何？這是本研究想去探究的。

¹ 王志嵩，〈中共中央軍委會變遷之研究（1949-1976）〉（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2006），頁 8。

² 江山主編，《共和國檔案：影響新中國歷史進程的 100 篇文章》（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頁 355。

³ 郭華倫，〈論中共之派系〉，《匪情月報》（臺北），1979 年第 22 卷第 2 期，頁 9-10。

貳、 研究目的

本論文主要探討的焦點是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對軍事路線的制定造成什麼影響。軍隊的掌握與否一直是中共黨內鬥爭能否勝利的關鍵，而在鬥爭達到高峰時，指責敵對一方犯下「機會主義」路線錯誤是最常見的手法，由於中共在蘇維埃時期需面對國民政府發動的圍剿戰爭，軍事指揮是蘇區領導人的主要任務之一，故在「機會主義」錯誤內容上，往往將被指責的一方所推行的軍事路線看成是錯誤的代表而加以推翻，而以自身意識型態為基礎的軍事路線代之；一直到中共建國後，隨著黨內形勢的變化，亦牽連著軍事路線的制定與發展。故在談到黨內鬥爭時，不應將軍隊因素排除在外。

本論文研究的時間點是從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共建國開始，一直到毛澤東去世，將近 30 年的歲月中，中共軍事路線的發展為何，而如何成為中共黨內鬥爭各派系打擊對方勢力的武器，而這又造成軍事路線在各時期出現何種變化？它又對中共黨內派系在進行鬥爭時提供多大資源？但要注意的是，派系鬥爭時，往往將敵方論點簡單化，並將這一簡單化後的概念指為敵方錯誤的論據，如林彪代表著革命化建軍路線，彭德懷則作為支持軍隊現代化的標桿。因此在論述黨內鬥爭與軍事路線關連性時，本論文會希望經由釐清這點，而探討將這種簡單化論點帶入黨內鬥爭的企圖，它背後所隱含的動機與目的為何。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兩岸自 1949 年後呈現分治狀態，彼此間的劍拔弩張加強了國內對於中共軍事研究的興趣；而對美國來說，即使在建交後，中國崛起的態勢，使中共成為美國在未來的霸權上潛在敵人，故加強了有關軍事相關研究。對於中共軍事，無論是台灣或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學界，重點大多擺在共軍軍事戰略規劃以及中共獨特的黨軍關係上。本研究的重點在於討論黨內鬥爭對軍事路線的影響，實際上便是黨軍關係的另一種討論。

壹、 文武關係研究的萌芽

在討論中共的黨軍關係前，應先對軍人與社會（或文人）的關係有所認識，此關係即為「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何謂「文武關係」？學者們在討論過程中對此有不同的解讀。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軍人與國

家》一書中指出：「文武關係的主要焦點是軍官團和國家的關係」，⁴意即軍事領導菁英與政府間的關係。郭末塔里斯(George A. Kourvetaris)和杜布雷茲(Betty A. Dobratz)則將文武關係理解為「武裝力量與社會」的關係。⁵國內學者洪陸訓則認為文武關係應是：「武裝力量的組織和成員與社會的組織和成員之間的關係；……在此意義上的『文』(civic)，不僅指狹義上的文官或文人政府，而且是指廣義上的平民或民間社會」。⁶依據研究目的與對象不同，在文武關係討論上，各學者的看法有相當大的出入。

西方國家對於文武關係的研究起於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德米特(Karl Demeter)的《德國軍隊與軍官》與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的《衛戍國家》(The Garrison State)可為代表，同時此一時期的研究群體，社會學者多於政治學者，研究著重在軍人心理行為與小團體的研究上。⁷

貳、西方軍事專業主義的論述

到了1950年代末，杭廷頓《軍人與國家》一書的問世，才奠定文武關係研究的基礎，書中闡述的「軍事專業主義」(military professionalism)成為日後學者討論各國文武關係、軍隊角色及影響力的主要分析模型，其核心概念即透過軍事專業主義來達成文人治軍，在客觀上培養軍人專業主義，服從文人領導(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在主觀上擴張文人權威、掌握軍隊(su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⁸但是杭廷頓從西方社會形成的「文官至上」的角度做出的「軍事專業主義」論點，在套用到第三世界國家與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上時出現格格不入的情況，這是因為其它國家政治文化與西方觀念差異所造成的結果，但卻不損「軍事專業主義」作為一種理論的價值。同時期的簡諾維茲(Morris Janowitz)亦從軍隊「專業化」的角度出發來探討文人治軍，但與杭廷頓主張的軍人中立之「軍事專業主義」不同的是，簡氏不認為軍人與社會完全分離，反而認為應從政治—社會的角度看待武裝力量與文人政府的互動，換言之，軍隊與社會是息息相關的。⁹

⁴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3.

⁵ 轉引自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2002)，頁7。

⁶ 洪陸訓，《武裝力量與社會》(台北：麥田，1999)，頁386。

⁷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2002)，頁58-59。

⁸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pp. 80-84.

⁹ 譚瑞茂，〈我國的文武關係與政戰制度〉(臺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21-22。

參、 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

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研究，主要圍繞在兩個社會主義大國—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討論。由於共黨國家以黨領政的結果，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事實上就是黨與軍的關係。1950年代西方學界在研究共黨國家途徑上，主要是採取極權主義模式，而對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進行分析上，亦受到極權主義模式的影響，¹⁰因此歐登姆（William Odam）的「機構和諧途徑」（institutional congruence approach）假定蘇聯黨軍關係是一體而非分離的，黨軍衝突可被視為黨內衝突，¹¹這個概念後來成為波爾穆特（Amos Permuter）論述「雙重角色菁英」途徑的基礎。

與此相反，科考維茲（Roman Kolkowicz）有不同觀點，科氏認為蘇共與蘇軍的關係是傾向於衝突，在 *The Soviet Militar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一書中他充份闡明這個觀點，這類觀點被稱為「利益團體途徑」（interest group approach）或機構衝突模型（institutional-conflict model），他更認為這種衝突「給蘇聯政治帶來長期的威脅」。¹²

在解釋蘇聯文武關係常用途徑中，除了上述的兩種外，還有科爾頓（Timothy Colton）的「參與模式」（participatory model），雖然在黨軍關係上科氏同歐氏抱持同樣觀點—蘇聯黨軍模式是相互合作的，但不同於「機構和諧途徑」，科氏更強調軍人的政治影響力及其參與軍事決策部份，黨會試圖去滿足軍隊的利益，黨軍關係是一種同盟關係，軍人在取得參與相關決策和獲得希望的利益後無意去推翻黨的領導。¹³

肆、 中共黨軍（文武）關係之研究

回顧西方文武關係理論的發展過程，自杭廷頓開啟西方研究文武關係的熱潮後，大多數的理論均以文武對立的假定展開，也正因為如此，共黨國家獨特的黨軍一體化模式，特別是像中共這種透過武裝鬥爭而成立之國家，要套用西方的文武關係分析架構時往往差距甚大，故大多數學者建立自己的架構時，往往將共黨

¹⁰ 洪陸訓，〈中共文武關係研究途徑之探討〉，《東亞季刊》（臺北），1995年第26卷第4期，頁84。

¹¹ William Odam, "A Dissenting View on the Group Approach to Sovie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4, July 1976, pp. 542-567; 譚瑞茂，〈我國的文武關係與政戰制度〉，頁29-30。

¹² Roman Kolkowicz, *The Soviet Military and Communist Par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¹³ Timothy Colton, *The Party-Military Connection: A Participatory Model*, in Dale R. Herspring & Ivan Volgyes ed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System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8), pp. 53-75.

國家排除在外。¹⁴此外，蘇聯與中共雖同為共產主義政體，但中共「槍桿子出政權」的特殊歷史背景，導致軍隊勢力、地位在中共黨內始終佔有一席之地，這與蘇聯情況是不太相同的，因此有關中共的文武（黨軍）關係研究，雖有部份借用了蘇聯文武關係的理論與研究模式，但在借用的同時，西方對於中共黨軍關係的研究，也逐漸脫離蘇聯模式的套用，而發展出多種解釋途徑。

在中共文武（黨軍）關係之研究中，西方學術界主要分成兩大途徑：「軍事專業化模型」與「派系主義」，此外還包括「黨控制」途徑與「雙重角色菁英」途徑等。

一、「軍事專業主義」途徑

1949 年中共建國後，隔年隨即捲入韓戰，中共在內戰中所採行的「人民戰爭」戰略在美軍優勢武力下受到相當大挑戰；同時建政後蘇聯開始大量援助中國，藉由蘇聯幫助，中共軍隊開始朝現代化、專業化方向前進。岳飛（Ellis Joffe）與詹克斯（Harlan W. Jencks）認為雖然共軍並非全然是專業者，但是共軍走向現代化的道路最後是朝軍事專業主義方向前進。¹⁵岳飛以杭廷頓的軍事專業主義出發，在其兩本專著 *Party and Army: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Chinese Officer Corps, 1949-1964* 與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提到，1950 年代彭德懷領導的解放軍現代化，造成中共黨內出現了「紅」「專」辯論，彭德懷的「罷官」，林彪在軍中推行的「突出政治」讓共軍朝向革命化、政治化角度傾斜；然而在毛澤東去世後，軍隊逐漸從政治活動脫離出來，軍事訓練逐漸受到重視，強調專業更甚於革命，最後他認為 1985 年的軍委擴大會議是共軍退出政治的關鍵點，軍人對中央決策機構的影響力也大幅減低，雖然軍隊元老的非正式影響力仍然存在。¹⁶詹克斯也與岳飛看法相同，他運用科考維茲分析蘇聯黨軍關係的架構，提出專業化與現代化的關係其實相當密切，這種出現在蘇聯的情況在中國也同樣適用，中共的科技發展會將帶來軍隊的專業化。¹⁷

「六四」事件，中共高層悍然以軍隊鎮壓示威學生，這使得西方學者重新檢討中共黨軍關係，以及軍隊的專業化是否能持續。詹克斯認為「六四」時並沒有出現軍隊分裂的情況，軍隊仍服從於上層命令而行動，然而「六四」可能消蝕鄧

¹⁴ 洪陸訓，〈共黨國家文武（黨軍）關係的理論與研究途徑〉，《共黨問題研究》（臺北），1994 年第 20 卷第 8 期，頁 28-29。

¹⁵ Thomas J. Bickford, *A Retro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 Since 1979: What Have We Learned? Where Do We Go?* in James C. Mulvenon & Andrew N.D. Yang, ed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 Retrospective on Chinese Military Studies in the Post-Mao Era*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1), p. 7.

¹⁶ Ellis Joffe, *Party and Army: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Chinese Officer Corps, 1949-196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Ellis 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¹⁷ Harlan W. Jencks,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1945-1981*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2), pp. 25-31.

小平自 1980 年以來致力於軍隊專業化的成果。¹⁸但是毛文杰 (James C. Mulvenon) 則在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Senior Chinese Officer Corps: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提出數據，即中共軍官的教育水準比之前更高，教育內容也變得強調技術知識與軍事理論而非意識型態，共軍內部技術專門化也正不斷增強。¹⁹ 李成與白霖 (Li Cheng & Lynn White) 也與毛文杰觀點相同，即共軍功能分化現象日益突顯，但是共軍軍官教育程度日益提升，意謂著軍官的連繫網絡以「校際連繫」 (School Tie) 取代了傳統野戰軍為主的分類。²⁰

二、派系途徑（又稱「野戰軍」途徑）

派系主義途徑長期地被香港與台灣學者所運用，它強調解放軍內部存在著個人網絡與派系聯盟，個人網絡決定每個人的仕途起落、政策制定，甚至黨軍互動。²¹ 在共軍的派系研究中，有些學者是以世代經驗作為劃分的基礎，它以特定的經驗作為劃分派系的依據，如惠策恩 (William W. Whitson) 將解放軍分成五個野戰軍為基礎的派系，這幾個派系都保有其獨立性，在某一野戰軍所佔有的領域中其它派系的人馬很難有效發展，尤其各大軍區成員甚少大規模跨區調動，這讓地方軍人得以發展並鞏固其權力基礎。²² 這解釋了文革時期，以林彪為首的「四野」將領獨大情況；1973 年毛澤東命令「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意在防止地方軍人長期佔領一方進而威脅到中央。²³ 鄧小平上台後，則代之以「二野」為主的將領，在 1988 年恢復軍銜制時，鄧小平所任命的 17 名上將中，有 6 人出身「二野」系統，為各派系中人數最多，²⁴ 這為鄧小平穩定軍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小派瑞許 (William L. Parish Jr.) 同樣以世代作為派系劃分方式，但他認為惠策恩的五個野戰軍模型在解釋 1967 年後的派系行為會有所侷限，因此在 *Factions in Chinese Military Politics* 一文中即以 1967 年作為分界線，作為中國軍事政治的派系模型。²⁵ 尼爾森 (Harvey W. Nelsen) 的派系模型則建立在地方與主要部隊的對立之上，在 *The Chinese Military System: An Organizational Stud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一書中詳細介紹共軍從中央到地方有關組織、軍隊訓練

¹⁸ Harlan W. Jencks,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 in China: Tiananmen and After,"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y/June 1991, pp. 14-29.

¹⁹ James C. Mulvenon,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Senior Chinese Officer Corps: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97).

²⁰ Li Cheng & Lynn White, "The Army in the Succession to Deng Xiaoping: Familiar Fealties and Technocratic Trends," *Asian Survey*, Vol. 33, No. 8, Aug. 1993, pp. 757-786.

²¹ Thomas J. Bickford, *A Retro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 Since 1979*, p. 3.

²² William W. Whitson,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71* (New York: Praeger, 1973).

²³ 李谷城，《中國大陸政治術語》（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頁 33。

²⁴ 鄭義，《中共軍頭點將錄：與國軍對峙的 42 名悍將》（台北：開今文化出版，1996），頁 20。

²⁵ William L. Parish Jr., "Factions in Chinese Military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6, October 1973, pp. 667-699.

等狀況，他認為地方與主要部隊的對立表現在 1967 年的武漢「七二〇事件」上。

26

派系主義途徑在中共處於低度制度化與高度政治不確定性時期較具解釋力，然而在改革開放以後，這個途徑的解釋力便大幅減低，畢克福特 (Thomas J. Bickford) 甚至認為用野戰軍或其它派系模型作為研究 1980 年代中共文武(黨軍)關係是一條錯誤的途徑，反而專業主義模型在解釋上較為充分。²⁷「六四」事件後，派系模型重新被西方學者所重視，畢克福特認為有兩點原因：第一，派系是理解中共如何決定使用武力鎮壓的重要因素；第二，「六四」事件之後，解放軍內部形成以楊尚昆與楊白冰為首的「楊家將」勢力。²⁸

此外，史溫 (Michael D. Swaine) 是 1990 年代強調以派系因素研究中共黨軍關係的學者，他的研究途徑試圖指出派系在中國政治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史溫在研究中發現，共軍被少數人高度控制，軍隊司令員未經中央許可不能擅自調動部隊；另外派系在中共出現危機時就顯得重要，因為政治與軍隊領導者高度依賴他們所信任之人。²⁹而江澤民在擔任總書記初期，為了有效鞏固其權力，對於共軍展開了各種「奉承」，除了大幅提升軍事預算外，更多次晉升高階將領，但這造成軍隊高層領導中出身山東的將領激增，使得「山東幫」成為共軍中一個主流派系，為了壓制「山東幫」的影響力，江澤民遂扶持和其出身相同的「江蘇幫」相抗衡。³⁰因此從共軍的人事晉升中，仍可看出派系因素在背後的操作，但隨著軍官晉升管道、正常輪調等制度的建立，個人難以長期維持某一地區的社會網絡，這都使得派系途徑的討論漸趨式微。³¹

三、「黨控制」途徑對比「雙重角色菁英」途徑

「黨控制」途徑，基本上與「軍事專業主義」途徑的前提假設相同，即建立在黨與軍隊的衝突上，並以居領導角色的黨佔上風而告一段落，³²「黨控制」也與毛澤東一直強調的「黨指揮槍」概念相契合。然而「黨控制」途徑的解釋卻遭受相當批評，因為其忽視了中共黨與軍隊之間特殊的「共生」關係或中共內部菁英應是「雙重角色菁英」的事實。

²⁶ Harvey W. Nelsen, *The Chinese Military System: An Organizational Stud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2nd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pp. 35-43.

²⁷ Thomas J. Bickford, *A Retro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 Since 1979*, p. 12.

²⁸ Thomas J. Bickford, *A Retro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 Since 1979*, pp. 18-19.

²⁹ Michael D. Swaine, *The Military &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China: Leadership, Institutions, Belief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92).

³⁰ 林弘展，〈《中國人民解放軍 X 檔案》〉（台北：本土文化出版，1996），頁 16-23。

³¹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2002），頁 95。

³² 洪陸訓，〈《中共文武關係研究途徑之探討》〉，頁 87。

中共自 1927 年南昌暴動建軍以來，一直面對戰爭的威脅，這也讓中共黨的領導人須直接或間接面對、指揮軍隊的情況，因此黨軍菁英彼此間相互重疊的情形相當普遍，黨軍的機構也是相當模糊。鄭曉時認為西方在描繪中共的黨軍關係上，強調了「軍中有黨」，即「黨控制」的部份，忽略了黨的中央委員會與政治局都有軍人代表，並且大多數軍人都具有黨員雙重身份，因此「共軍與共黨的組織關係，是同一個組織之中部份與整體的關係，而不是兩個不相統屬的組織體之間的關係」。³³「雙重角色菁英」概念的系統化在波爾穆特（Amos Perlmutter）與列奧格蘭德（William M. LeoGrande）合寫的 *The Party in Uniform: Toward a Theor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一文中可見端倪。他們首先定義共黨國家的政體與黨國體制，之後指出黨軍菁英是黨國體制下最為整合的菁英；並認為這些菁英兼具黨與軍兩種特質，同時亦是黨組織與軍官聯合的關鍵。最後他們將這種「雙重角色精英」的黨軍關係劃分為聯合（Coalitional）、共生（Symbiotic）、融合（Fused）三種類型，中共的類型則歸屬於「共生」，這是由於歷史環境與長期的內戰造成高度依存和共生現象，因此有別於蘇聯與古巴等其它共黨國家。³⁴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亦支持中共黨軍關係是一種緊密的結合，長期的革命經驗與感情讓中共建政之後，仍保持著共生特質。在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in China: 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一文中，他提出因為「歷史因素、與黨享有共同利益以及黨對軍隊的滲透，軍人不只一次的挽救國家」，這可看出軍隊與黨的緊密關係，同時也指出共軍內部的政治工作系統對維持中共黨國政權的重要性。³⁵另外在 *Building the Party-State in China, 1949-1965: Bringing the Soldier Back In* 一文裡，他也再次闡明共生的概念在研究 1949-65 年這段期間中共政治的重要性，而且必須「將軍人帶回」（bring the soldier back in）討論的框架中。³⁶

總之，西方學界對中共黨軍關係的研究，深受杭廷頓提出的「軍事專業主義」影響，即使沈大偉等人觀察出中共黨軍關係中的「雙重角色菁英」現象，但在預

³³ 鄭曉時，〈共軍政治角色的回顧與前瞻〉，載於周陽山等著，《巨變下的中蘇共》（台北：新中國，1991），頁 166-167。

³⁴ Amos Perlmutter & William M. LeoGrande, "The Party in Uniform: Toward a Theor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6, No. 4, Dec. 1982, pp. 782, 784.

³⁵ David Shambaugh,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in China: 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7, Special Issue: The Individual and State in China, Sep. 1991, pp. 532-533.

³⁶ David Shambaugh, "Building the Party-State in China, 1949-1965: Bringing the Soldier Back In," in Timothy Cheek &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p. 147.

測中共黨軍關係的未來發展時，仍將其結果導向專業主義的發展道路上，³⁷這與岳飛等的研究結果趨向一致。

四、台灣學界對中共黨軍（文武）關係的研究

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是台灣在政治學的研究領域中取得國際認同的次領域，這得力於國共兩黨長期的對立與鬥爭，使得台灣對於中共在政治發展上的判斷有相當成績。³⁸也由於長期的軍事對峙，對於中共軍事的研究在台灣的中國研究上是相當熱門的議題，而中共的黨軍關係亦時而被提出來討論。

台灣學界對中共黨軍關係的研究，大多數是劃分不同時期，探討其黨軍之間關係的變化，尤其重視軍人在黨內的地位與角色。施哲雄的《江西蘇維埃時期中共黨軍關係之研究》探討江西蘇區到遵義會議（1930-1935）這五年間中共黨軍關係的變化，以及毛澤東在此過程中的權力變動。該書認為，這時期的黨軍關係表現為兩點：一，中共黨軍關係實際上是指中共中央與各個蘇區關係；二，在蘇區來說，黨軍關係是指蘇區內部的黨組織和共軍的關係。³⁹

俞雨霖的《中共軍人的政治角色：比較與歷史的觀點》認為，西方與第三世界的文武關係理論與蘇聯黨軍關係研究方法，由於社會、政治性質與文化背景的差異，若硬性套用在中共黨軍關係研究上時，會造成無法彌補的研究誤導；研究中共軍人在政治上的實際運作，必須從共黨體制與中共政治的傳統中去尋找，因此所要探究的重點，首先是軍人在中共專政體制下，他的角色與作為，第二是中國社會的封建傳統與中共政治發展如何影響中共軍人的政治角色。最後，他提出研究中共的黨軍關係應從「雙重角色菁英」的途徑出發，擺脫以往研究的範疇，同時他也認為，「雙重角色菁英」的形成，讓中共的文武關係運作，表現出派系政治的色彩，軍人之間的衝突可看成是派系之間的對立。⁴⁰

張嘉中同樣贊成由「雙重角色菁英」的角度出發探討中共軍人的政治角色，也同意軍人內部存在不同派系，彼此間相互制衡的觀點。但他以「毛澤東中心論」的觀點認為毛享有最高、最後裁判權，而軍隊成為一種特殊的官僚系統並臣服於毛之下以獲得更多利益，因此，對於中共來說，無所謂的「軍人干政」問題，因

³⁷ Thomas J. Bickford, *A Retro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 Since 1979*, p. 31.

³⁸ 吳玉山，〈政治與知識的互動：台灣的政治學在九〇年代的發展〉，載於何思因、吳玉山主編，《邁入廿一世紀的政治學》（台北：中國政治學會，2000），頁 27-28。

³⁹ 施哲雄，〈江西蘇維埃時期中共黨軍關係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頁 694-695。將蘇區視為軍隊代表，是因為蘇區及其黨組織的建立是靠軍隊建立而來，其人員亦從軍隊中抽調充當，事實上幾乎成為共軍的一種組織。

⁴⁰ 俞雨霖，〈中共軍人的政治角色：比較與歷史的觀點〉（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頁 x、11-17。

為他們都受到黨最高領袖（毛澤東）的約束。⁴¹鄭曉時則認為，「雙重角色菁英」情況是「黨中有軍」、「軍中有黨」所形成的，其後果是黨軍一體；同時中共雖然標榜「黨指揮槍」，但「槍指揮黨」的情況卻不斷出現。⁴²

丁樹範也指出過去中國的黨軍是一體的，缺乏真正的黨軍關係。但他發現，自中共十四大以後，黨跟軍開始有分別，不再有相互跨越的情形；同時因為波斯灣與科索沃的幾次戰爭，中共開始致力於軍事現代化，共軍軍官人員素質提升之餘，共軍內部的人際隸屬關係也在改變。對於十六大時江澤民未釋出中央軍委主席一職的舉動，他認為共軍顯然成為了「監國者」的角色，形成「槍指揮黨」的局面，這與中共長期以來極力宣揚的「黨指揮槍」相矛盾，此原因在中共未明文規定軍委主席任期而形成了制度漏洞，也讓黨軍關係處於一種不確定的狀態。⁴³洪陸訓在對中共黨軍關係的研究上，也與上述國內學者相同，基於「雙重角色菁英」的概念，他們的衝突即是一個黨內派系對另一個派系的衝突。他的看法也與丁樹範相類似，即「解放軍仍是忠於黨的機構，但非無條件屈從於特定最高領導者」。⁴⁴

也有學者將黨內鬥爭同軍事路線結合起來，如齊茂吉將中共的軍事路線演變與中共黨內派系鬥爭相連結，他認為軍事路線的制定過程脫離不了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因素，軍事路線也沒有路線鬥爭的問題，即便是解放軍內部存在著「紅」與「專」的衝突，一切問題仍是權力分配所造成的，與鄭曉時的論點相同，他認為欲在黨內鬥爭中取得勝利，軍隊的支持是相當重要的因素，便造成「中共軍事路線一直與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糾纏不清的原因」。⁴⁵

最後，對中共黨軍關係的研究，相當多的討論集中在文革時期軍隊勢力膨脹的情況，並依此檢視黨是否依舊控制著槍，對中共軍事路線又有何種影響。但值得重視的是，共軍在文革時期大舉介入政治活動的行為，並未受到中共高層批評，甚至取得相當多的認同，認為軍隊介入文革的行為有助於穩定文革帶來的混亂局面。面對這種情況，鍾延麟認為這是 1958 年大躍進運動，軍方大舉投入運動過程所得到的結果；他也認為，文革時期軍方將領，特別地方軍事領導，在此波政治運動中偏於保守的關鍵因素之一，便是軍隊見證了大躍進這場「左」傾錯誤對地方危害的結果。⁴⁶

⁴¹ 張嘉中，《權力鬥爭與軍人的政治角色：1949-1973 年的中國》（台北：揚智文化，2008），頁 392-393。

⁴² 鄭曉時，〈共軍政治角色的回顧與前瞻〉，頁 166-172。

⁴³ 丁樹範，〈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的中國黨軍關係〉，《中國大陸研究》（臺北），2003 年第 46 卷第 2 期，頁 57-80。

⁴⁴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頁 329-330。

⁴⁵ 齊茂吉，〈五〇年代至八〇年代由中共內部派系鬥爭探討其軍事路線之影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85），頁 365-368。

⁴⁶ 鍾延麟，〈大躍進運動中的軍方活動〉，《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2003 年總第 106 期，頁 57-68。

從文武關係的研究過程來看，杭廷頓的「軍事專業主義」概念提出後，便成為這個研究領域的典範，即便第三世界及共黨國家，與西方差異甚大，但研究途徑的選擇都受到「軍事專業主義」概念的影響。而台灣學者早期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同時與中共有獨特的交手經驗，在看待問題上便與西方學者不同，他們特別強調「派系」因素在中共各方面的影響力，也認為中共的文武（黨軍）關係實際上就是黨內派系之間的關係。

西方對中共文武關係的探討，大多集中在中共建政後開始，對於中共在 1949 年前的黨與軍隊的關係則著墨不多，但其實中共自 1927 年建軍以後，經過相當長時期的磨合，才找出黨軍相處之道，也因為戰爭的關係，黨與軍長期融合為一體，這種「雙重菁英」的概念是「軍事專業主義」無法解釋的，也讓西方學界過度強調 1950、60 年代共軍內部的「紅」、「專」衝突。「紅」與「專」的衝突固然存在，但這個爭論的背後牽涉到中共黨內鬥爭與國際環境的影響，若過分突出黨與軍之間的衝突，便與實情不符。台灣學界的研究則對中共黨內鬥爭有獨到的見解，並且對中共的黨軍關係有更為貼切的描述，但這些研究深受當時政治氛圍與資料限制，隨著大批中共黨史資料的問世與學術脫離政治因素的羈絆，為中共黨史研究注入一股新活力。

本研究立基於前人研究基礎之上，配合中國與海外新的相關研究，來討論中共的黨軍關係，究竟是派系主導，抑或是文武對峙？此外，共軍內部的「紅」、「專」衝突，是中共 1950 年代欲走向「軍事專業主義」所產生的矛盾，還是受到黨內鬥爭與國際局勢的影響，有待本研究進一步釐清。而要探究中共黨軍關係，不該只看中共建政後黨軍互動，自「八一」建軍以來黨與軍隊的關係是不斷變動的，但這段時期卻罕有討論，然而近來有關 1920-30 年代毛與國際派之間矛盾的相關資料不斷被提出來，有關當時軍事路線的決策與採行也更加透明化，更容易看出當時本土派與國際派之間的鬥爭對軍事路線的影響，這種變動的前因後果也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 研究途徑

在回顧東、西方學者的相關文獻後，可發現研究中共文武（黨軍）關係的研究途徑相當繁多，但是最主要的有四種，即「軍事專業主義模型」、「派系主義」、「黨控制」途徑與「雙重角色菁英」途徑。這些途徑各有所長，本研究以「雙重角色菁英」途徑為主，並參考了其它途徑。

中共自 1927 年「八一」建軍之後，由於長期與國民黨進行武裝鬥爭，軍人角色十分吃重，有些根據地因為情勢險峻，甚至有軍務、黨務及政務一體化的情況，造成中共黨內出現「軍人黨」的疑慮，⁴⁷由此可看出中共黨內幹部的「雙重角色菁英」，從 1927 年建軍之後就已經出現。因此中共軍事路線的決策過程，在黨、軍高度一體化之下，其決策是放到黨內進行討論、決定的，也因為如此，黨的走向也決定了軍事路線的發展方向，而黨的走向係經過高層的鬥爭之後所產生的，故軍事路線的轉變與黨內鬥爭具有高度關連性。

貳、 研究方法

時間沒法停止，也不可能倒流，我們活在當下，對於過去歷史結構的變遷無法運用身歷其境的方式作觀察分析，因此只能藉由前人對於歷史的記載及分析，盡可能的重現當時歷史背景下環境結構跟行為者間的互動，本文將採用文獻資料分析法，藉由文獻資料之蒐集、閱讀、整理，來了解當時中共領導人的論據主張，其重要鬥爭轉折點為何，又如何影響到軍事路線的制定。

第四節 研究架構

第一章為導論，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相關文獻回顧，及本文的研究途徑與方法。

第二章討論黨內鬥爭與「兩條路線」的關連。本章先討論黨內鬥爭的性質，主要觀察的是中共黨內的鬥爭，與路線的制定之間存在何種關係；其次，本章要討論中共建國後，黨內鬥爭的幾個事例。

第三章是「邁向現代化正規化時期」，即 1949-1957 年，中共黨內鬥爭對建軍路線的影響。中共建政後，在內外因素的交雜下，體認到軍隊該從草莽性格極重的游擊軍隊轉變為現代化、正規化軍隊。本章先討論共軍如何朝向現代化、正規化方向前進；之後再討論這個時期黨內外關係對共軍現代化的影響。

第四章是「在正規化與革命化之間擺盪」，即 1958-1965 年，中共黨內鬥爭對建軍路線的影響。1958 年的軍委擴大會議是中共軍隊正規化的轉捩點，隔年的廬山會議，更對建政以來的建軍方向帶來衝擊。但革命化的道路上卻仍夾雜著正規化的小徑，本章關注的就是這個時期中共軍事路線在正規化與革命化之間擺盪的情況。

⁴⁷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 5-7。

第五章是「文革的建軍方向」，即 1966-1976 年，中共黨內鬥爭對建軍路線的影響。在「全國學習解放軍」的口號下，共軍地位不斷上升，到文革「三支兩軍」後，軍人地位到達最高點。軍人的地位與軍事路線的變化都反映出黨內鬥爭的情勢。本文先討論文革初期黨內鬥爭對軍事體系的衝擊，其次討論新的軍事路線確立，最後則以鄧小平二度復出後，所進行的軍事改革討論作結。

第六章為結論。





第二章 黨內鬥爭

中共自建黨後，在領導階層內部出現多次黨內鬥爭，每次黨內鬥爭後均會對中共黨內的人事與黨的發展路線造成深遠的影響。由於中共自古田會議之後明確了「黨指揮槍」的原則，中共的黨內鬥爭或多或少地對軍隊造成影響；也因為黨與軍隊高階領導人存在著「雙重菁英」的身份，¹軍隊往往被捲入黨內鬥爭之中，這都為中共的軍隊建設造成深遠影響。

第一節 黨內鬥爭的性質

在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共的黨內鬥爭被視為解決黨內矛盾的重要方式，文革時期編寫出版的中共政治理論課本認為若無鬥爭，黨的生命便停止了，而黨內存在的兩條路線鬥爭則是社會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²

回溯中共建政前，在延安召開的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中共建黨以來的歷史形塑為「以毛澤東為中心、以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為經緯」的黨史體系。³中共建政後，兩條路線的鬥爭在毛澤東看來仍舊是「沒有調和的餘地」，⁴為了保持黨的正確性，需要不斷對黨內的錯誤路線進行鬥爭，從這可以看出，中共的黨內鬥爭，被化約為兩條路線的鬥爭，因此要理解中共黨內鬥爭，勢必要先理解中共的兩條路線之意義。

壹、兩條路線的起源與意涵

兩條路線的提法時常為中共黨史相關研究者所使用，藉由將中共黨史描繪成以毛澤東為首的正確路線對抗黨內另一派之錯誤路線，突顯出毛澤東的一貫正確。而這種論述方式也為西方一部份研究中共政治的學者所採用，形成「兩條路線鬥爭模式」的研究途徑，用來分析中共建政後發展情況。⁵

¹ Amos Perlmutter & William M. LeoGrande, "The Party in Uniform: Toward a Theor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6, No. 4, Dec. 1982, p. 782.

² 中國共產黨兩條路線鬥爭史講義編寫組編，《中國共產黨兩條路線鬥爭史講義（修改稿）》（廣州：廣東省高等院校政治理論課，1975），頁2。

³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633。

⁴ 《人民日報》，1957年7月1日。

⁵ 關向光、王瑞婷著，〈大躍進政策研究中的毛澤東權力圖像〉，發表於第四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2008年12月25-26日，頁4-9。

這裡暫且不論「兩條路線鬥爭模式」的研究途徑存在的二分法困境，然而我們可以從兩條路線的絕對對立這一點看出，「兩條路線鬥爭的詮釋主要是合理化對毛敵人的肅清」，⁶以致於在中共內部的黨內鬥爭過程，都會將其簡化為毛澤東為首的革命路線戰勝了敵對的資產階級路線。這類提法在中共官方史學出版物上是顯而易見的，這種兩條路線的鬥爭模式不僅可以解釋黨內鬥爭，亦能對軍隊建軍路線的過程進行解釋。

兩條路線鬥爭的提法，始見於王明為批判李立三所做的《兩條路線》小冊子中。王明藉由批判立三路線將自己形塑為「正確路線」的方式，來取得黨內的領導權，雖然如此，王明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並未被中共中央全會所通過，並未成為正式決議。毛澤東吸取了王明在 1930 年時進行奪權的做法，並借鑑了 1942 年 10 月到 1943 年 1 月所召開的中共西北局高幹會議針對西北地區黨史所做的決議之經驗，決意對中共自建黨以來的歷史進行撰寫的工作，透過對中共黨史的編撰，將毛澤東塑造為「一貫正確」的形象，並將其黨內對手，如王明等人，冠上錯誤路線的稱號。⁷通過延安整風，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聲望達到顛峰，進行中共建黨以來的黨史編撰的準備也已完成，於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正式通過了自建黨以來到六屆七中全會之間的黨史決議。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主要是討論 1927 年國共第一次分裂後到 1937 年抗戰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為止，對這 10 年間中共領導階層的成就與錯誤，做出蓋棺論定，此決議的目的在：

為了學習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為「後車之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認為：對於這十年內若干黨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⁸

在決議的最後，中共黨史被形容為以毛澤東為主的正確路線將帶給「黨和中國革命偉大的進步和不可戰勝的力量」，並同黨內的錯誤路線展開鬥爭。

⁶ Frederick C. Teiwes &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N.Y.: M.E. Sharpe, 1999), p. 7.

⁷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頁 626-629。

⁸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 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 版），頁 955。

貳、路線錯誤的形式

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毛澤東將中共在國共第一次合作破局後（中共稱為大革命失敗），至遵義會議前的中共中央領導人所犯下之路線錯誤，劃分為兩種形式，即左、右傾路線錯誤。

左傾路線錯誤，又稱為左傾盲動主義（冒險主義）路線，是中共高層路線錯誤的一種形式，主要是由於「表現為思想超越客觀過程的一定階段，離開了當時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時的現實性，墮入空想與盲動」，也就是說在各種活動過程中擴大打擊面、搞過火的鬥爭。⁹以《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內容來看，中共黨史內部有三次被指為是左傾路線錯誤，所指的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掌權時所犯下錯誤。右傾路線錯誤，也被稱為右傾投降主義，是中共高層犯下路線錯誤的另一種形式：「屈服於敵對勢力的壓力，放棄原則，不敢鬥爭，甚至屈膝投降」。¹⁰在中共黨內被指為有「右」傾的傾向是相當嚴厲的指控，也導致中共黨內的領導為避免落後於形勢，行事往往一個比一個更為激進，也讓中共屢次出現各種過左過火的舉動。中共黨史裡有兩次被認定是右傾路線錯誤，第一次是指責陳獨秀對於國民黨過度退縮，導致國民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有大量的中共黨員被殺害；另一次右傾路線錯誤則是因對大躍進缺點進行批評，而被認為是有右傾傾向的彭德懷。

路線錯誤的形式，除了左右傾錯誤外，在中共建國後官方的文獻裡，出現另一種路線鬥爭的形式，即「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雖然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提到「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然而也認為「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¹¹這種以階級鬥爭做為路線鬥爭的方式，隨著時間的發展，漸漸成為一套系統完整的論述，在文革開始後，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把這套論述加以細緻化，將文革的路線鬥爭形容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

然而有關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討論中共黨史的路線問題上，並未有這類提法，因此當毛澤東提出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周恩來曾表示出疑惑不解並向毛澤東請示：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提左傾、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這樣提合適嗎？這時候，毛澤東用

⁹ 李谷城，《中國大陸政治術語》（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頁 497。

¹⁰ 李谷城，《中國大陸政治術語》，頁 497。

¹¹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 5（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 389。

英語作了回答，說原來用 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線），後來改成 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對革命路線），最後還是用 Reactionary Line（反動路線）好。周恩來當下便說：「我懂了」。¹²

在周恩來表示「我懂了」之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正式成為中共官方的提法，1966年10月，毛澤東在北京召開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中心的中央工作會議，陳伯達於10月16日在會場上發表了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綱領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兩條路線—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該篇講話除了正式點名劉少奇與鄧小平之外，更明確指出兩條路線鬥爭還在繼續的觀點：

這兩條路線是針鋒相對的。一條是毛主席的群眾路線，另一條是資產階級的反對群眾、鎮壓群眾的路線。一條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路線，另一條是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使文化大革命夭折的路線。不破不立。不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消除這條錯誤路線的影響，就不能正確貫徹執行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¹³

陳伯達這篇講話被毛澤東讚賞，毛澤東要求將這篇講話「印成小本，大量發行」以讓每個紅衛兵小隊至少有一本。而1966年第14期《紅旗》雜誌的社論也以《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為題，宣傳陳伯達這篇講話的重點，以突顯中共黨內「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情況。¹⁴而批判「資反路線」的作用，除了劉少奇的錯誤提升到「路線錯誤」使其永不翻身外，更可連帶打擊與劉少奇見解相近之中共領導人。¹⁵而徹底宣揚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後果，便是從中央到地方，各個黨、政領導機關的要員被打倒，機關運作也陷於癱瘓的處境。

參、 兩條路線鬥爭是否存在？

兩條路線的劃分，是延安整風完成後中共黨史的編撰模式及其體系的展現。建國後的中共官方文獻仍將黨內鬥爭描繪成兩條路線的鬥爭，如高饒事件、彭德懷反黨集團及文革時期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都被毛澤東認為是黨內的路線鬥爭，更在公開場合不斷宣揚。¹⁶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在與華國鋒的權力競逐中取得優勢，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中共開始針對毛澤東時期一些事物重新評價，

¹²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627。

¹³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紅旗》，1966年第14期，頁2。

¹⁴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76-78。

¹⁵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頁150-151。

¹⁶ 江山主編，《共和國檔案：影響新中國歷史進程的100篇文章》（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頁355-356。

也對一些錯誤進行「撥亂反正」，但這情況造成「黨內和黨外有些同志就對社會主義和我們黨產生了一些疑惑，對毛澤東的一生功績和思想的正確性也有種種不正確的想法」，於是在鄧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開始進行「如何看待建國以後黨的歷史，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如何評價毛澤東思想」的文件草擬，最後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¹⁷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第二篇針對中共黨史做一總結性討論，從起草到經由中共中央全會通過成為正式文件，共經歷 15 個月，中間更經歷多次修改，鄧小平更對決議的編寫不斷提出自身的看法，以做為決議編寫的方向。

對於延安整風後所確立的兩條路線鬥爭之中共黨史編撰手法，鄧小平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編寫過程中不斷提出質疑與批評：

過去常說十次路線鬥爭，現在應該怎麼看？

彭德懷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志這一次也不能算了。這就減去了兩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羅章龍另立中央，分裂黨。張國燾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說了。

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高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採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但是，高崗究竟拿出了一條什麼路線？我看，確實沒有什麼路線。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線鬥爭，也難說。你們再斟酌一下。¹⁸

從鄧小平的言談中得知，中共官方文獻所記載的路線鬥爭，大多是具有爭議的，甚至連建國初期高崗事件，也認為與路線鬥爭無關，純粹是對權位的爭奪。也因此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前的預備會議上，鄧小平公開表示：「我們不提路線錯誤，是考慮到路線鬥爭、路線錯誤這個提法過去我們用得並不準確，用得很多很亂」、「黨內鬥爭是什麼性質就說是什麼性質，犯了什麼錯誤就說是什麼錯誤，講它的內容，原則上不再用路線鬥爭的提法」。¹⁹所以路線鬥爭的用法在中共官方文獻上再不復見，即便中共黨內在 1980 年代中期出現民主化的爭論，中共是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爭論焦點，不再提「兩條路線鬥爭」。

¹⁷ 〈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新華網，2010 年 6 月 19 日，取自：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994.htm。

¹⁸ 本段為 1980 年 3 月 19 日鄧小平與負責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幹部就決議的編寫方向所做的講話一部份，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 257-258。

¹⁹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頁 272。

第二節 建國後黨內鬥爭

中共建黨以來黨內就路線、策略運用及權力爭奪部份，出現多起衝突。本節將討論重點放在中共建國之後發生在黨內的三次大規模鬥爭活動，即 1954 年的高崗事件、1959 年的廬山會議風波以及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作為之後討論建國後中共軍事路線變化的相關背景知識。

壹、高崗事件

高崗事件是中共建國後第一次權力鬥爭，對照中共相關權力鬥爭案例，這起事件純粹為中共高層，即高崗欲取代劉少奇作為中共第二號領導人的地位，藉由新稅制及中共新一屆政治局名單事件挑戰劉少奇的權威，然而最終毛澤東選擇支持劉少奇，高崗及饒漱石被指為「高饒反黨聯盟」。前面提到鄧小平在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對於高崗事件進行重新審視，雖然在決議內文中取消了這一事件「集團」、「聯盟」的指控，但有關兩個「司令」和「反黨、篡權」的罪名並未免除。²⁰

1952 年下半年韓戰進入相持階段，聯合國軍的攻勢在上甘嶺戰役遭到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的阻擋，戰役帶給雙方在人員與器物的損失都讓雙方開始正視重啟談判的可能性。為此隔（1953）年 7 月 27 日交戰雙方終於在 38 度線的板門店簽署停戰協定，結束這場戰爭。²¹戰爭的結束代表著中共可以將注意力放在國內經濟建設上，加上中共建國後致力恢復因內戰而受損的國內經濟，到了 1952 年時經濟狀況大抵恢復到抗戰前之水準，²²也讓中共開始著手進行第一個五年經濟計劃的推展，此時進行中央集權與加強中央機構領導人才便相當重要。

為加強中央的權力與對地方的領導，以及為即將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進行準備，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關於改變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機構與任務的決定》、《關於增設中央人民政府機構的決議》兩項議案，透過將「將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一律改為行政委員會，僅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機關，而不作為地方的最高政權機關」；同時增設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國的計劃經濟工作。²³

²⁰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故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頁 II-III。

²¹ 林蘊暉等著，《凱歌行進的時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 150-153。

²²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2001），頁 578。

²³ 〈加強國家工作的集中性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 423-427。

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素有「經濟內閣」之稱，可見其重要性，由高崗擔任計劃委員會主席一職，成員囊括中共中央與地方要員，層級之高實屬罕見，²⁴尤其高崗在六個大區的負責人中所擔任職務和權力是最高的，有著「五馬進京，一馬當先」的稱譽，這也讓高崗站上權力最高點，亦為高崗日後試圖整倒劉少奇，取代其位立下基礎。加上此時毛澤東對於劉少奇、周恩來在黨政各方面領導工作不盡滿意，大動作批評劉、周二人，加深高崗取代劉、周兩人的決心。

1953 年是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衝突浮上台面的一年。毛澤東就周恩來領導的中央政府（即政務院）出現的分離主義現象展開批判，如 1953 年新稅制問題，事先並未知會毛澤東就倉促上路，雖然新稅制意在改善公私單位稅收不公情況，並為中央政府開闢新的財源，但新稅法一施行即引發一連串的風波，如物價波動、搶購商品、思想混亂等，毛澤東對此致信周恩來、陳雲、薄一波：

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市委亦未下達通知，匆率發表，毫無準備。此事似已在全國引起波動，不但上海、北京兩處而已，究應如何處理，請你們研究告我。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無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稅制與舊稅制比較利害如何？何以因稅制而引起物價如此波動？請令主管機關條舉告我。²⁵

從毛澤東這封信可看出，毛澤東對於重要的財政措施未經黨中央討論即下發施行，這種政府工作脫離黨中央絕對領導的「分離主義」現象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因此為加強黨對政府工作的領導對毛澤東來說是刻不容緩的，於是中共中央在 1953 年 3 月 10 日頒佈《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規定「今後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畫和重大事項，均須事先請示中央，並經過中央討論和決定或批准以後，始得執行」外，也取消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政務院各部門的黨組工作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並將政府工作分為多個「口」，由黨中央分「口」負責，周恩來的權力被大幅削減；²⁶

²⁴ 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有 13 位成員，分別為：主席高崗，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北局書記；副主席鄧子恢，中央委員，中南局第二書記；委員有：陳雲，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北局第一書記；林彪，中央委員、中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中央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中央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薄一波，中央委員；彭真，中央政治局委員；李富春，中央委員；黃克誠，中央委員；習仲勳：中央候補委員、西北局第二書記；劉瀾濤，中央候補委員、華北局副書記。共計 11 名中央委員（其中有 4 名政治局委員），兩名候補中央委員。成員中包括來自六個大區的主要負責人，這些地方大員至中央機構任職，除了加強中央領導人才外，地方大員離開各自的「山頭」對於中共加強中央領導能力是有幫助的。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故事》，頁 75-76。

²⁵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8），頁 165。

²⁶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 67-72。根據該決定，政府工作分成多個「口」，國家計畫工作，由高崗負責；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檢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羅瑞卿負責；財經工作，由陳雲、薄一波、鄧子恢、李富春、曾山、賈拓夫、葉季壯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勳負責；

兩個月後中共中央針對財政經濟工作的領導歸屬進行更細部的調整，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部門工作領導的決定》，高崗不但是國家計劃工作的負責人，也是各工業部門的主管，握有相當大權力。²⁷此時周恩來雖為政務院總理，但實際只負責外事口部份。

除了對周恩來批評外，毛澤東也對在延安時期的親密戰友，劉少奇日益不滿，私下對高崗透露其不滿，並密令高崗前往東北查閱敵偽檔案以瞭解 1920 年代劉少奇在瀋陽被捕後的情況；²⁸而劉少奇與楊尚昆因為部份中央文件或電報未經毛澤東審批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被毛澤東嚴正批評。²⁹如此種種，都讓高崗立下拱倒劉少奇的信念。此時新稅制風波與安子文擬定八大政治局委員的名單接連出現，讓高崗認為「挪動」劉少奇位子的時間已經成熟，遂在 1953 年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與組織工作會議上展開「批劉」行動。

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負責制定新稅制的中財委副主任、財政部長的薄一波是會議上被點名批判的對象，在這場會議上毛澤東批判新稅制的施行，是向資本主義發展的信號，同時在該會議上不點名批評劉少奇是「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³⁰而高崗也附和毛澤東的想法，在會議上批判薄一波的錯誤，他也運用劉少奇所說過的話作為批判薄一波依據，³¹這類手法被後來歷史學者認為是「批薄射劉」，也是高崗挑戰劉少奇地位與權威的證據。全國財經工作會議結束後，中共中央隨即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高崗原東北局的下屬張秀山、郭峰等人在此次會議上針對實際主持中央組織部工作的副部長安子文就幹部任用的議題展開攻擊，由於安子文是劉少奇人馬，這次行動被解讀為是「討安伐劉」，安子文在這次會議中遭受相當大責難，而該會議的討論內容也引發各大區組織部與會人員不同的看法，導致會議難以進行下去。爭論僵持不下，毛澤東出於過渡時期總路線剛制定，內部期盼著團結一致以朝向社會主義方向邁進，因此毛澤東不得不改以強調團結，在各打饒漱石、安子文五十大板的情況下，結束這場論爭，同時也讓毛澤東暫時打消「拉下」劉少奇的念頭。³²

然而高崗這次卻未體會到毛澤東的意圖，仍一心一意達成毛澤東之前給他的暗示，即將劉少奇拉下馬。因此高崗在 1953 年之後活動頻繁，到處活動，出現「頤年堂門可羅雀，東交民巷 8 號車水馬龍」的情況，這種情況引起毛澤東的注

外交工作（包括對外貿易局、對外經濟、文化聯絡和僑務工作），由周恩來負責；其他不屬於前述五個範圍的工作（包括監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鄧小平負責。

²⁷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部門工作領導的決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頁 180-182。根據該決定，高崗除了主管國家計劃工作外，也領導政務院之下的重工業部、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械工業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等八個工業部門。

²⁸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故事》，頁 107-114。

²⁹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 5，頁 80。

³⁰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 5，頁 81、90。

³¹ 陳大蒙、劉史，《落井下石—重審高崗案》（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第 2 版），頁 119-120。

³²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故事》，頁 154-171。

意；更甚的是，因為戰爭的關係，高崗同兩位高階將領彭德懷及林彪關係相當密切，在密謀打倒劉少奇的當下，高崗同彭、林二人往來更令人起疑，³³在曾被高崗遊說不成的鄧小平、陳雲等人的密告下，毛澤東驚覺問題嚴重性，秘密派陳雲南下廣東，調查 1953 年 6-9 月高崗在南方度假時的言行舉止，³⁴在與林彪交際之後，林彪表示不再支持高崗，也讓毛澤東開始部署下一輪的行動：批判高崗。

在經過調查、部署後，毛澤東決定外出南下，並在 1953 年 12 月底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將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交由劉少奇主持，表示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信任；並在會議中意有所指的表示：

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³⁵

在毛澤東缺席下，中共中央召開由劉少奇所主持的七屆四中全會，並通過針對高崗、饒漱石「反黨」作為而來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中央全會結束後又召開批判高崗、饒漱石的高級幹部座談會，進一步批判高、饒的問題，³⁶問題發展至此，高崗企圖以「死」明志，而出現兩次自殺，最終在 1954 年 8 月 17 日自殺成功，距第一次自殺 2 月 17 日，整整半年。高崗死後，中共隨即對舊部屬進行清算，雖然相較之後中共的黨內鬥爭，高崗事件的內部清算較寬，但也連累不少人。但高崗事件的餘波仍持續著，也成為日後中共黨內鬥爭沿用的罪名，如 1959 年彭德懷的罷官，罪名之一即是曾參與高崗「反黨集團」，還有之後的《劉志丹》小說事件，亦牽扯到高崗。³⁷

貳、 廬山會議事件

中共共有三次在廬山舉行中央層級的會議，分別是 1959 年 7-8 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與八屆八中全會、1961 年 8 月的廬山工作會議、以及 1970 年 8-9 月的九屆二中全會。本段討論的廬山會議特指 1959 年在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與八屆八中全會，該次會議對中共政治發展影響深遠，除了將中共中央工作由「糾

³³ 陳大蒙、劉史，《落井下石》，頁 192-201。

³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 191-192。

³⁵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 5，頁 147。該講話見於 1955 年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高饒反黨聯盟一詞也在這次會議上公開提及。

³⁶ 陳大蒙、劉史，《落井下石》，頁 227-240。

³⁷ 陳大蒙、劉史，《落井下石》，頁 311-335。受高崗事件牽連的，最著名的是高崗的「五虎上將」，即時任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張秀山；時任第三副書記張明遠；時任東北局秘書長趙德尊；時任國家計委秘書長馬洪；時任東北局組織部長郭峰。另外還有三名省部級官員落馬是：時任山東分局代理書記向明；時任中共駐北朝鮮大使倪志良；時任旅大區黨委第二書記陳伯村。

左」轉變為反「右傾」之外，並將上書批判大躍進的彭德懷及支持彭言論的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列為反黨集團進行批判。³⁸

現今研究 1959 年廬山會議的中共黨史學者，大多會將此次會議發展狀況分為二或三的時期，但共通點是將會議前期形容為「神仙會」，根據李銳的說法，自第一次鄭州會議之後，對於進行大躍進過程中所出現的一些錯誤，逐漸得到糾正，整體形式也逐漸好轉，為了讓大家在沉重壓力中暫時獲得紓解，同時也為了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以利於之後工作進展，³⁹因此中共中央選定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由於會議前期氣氛較為寬鬆，故被稱為「神仙會」。

原先廬山會議預計至多只開半個月，到 7 月 16 日便大致結束，之後通過一個會議紀要作為正式文件下發，⁴⁰然而會議討論過程中並未如毛澤東所預料的「神仙會」模式，相反地對於現實形式的估計及問題上，中共黨內高級幹部之間存在著相當多不同意見，同時 7 月 14 日彭德懷寫給毛澤東的信，雖對大躍進指導思想提出肯定，但也對大躍進進行過程中出現的弊端展開批判。因為這兩個狀況，讓毛澤東作出延長會期的決定，並將原先會議的組別進行重組，並再加入一些新的人員到會議中。⁴¹

彭德懷的信先是肯定 1958 年的大躍進運動，然而在提到大躍進運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時，則提到「浮誇風」盛行，並且將大躍進運動一些過「左」的行為認為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並且提出「若不是毛澤東命好，工農太善良了，中國老早就發生匈牙利事件，而不得不向蘇聯請求救兵」等言論，⁴²信中內容批判大躍進種種缺失引發毛澤東不滿，加上毛澤東在收到這封信後，印發給各小組參閱後討論，張聞天在 7 月 21 日於第二組的發言上，贊成彭德懷的論點。彭、張兩人的言論，對毛澤東無疑是一項刺激，也讓毛澤東決定會議主軸由原先的「糾左」轉為「反右傾」。⁴³

在決定轉變會議討論方向後，毛澤東在 7 月 23 日召集與會人員講話，展開反擊。他在會議上不點名的指責彭德懷具有「資產階級動搖性」的傾向，為了表示真理掌握在毛澤東這邊，毛在會議上表示：

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一定滅亡，應該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組織紅軍去，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

³⁸ 姜華宣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 297-298。

³⁹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09，最新增訂版），頁 24。

⁴⁰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 87。

⁴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下冊（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03），頁 977。

⁴²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 118-119。

⁴³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 140-147；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 729-730。

接著提到：

我勸一部份同志講話的方向要注意。講話的內容基本正確，部份不妥。……這些同志據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不是左派。……他們不是左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距右派還有三十公里，因為右派很喜歡這種論調。……這些同志採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不相信，將來看。⁴⁴

毛澤東的一席話使會議方向突然轉變，令當時與會人員感到不解，如李銳與黃克誠不約而同的在回憶史料中提到，對毛澤東在 7 月 23 日的一席話感到「當頭一棒、十分震驚」，並對毛的言論「感到不解」。⁴⁵但毛澤東的講話為會議主軸重新定調，會議主軸除了批判黨內的「右傾」思想外，更將彭德懷的思想性質劃歸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黨的總路線進攻，並指稱彭德懷的信是別有用心等。⁴⁶會議發展至此，已與當初「神仙會」的「糾左」目標相去甚遠，隨著會議批判風氣逐漸升高，毛澤東決定召開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進一步批判彭德懷及其支持者。八屆八中全會於 8 月 2 日召開，毛澤東在會議上進行講話，為八屆八中全會定下基調：第一，前一階段反了九個月的「左」，現在不是反「左」的問題，而是要反右的問題；第二，現在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猖狂進攻；第三，現在黨內出現分裂的傾向。⁴⁷於是從 8 月 2 日到 8 月 16 日，會議批判指向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四人，重點在揭露四人之間的聯繫，並將之稱為「軍事俱樂部」。在會議強大的壓力下，彭黃張周四人被迫承認右傾、甚至反黨罪名，最終通過了一個會議公報、四個決議及決定。⁴⁸2003 年出版的《毛澤東傳》為 1959 年廬山會議下了這樣的結論：

把黨內的分歧和矛盾，直接說成是階級鬥爭，這大概在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就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進一步延伸到黨內，使黨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原則遭到嚴重損害，影響深遠。

49

⁴⁴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 154-155。

⁴⁵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 161；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 252-253。

⁴⁶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下冊，頁 989-991。

⁴⁷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下冊，頁 998。

⁴⁸ 姜華宣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頁 298。這四個決議與決定分別是：《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定》，《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會議之後，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 4 人被調離軍隊、外交、地方第一線工作，僅保留每人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後補委員之職。

⁴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下冊，頁 1003。

參、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以措詞強硬的言論，扭轉原先會議主軸，並將對大躍進運動持反對意見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 4 人打為「反黨集團」，毛澤東雖然暫時穩固了其權威，但也讓中共黨內漸漸朝向一人專制方向傾斜，1966 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權勢達到巔峰，中共的八大路線也蕩然無存。⁵⁰

大躍進運動的失敗導致中國出現為期三年的大饑荒，也讓毛澤東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承認錯誤，然而林彪在這次會議中大談毛澤東思想，如提出「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等推崇毛澤東的言論，為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闢開道路，⁵¹林彪與毛澤東的關係逐漸緊密的同時，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期的戰友—劉少奇，則與毛澤東的分歧逐漸擴大，兩人漸行漸遠。⁵²

毛澤東在 1964 年 7 月在文藝界進行一次文化革命的想法，因而成立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做法與毛澤東原先設想有相當的落差，毛澤東轉而透過江青等人，批判吳晗編寫的京劇《海瑞罷官》，作為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號。⁵³在江青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一篇題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名批判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但在彭真等人抵制下，文章僅在上海刊載，並未有其它媒體轉載，即便後來大多數報紙都陸續轉載，以彭真為領導的北京市委仍未有轉載的打算，這也被毛澤東批評「針插不進，水潑不入」。

以姚文元的文章作為進攻的信號後，在毛澤東的首肯下，批判焦點轉向時任總參謀長、中央軍委祕書長的羅瑞卿，經過三個餘月的調查，羅瑞卿在 1966 年 3 月 4 日的一場會議上（簡稱三月京西賓館會議），被羅列出五條罪狀：一、敵視與反對毛澤東思想；二、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三、目無紀律組織；四、品格惡劣；五、公開向黨伸手，逼迫林彪「讓賢」、讓權。⁵⁴早先於羅瑞卿，中央

⁵⁰ 中共的八大是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後所召開，是中共探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次重要會議，當中確定了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系列方針與政策，將工作重點由階級鬥爭轉到以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上。八大路線主要有幾個部份，經濟部份主要確立以計劃經濟為主、商品經濟為輔的格局；政治部份則反對「個人崇拜」，主張「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然而這些黨內民主原則在廬山會議後逐漸揚棄。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 9-20。

⁵¹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 304。

⁵²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頁 249。根據金春明的研究，他認為毛劉之間的分歧開始點主要是對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與人民公社）的認識與態度上不同。

⁵³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 456-459。

⁵⁴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第二版），頁 38-39。

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因設置監聽設備罪名而被免去主任一職；而彭真為限制《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通過，《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又稱《二月提綱》），限制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止於學術上的討論，但毛澤東卻對《二月提綱》感到不滿，加上彭真是劉少奇倚重的部屬，一旦彭真被鬥倒之後，對劉少奇的批判將能有效開展，於是在毛澤東的安排下，中共在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間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試圖賦予文化大革命合法地位，在這次會議中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又稱《五一六通知》），該通知除了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另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外，還寫到：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⁵⁵

在發動文化大革命後，瘋狂的群眾運動導致學校等機構陷入癱瘓，為了穩定局勢以及保證黨的領導，劉少奇與鄧小平採取派出工作組的方式，指導文革進行的方向，然而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對於文革的見解不一致，工作組指導文革走向、限制學生活動的方式，讓毛澤東相當不滿，在 7 月 24 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嚴厲批評派工作組的做法，在毛澤東明確表態之後，26 日的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通過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工作組的存廢由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由此可看出中共黨內生活已呈現不正常現象，陳毅直言這簡直是「乾綱獨斷」。⁵⁶為了讓文革進行有一個具體方向，同時對劉少奇、鄧小平展開批判，毛澤東決定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公開批判工作組的錯誤，指稱工作組犯了「方向性」及「階級錯誤」，工作組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1966 年 8 月 5 日，毛澤東在全會上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內容不點名批判劉少奇：

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 1962 年的右傾和 1964 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⁵⁷

⁵⁵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頁 80。

⁵⁶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 1159。

⁵⁷ 姜華宣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頁 354。

毛澤東的這篇大字報，將中共內部對文革的見解分歧，解釋為「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提高批判力度；十一中全會也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作為文革的指導綱領。同時透過全會的召開，毛澤東提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除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外，全會補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六人：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同時改組政治局常委及委員排序：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劉少奇在黨內的排名由第二降到第八位，在未重選黨中央副主席情況下，林彪在會後成為黨中央唯一副主席，是毛澤東的接班人。這次的中央領導機構的改組，從人選到領導人的排序，可看出毛澤東對原先中央第一線領導人不滿，在否定第一線領導人之後，黨內權力完全集中到毛澤東手中。⁵⁸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中共黨內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此時軍隊也不能獨立在文革風暴之外，根據林彪的建議，10月5日中共中央批發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起草的《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撤銷軍事院校黨委領導文革的規定，並為被院校黨委及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份子等人進行平反，這為文革「踢開黨委鬧革命」創造出條件。在這情況下，全國各地，從國務院各部委到最基層的生產大隊之黨政組織，都受到衝擊，黨政領導人被批鬥、糾鬥的情況屢見不鮮，因為各領導機構負責人被打倒，也造成黨政機構實際陷入癱瘓狀態。⁵⁹

到了1967年1月，上海爆發一月革命（又稱一月風暴），毛澤東號召全國進行全面奪權，不久上海市委被打倒，一個新的組織型態：革命委員會取代了原有的黨委組織。⁶⁰鑑於全國秩序因各派系間奪權而陷入混亂，一些老經驗的幹部被造反派糾鬥，這引發老師、老幹部的一陣撻伐，也讓老師、老幹部與江青、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壁壘分明，雙方也出現多次衝突。第一次衝突是在1967年1月19日召開關於軍隊要不要進行「四大」的軍委碰頭會上，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反對在軍隊中進行四大，以及就造反派試圖糾鬥總政治部主任蕭華一事與江青等人進行爭論，這次會議後來被江青等人形容為「大鬧京西賓館」。⁶¹接著在2月11日的中央碰頭會上，原先會議主題在「抓革命、促生產」，然而會議開始後變成老師與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論爭，葉劍英與徐向前指責中央文革成員插手軍隊事務，造成軍隊混亂，這次會議後來被中央文革成員渲染成「三老四帥」⁶²「大鬧懷仁堂」，外界將老師的反擊形容為「二月逆流」。⁶³

⁵⁸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44-45。

⁵⁹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頁188-189。

⁶⁰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121-133。

⁶¹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頁230。

⁶² 三老為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四帥為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

⁶³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著，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臺北：左岸文化，2009），頁202-205。麥克法夸爾認為，如果當時主

對於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的事蹟，毛澤東非常震怒，⁶⁴2月29日毛澤東召來周恩來、葉群、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開會，在會上宣稱「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最終毛澤東令譚震林、陳毅、徐向前「請假檢討」；然而在譴責老師之餘，毛澤東並未有徹底打倒老師們的念頭，因此在4月30日晚上，毛澤東召來參與「二月逆流」的老師們開「團結會」，並且讓他們在隔日的五一節慶登上天安門，象徵老師們安全過關。

1967年7月20日發生在武漢的「七二〇事件」，是中國陷入「全國內戰」的一個重要事例，也是文革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群眾性公開抗議活動，抗議目標對準中央文革小組，⁶⁵這場抗爭最終以中央文革小組勝利，支持保守派「百萬雄獅」的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被撤銷職務而告終。

對待劉少奇的部份，從原先的不點名批判最後變為公開糾鬥，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除了對「二月逆流」的老師及朱德、陳雲、鄧子恢與王稼祥等人進行批判外，這次會議也做出正式清算劉少奇的決定，全會通過《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永遠開除出黨；另外八屆十二中全會同時決定召開九大的時間表。⁶⁶

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情況下，中共召開九大，林彪在九大會議上正式被確認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並寫入黨章條文中；此外改選新一屆的中央委員後，僅有53人是八大中央委員會委員；同時間在279名中央委員與候補委員中，現役軍人佔123人，在政治局21位委員中，軍隊勢力有11人，⁶⁷軍人在中共黨內地位的提升，與維持文革秩序穩定息息相關。林彪權力的增加，也讓毛澤東備感威脅，九屆二中全會上，有關憲法是否設置「國家主席」一職及「天才論」的論爭，毛澤東與林彪之間關係出現裂痕，也加劇兩人之間的矛盾，林彪方面也開始私下探尋武裝政變的可能性，一份據說是林彪授意的政變計劃—「五七一工程紀要」，由林彪之子林立果一手策劃，然而該計劃未能有效執行而終告失敗，計劃的失敗導致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倉促逃離北京，最終「折戟沉沙」外蒙古的溫都爾汗。⁶⁸

九一三事件之後，中共開始進行平反文革時期的一些冤假錯案，因此解放了一批在文革期間被打壓的老幹部，具體作為有平反參與「二月逆流」的老幹部，如譚震林；並且由毛澤東親自出席陳毅的追悼會，這些跡象表明因文革而遭受打

持該會議的周恩來與老師們聯合起來，向毛澤東提出一套解決文革造成的恐怖與混亂之方案，將能給毛澤東帶來很大的影響。但最終周恩來並未與老師們聯手。

⁶⁴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980-981。

⁶⁵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頁525-535。

⁶⁶ 姜華宣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頁365-366。

⁶⁷ 麥克法夸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296-304。另外邁斯納提到，軍隊幹部佔中委及候補委員的比例為49%，見於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322。

⁶⁸ 麥克法夸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330-341。

擊的老幹部開始回到中共政治舞台。然而解放老幹部不代表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失敗，相反地在 1973 年 8 月召開的中共十大仍肯定中共九大的指導方針，王洪文、張春橋皆進入政治局常委名單，江青與姚文元名列政治局委員，這象徵文化大革命運動仍將持續進行下去。⁶⁹

解放後的老幹部與文革竄起的政治新貴，在本質上存在極大的矛盾，十大之後雙方明爭暗鬥，在權力競逐過程中雙方互有收穫，但「四人幫」是毛澤東將文革繼續進行下去的主要動力，因此「四人幫」與老幹部之間的鬥爭，「四人幫」因毛澤東的支持而略佔上風。在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後，推行一連串整頓工作，這觸擊毛澤東的文革底線，所以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江青等人在 1975 年 11 月掀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並將 1976 年 4 月 5 日因追弔周恩來而引發的群體事件—四五天安門事件定性為鄧小平在幕後主導的反革命事件，最終鄧小平再一次地被解除黨內外一切職務。⁷⁰

1976 年 9 月毛澤東過世後，中共黨內的三股勢力：「四人幫」、元老派以及華國鋒、汪東興勢力開始展開權力爭奪，華國鋒、汪東興聯合中共元老葉劍英、李先念等人於 10 月逮捕「四人幫」成員，正式宣告「十年文革」的結束。「四人幫」垮台後，鄧小平在 1977 年 7 月十屆三中全會上三度復出，隨即與華國鋒在權力上展開競逐，鄧小平的助手胡耀邦在意識型態的論爭中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力壓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主張，削減華國鋒在意識型態方面的解釋權，使華的權威遭受打擊；而在 1978 年 11 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老幹部要求徹查一些有爭議的歷史疑案，並恢復在這些疑案中被鬥爭的老幹部之名譽，最終會議結論是「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四五事件」是革命行動並為眾多老幹部進行平反等建議，⁷¹隨即在 12 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追認此次會議的所有建議，大批老幹部重新復出工作，進一步架空華國鋒，最終迫使華國鋒辭去中共黨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三個職位。而在鄧小平逐步掌握大權之後，在鄧的主導下，中共開始總結建國以來的黨史問題，並於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功用：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歷史

⁶⁹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頁 355-357。

⁷⁰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頁 398-420。

⁷¹ 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台北：天下文化，1998），頁 56-62。

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⁷²

第三節 黨軍關係

由於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解放軍之間存在著「無法分開的結合」（inextricably intertwined）的關係，⁷³因此軍隊的高階將領在黨內同樣具有重要的職位，如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委員、甚至是政治局常委，同時中共一向以「黨指揮槍」作為建軍原則，所以當黨內出現鬥爭的情況時，解放軍無可避免的會被捲入其中，連帶著影響到建軍路線。所以本節就黨與軍隊之間關係進行討論，以理解中共黨內鬥爭為何會牽動軍事路線建設。

壹、雙重菁英特性

黨內鬥爭的結果會影響中共軍事路線，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共黨軍領導人存在著雙重菁英（dual elite）的特性，軍隊的領導人同時也是黨的高階領導幹部，所以具有軍人身份的將領一旦被捲入黨內鬥爭的過程中，可能面臨到撤職的情況，隨著軍事領導機關的改組，這將對軍事建設造成影響。

中共政權是藉由解放軍在戰場上擊敗國軍而建立起來的，雖然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然而中國華南、西南及西北地區仍有國軍殘部和地方武裝勢力盤據，在以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的情況下，軍人往往在地方政權、黨部機構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中共建國初期地方領導幹部呈現黨、軍不分的情況。當時全中國共劃分為六大行政區，除華北人民政府由中央直接領導外，其餘地方則設有「軍政委員會」作為最高統治機構，軍政委員會主席大多由各大軍區司令員擔任，而各大區黨委第一書記一職也都具有軍區政委的身份，黨政軍三者之間的界線相當模糊。⁷⁴雖然 1955 年取消大區制度，建立以文人為主體的統治體制，並藉由在同年推行軍銜制，取消了轉任到地方工作軍人之軍籍身份，黨軍之間的界線從此看似分明，然而地方軍人仍參與地方黨委事務運作；⁷⁵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各地方統治機構改組為革命委員

⁷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網》，2011 年 1 月 17 日，取自：<http://cpc.people.com.cn/GB/4519184.html>。

⁷³ David Shambaugh,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in China: 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7, Special Issue: The Individual and State in China, Sep. 1991, p. 532.

⁷⁴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治溢譯，《追尋現代中國—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臺北：時報文化，2001），頁 707-710。

⁷⁵ 如羅榮桓有鑑於大躍進過程中地方領導人出現「五風」的情況，認為「各地駐軍應經常關心地方工作，及時向當地黨委反映駐地附近人民群眾的政治思想動態、地方工作中執行中央指示的

會模式，在「三結合」的號召下，大批軍人進入革委會，而掌握實權的革委會主任也大多由軍人擔任，雙重菁英的特性又再次被強化。

而中央層級的黨、軍菁英不分的情況更為明顯，軍隊的負責人同時在黨、政機關擔任重要職位，如中共黨內的決策領導機關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一直都有軍人代表；而政府機構非軍事部門同樣有軍人擔任領導人，如賀龍長期擔任國家體委主任一職，陳毅於 1958 年 2 月接替周恩來任外交部長。在黨軍菁英具有重疊的情況顯現出的政治意涵是，首先確保了「黨」對「軍」的絕對控制，其次則代表解放軍從事政治活動具有合法性。⁷⁶軍隊與黨成為一體的情況下，一旦黨內鬥爭涉及到軍隊菁英時，往往會出現「軍事路線鬥爭」，並將其上綱到「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與「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衝突，然而這種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軍事路線鬥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對彭德懷與林彪批鬥都有類似的情況，對這兩個「反黨集團」的批判都牽涉到軍事路線鬥爭，然而彭德懷與林彪推行的建軍方向不應被劃歸為「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對其鬥爭仍屬於黨內鬥爭的一環。⁷⁷

貳、以黨領軍

雖然中共黨、軍幹部具有雙重菁英的特質，然而自古田會議之後，「黨指揮槍」、軍隊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就成為中共黨軍關係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則，毛澤東在《戰爭與戰略問題》一文中雖然承認「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但仍堅持「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容許槍指揮黨」。⁷⁸為了貫徹「黨指揮槍」的精神，中共設計出一些制度來達成這個精神，主要是以政治委員制及黨委制來達到「黨指揮槍」的精神。

政治委員是黨派駐於軍隊的代表，享有極高的地位，除了有監督軍事行動的權力外，當政治委員與軍事指揮員的意見相左時，政治委員擁有最終決定權，在《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委員工作暫行條例》之中規定「政委不僅是蘇維埃政權在紅軍中的代表，而同時是中國共產黨在紅軍中的全權代表」，從此可看出黨藉由派

情況和急需解決的問題」，《羅榮桓傳》編寫組，《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第 2 版），頁 350。然而當時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則認為，「這個建議的出發點是好的」，卻會「造成軍隊在黨外來干預黨的工作的情況」以及老資格的軍隊幹部會干涉過多地方工作，引發全國性的軍隊與地方對立，最終毛澤東贊同林彪的意見，不贊成軍隊將反映地方情況作為主要任務之一，見李德、舒雲編著，《林彪日記》，下冊（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頁 786。

⁷⁶ 張嘉中，《權力鬥爭與軍人的政治角色：1949-1973 年的中國》（臺北：揚智文化，2008），頁 76。

⁷⁷ 彭德懷與林彪推行的建軍方向基本上並未推翻中共的建軍原則，如在強調現代化、正規化的同時，仍肯定政治工作對於軍隊的重要性；並且支持軍隊的「多功能原則」，即軍隊承擔著非軍事工作的任務。因此俞雨霖認為中共軍隊內部出現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與「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鬥爭，並非真正的路線衝突，僅是政治鬥爭上綱上線的結果，見俞雨霖，〈中共軍人的政治角色：比較與歷史的觀點〉（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頁 176-177。

⁷⁸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 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 版），頁 547。

駐在軍隊的政治委員，實現「以黨領軍」的目的。⁷⁹這種政委擁有最終決定權的情況一直持續到對日抗戰，到了國共第二次內戰時，中共將政委制過渡到黨委制，在黨委制裡，軍事工作歸軍事主官負責、政治工作歸政委決定，⁸⁰這項制度一直延續到現今。

中共建國初期在以蘇聯為師的前提下，大舉向蘇聯學習各種經驗，當外來的蘇聯經驗與中共傳統經驗相牴觸時，造成中共內部不小的論爭。蘇聯在軍隊體制上有別於中共的黨委制，採取一長制模式，由於蘇聯紅軍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讓解放軍內部出現支持一長制與黨委制兩種對立聲音，然而原先傾向實施一長制的彭德懷最終還是決定採取黨委制，並將軍隊的政治工作寫入《政治工作條例》之中。彭德懷在 1953 年底召開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對黨的領導與首長負責的問題部份，指出「黨的領導是完成重大的政治任務和軍事任務的保證」，同時認為在軍隊組織關係與領導為：

在組織方面，……根據黨委員會集體領導和首長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原則，採取在黨委統一（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即政治委員和同級的軍事指揮員同是部隊的首長，……這種制度，是由我國軍隊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並適合我國軍隊的情況的，它是一種既有統一（集體）領導，又有分工負責的制度。⁸¹

而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則在該次會議上針對軍隊政治工作問題提出意見，針對黨軍關係部份，強調「堅持和健全黨委制，加強黨的集體領導作用，是軍隊建設尤其是政治工作建設的基本環節」，並且提出「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⁸²會議結束後中共於 1954 年 4 月頒佈《政治工作條令》，不僅將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納入條文之中，並將黨在軍隊的政治工作列入條文，稱「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正式將黨軍關係以正式法令條文固定下來。⁸³

為了強化黨對軍隊的領導，除了在軍隊內部建立黨委制及政委制外，地方軍隊在接受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同時，也必須接受地方同級黨委的領導。這種地方軍隊受軍隊系統和地方黨的委員會的雙重領導制度起源大躍進時期，毛澤東為避免波匈事件類似情況在中國出現及要求軍隊投入大躍進運動行列，要求軍隊

⁷⁹ 轉引自施哲雄，〈江西蘇維埃時期中共黨軍關係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頁 41-42。

⁸⁰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 184-185。

⁸¹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彭德懷軍事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 495-496。

⁸² 蕭華，〈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建設的幾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 103-106。

⁸³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頁 193。

除受軍事系統的垂直領導外，也需受地方同級黨委的領導，⁸⁴具體的做法是各中央局及省級的黨委第一書記兼任同級的大軍區及省軍區的第一政委之職務，這一雙重領導的情況直到現今仍然存在。⁸⁵

藉由軍隊的黨委會組織、政委制以及地方黨委書記兼任軍隊政委的手法，中共將軍隊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並成為黨在各項事務的得力助手，如文革的進展造成天下大亂的局面，最終靠軍隊「三支兩軍」維持秩序；六四事件中藉由軍隊鎮壓學潮，解決中共政權的重大危機。



⁸⁴ 鍾延麟，〈中共軍方對大躍進運動之參與、活動及影響〉，宋永毅、丁抒編，《大躍進—大饑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與思辨》（香港：田園書屋，2009），頁 376。相關命令見於〈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地方黨委對軍隊的領導和密切地方黨委同軍隊關係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 252-254。

⁸⁵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2003）〉，政工網，2010 年 7 月 17 日，取自：
<http://www.allzg.com/n1541c136.aspx>。

第三章 邁向現代化、正規化時期 (1949-1957)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國軍雖在中國南方仍有殘存勢力，然而到1949年末，全中國只剩下西藏尚未被解放軍所佔領；¹此時蔣介石藉由解放軍尚未組織完善的海、空軍之機會，在台、澎、金、馬地區穩住陣腳，並企圖以此為跳板反攻大陸。

中共建立政權後，軍隊的任務從解放全中國，轉變為保衛人民和維護國家安全，故擺脫建軍以來的游擊氣息，改變以傳統步兵為主的戰鬥方式，是中共在軍事上面臨的首要課題。尤其1950年6月底韓戰爆發，美軍仁川登陸的成功致使戰局逆轉，最終讓毛澤東做出抗美援朝的決定。雖然中共成功將聯合國部隊逼回北緯38度以南，但與當時最現代化的美軍交手的結果，讓中共體認到加速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的腳步應該加快，才能面對西方國家的戰略挑戰。²是以在「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之後，解放軍一系列之現代化、正規化做法隨即展開。

第一節 建國初期的軍事建設

中共建國初期的軍事建設，目的在擺脫長期以來的游擊氣息，和各地區因地制宜的情況，而朝向現代化、正規化的方向進行改革。本節主要討論中共初期的軍事現代化的內容。

何為軍事現代化，劉伯承在1953年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曾給過這樣的定義：「現代就是我們現在這一時代。現代化的戰爭就是使用機器並加上帝國主義所叫囂的原子彈等來進行戰爭」。³從這段文字中可看出現代化的戰爭強調的是武器的使用，然而中共在國共內戰時期在武器裝備上遠落後國軍，即便藉由繳獲等方式獲得各種武器，然而在武器的質與量上均有所不足，更缺乏海、空軍等建制與裝備，直到建立政權後，在蘇聯的協助下，才慢慢地從單一步兵型轉變為諸軍兵種合成型軍隊。

¹ 徐焰，《六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頁25。

² 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臺北：新新聞文化，1997），頁32。

³ 劉伯承，《劉伯承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頁513。

壹、海、空軍及其它陸軍兵種的建立

一、籌建空軍

在現代戰爭中，空軍在其中佔有重要地位與作用，中共早在建軍初期，其有建立空軍的計劃，然而受限於財政、資源等限制，中共在建政前一直未建立空軍，在戰場上仍以步兵為主。⁴

1948 年底中共發起淮海戰役，國民黨部隊在華中地區的精銳大部被殲，此戰讓中共看到擊敗國民黨，「解放」全中國的前景，海、空軍等現代化軍種的建設刻不容緩。於是中共中央在 1949 年 1 月 8 日發出《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中特別指出：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我們應當爭取組成一支能夠使用的空軍。⁵尤其在國軍在大陸戰場失利，但在東南沿海島嶼與台灣重新站穩腳步，若要攻佔台灣，單憑步兵是不可能辦到的；同時 1950 年韓戰爆發，中國組成志願軍增援金日成政府，志願軍在朝鮮戰場的行動更需要空軍的配合，於是中共更加快空軍建設的腳步。

共軍空軍的建立，是在陸軍的基礎上建立起空軍的領導機關，在世界各國空軍史上是未有的經驗，也是因為中共在時空環境制約下必須採行的決定。共軍空軍領導機關由第四野戰軍第 14 兵團機關基礎上創建，由 14 兵團司令員劉亞樓擔任首位空軍司令員、蕭華為政委；其後在各個軍區內部成立空軍司令部，受軍委空軍與大軍區雙重領導。

在共軍空軍籌建之時，民主與共產兩大陣營即在朝鮮點燃戰火，中共以志願軍的名義投入這場戰爭之中，剛組建的空軍戰鬥團隊隨即進入朝鮮戰場上掩護陸軍的行動，因此共軍空軍的建設是在「邊打邊建」的情況下展開的。毛澤東對空軍的建軍方針有兩點看法：其一是建立空軍的目的在鞏固國防；其二空軍的建設計劃需配合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⁶

確立領導機構與建軍方針後，共軍空軍即著手組建航空兵部隊；從第一支航空兵—空軍第 4 混成旅組建完成後，1950 至 1951 年間，有大量的陸軍師、團部調撥空軍建制，一直到韓戰結束時，共軍空軍已建立了 28 個航空師、70 個航空兵團，擁有各類型飛機共 3 千餘架。⁷

⁴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史要》（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頁 152。

⁵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史要》，頁 152。

⁶ 楊貴華編著，《共和國軍隊回眸：重大事件決策和經過寫實》（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頁 36。

⁷ 楊貴華編著，《共和國軍隊回眸》，頁 46。

中共建國初期百廢待舉，加上與美國處於敵對狀態，這使得中共在外交、經濟、軍事等各方面都需仰賴蘇聯的支援；對於一無所悉的空軍，自然全仰仗蘇聯的支持。因此參照蘇聯模式，中共將國土防空與空中戰鬥兩者分離，成立防空軍與空軍兩個軍種。然而兩軍分屬不同系統，指揮上難以相互配合；⁸加上中共在1956年的第八次全國代表代會上決議減少軍費開支，支援國家經濟建設，⁹在這兩個因素下，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將防空軍與空軍合併，同時取消公安軍的建制，改建後的共軍為陸、海、空三個軍種。

二、創建海軍

共軍海軍的建立與空軍不同的地方，在於海軍的創建是先由地方軍區成立司令部機關，之後中央軍委才在軍委之下成立統一的海軍領導機關。於1949年1月華東軍區因接收國軍變節艦艇而最先成立海軍領導機構，由張愛萍任司令員兼政委。同年12月，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第12兵團司令員兼政委蕭勁光組建海軍領導機構，隔年任命其為共軍海軍司令員。¹⁰

蔣介石在三大戰役之後，鑑於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已日薄西山，遂開始有計劃地在台灣另起爐灶。隨著國軍兵敗如山倒，中共在1949年底已解放了中國全境，除西藏問題有待解決外，剩下的就是退守東南沿海島嶼及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因此要消滅國民黨軍隊，沒有海、空軍的配合是無法作戰的；古寧頭戰役失敗的一部份原因，即缺乏海軍的掩護，也讓建設海軍成為當務之急。但因為韓戰的爆發，為支援志願軍的行動，籌建空軍的重要性顯然大於海軍，在建國初期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海軍的建設被排到後面順位上。¹¹

對於海軍的建軍原則，中共內部的看法是相當歧異的。海軍艦艇研製需要高技術，材料也相當複雜，因此在初期以向蘇聯購買現成艦艇與技術轉移的方式是比較可行的做法，中共高層對此並無異議。然而就海軍發展方向上，海軍黨委的決定是以「空、潛、快」為主，而彭德懷則認為，海軍在航空兵的發展上應以夠用為主，潛艦跟快艇才是發展重點，之後林彪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後，仍沿續彭德懷的方針。¹²

雖然共軍海軍的建設過程受限於國家經費分配與技術的落後，但海軍仍以緩慢、穩健的腳步逐步發展，至1954年發動一江山島戰役前，已發展出一定規模的實力，中共成功解放一江山島，共軍海軍在其中扮演著關鍵性角色。共軍海軍的成長，從艦艇數量的增加上可看出一些端倪，從1955年作戰艦艇僅519艘，

⁸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9，第4版），頁501。

⁹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頁302。

¹⁰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史要》，頁185-188。

¹¹ 徐焰，《六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頁6。

¹²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頁52-54。

到了 1958 年時成長到 657 艘，即便是林彪上台後推行「政治第一」，但並未衝擊海軍的裝備生產、研發，共軍海軍艦艇的數量到了 1970 年時，已經成長到 1530 艘，並研發出導彈驅逐艦與核潛艇等高技術船艦。¹³

三、其它專業化兵種的建立

中共建國後，除建立海、空軍等新軍種外，傳統的陸軍也改變全都是步兵的型態，成立各專業兵種，由單一個步兵發展成為諸兵種合成的部隊。在陸軍之下，共可分成七大兵種，就總體來看，步兵的數量是不斷下降，而專業技術兵種數量則是不斷上升的。

共軍陸軍在中共建國後，一直到 1980 年代大裁軍前，共有步兵、砲兵、裝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鐵道兵、防化兵等七兵種所組成，步兵是陸軍中數量最多的兵種，然而其所佔比例是不斷下滑的，這是因為歷次大裁軍均以步兵作為最主要的裁撤對象，如 1950 年時，步兵數量佔陸軍的比例為 61%，但到了 1959 年時減少到 41%。¹⁴

砲兵、通信兵與工程兵是中共較早建立的陸軍兵種，早在紅軍創建之初即存在這三種兵種職能，然而受限於裝備限制，未能夠大規模發展，一直中共建國後才快速發展起來。因應韓戰的需要，砲兵是共軍陸軍在建國初期優先發展的兵種，並將大量的步兵師改建為砲兵部隊，並且經由蘇聯的幫助，解決原先共軍火炮多國且各式不一的情況，大量改換蘇式火炮；¹⁵通信在現代戰爭進行時的耳目，訊息傳遞的速度往往影響到一場戰役的勝負，是以共軍通信兵的地位是不斷提升的，從原先附屬於總參謀部作戰部的一個局，最後發展為總參謀部通信部，而其通信的有效性與隱蔽性也不斷增強。¹⁶因為戰爭的需要，工程兵一直是共軍的重要兵種，中共建國後其地位不僅未下滑，反而因為戰備考量與國防工程建設需要，工程兵部隊不斷擴編，1965 年時更達到 54 萬人，雖然之後的裁軍行動工程兵首當其衝，但在現代戰爭下工程兵仍有重要的功用存在。¹⁷

裝甲車與戰車在一次大戰時被投入戰場後，因其具速度、火力，一直到今日在世界各國的陸軍中仍扮演重要角色；中共建政前，限於裝備限制，裝甲兵部隊一直無法大量發展，直到建國後因軍隊現代化建設以及韓戰的需要，裝甲兵部隊的規模才逐漸擴大，共軍裝甲兵首任司令員許光達曾明確指出：「整個人民解放軍發展的方向是向機械化前進，以成為現代化的強大軍隊」、「當前我們的總任

¹³ 張蜀誠，〈中共海軍研究觀點探討〉，《展望與探索》（臺北），2010 年第 8 卷第 2 期，頁 64；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第 2 版），頁 333-336。

¹⁴ 楊貴華編著，《共和國軍隊回眸》，頁 59。

¹⁵ 陳錫聯，〈陳錫聯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第 2 版），頁 300-307。

¹⁶ 楊貴華編著，《共和國軍隊回眸》，頁 65-66。

¹⁷ 楊貴華編著，《共和國軍隊回眸》，頁 64-65。

務是要建立一支堅強的現代化的坦克部隊」。¹⁸即便在 1980 年代中共進行百萬大裁軍，裝甲兵司令部被縮編，但並未影響裝甲兵在共軍陸軍的地位，其突擊與強大攻擊能力仍是集團軍倚賴的力量。

鐵道兵與防化兵在共軍內部亦是屬於新興兵種。共軍進入東北後，因東北境內鐵路運輸發達，東北野戰軍根據戰場需要成立共軍第一支鐵道縱隊，中共建國後改將這支縱隊歸屬中央軍委指揮，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正式成為共軍內部一個兵種。¹⁹防化兵在共軍中更是個新興領域，雖然對日抗戰期間中共在共軍內部已有因應化學戰的訓練，但直到韓戰開始後，因美國可能對志願軍發動化學戰的疑慮，促使中共加強有關化學戰方面的知識與訓練，並成立防化兵部，成為共軍中的一個兵種。²⁰

貳、 建立國防工業體系

中共在建國後所進行軍事現代化步驟，即改變原先軍隊以步兵單一兵種的作戰型態，朝向諸軍兵種合成作戰的方式前進，因此在 1950 年代，共軍成立包括海、空軍與裝甲兵在內等新的軍兵種，向現代化方向前進。然而這些現代化軍隊的建立需要相應的武器裝備支援，因此國防工業體系的建立就相當重要。

中共建國初期的國防工業基礎相當薄弱，只能進行舊式武器裝備的修配與小規模的生產；然而中共投入韓戰後，為加速軍隊現代化的速度，以抗衡美軍在朝鮮戰場上的優勢，因此爭取老大哥蘇聯的幫助是相當重要的，當時共軍的現代化裝備，很大部份是靠進口和仿製蘇聯武器為主。

藉由先進武器的進口，是一個國家的軍隊能快速朝向現代化發展常見的做法。中共在建國後外交關係採取「一邊倒」的政策，加上投入韓戰的戰場是以「抗美援朝」作為口號，因此購置「蘇聯牌」武器成為共軍替換雜亂無章「萬國牌」武器首選。購置武器進行現代化當然快速、便利，但不僅會花費中共當時稀少的外匯，也不利於國防工業體系的建立，對於共軍現代化的長遠進程亦造成不良之影響，故要求蘇聯協助中共建立現代國防工業體系是中共進行軍事現代化的重要課題。1951 年 6 月，中共成立以周恩來為主任的中央兵工委員會，統籌武器發展業務，其中為確立兵工建設方針，該委員會於同年通過《關於兵工建設問題的

¹⁸ 郭洪祥，〈許光達大將關於裝甲兵部隊建設的理論與實踐〉，《軍事歷史》（北京），2009 年第 4 期，頁 66。

¹⁹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簡史》，下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 797。

²⁰ 楊貴華編著，《共和國軍隊回眸》，頁 67-68。

決定》，確立中共國防工業體系初期的發展是在蘇聯的幫助下，以仿製蘇聯武器為主的發展模式。²¹

中共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蘇聯總計援助中共 156 個工業項目，其中有 44 個項目與軍事有關，佔整體援助項目的 28%。而 44 個項目中，有關軍用飛機技術有 12 項、電子學相關技術 10 項、軍械與火炮相關技術 16 項、航太工業技術 2 項、船艦建造技術 4 項。²²

雖然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共的國防工業開始發展起來，然而史達林出於保持軍事領先技術與商業的考量，向中共移轉的軍事技術大體是較為落後的，且在移轉時間上有所拖延；但赫魯雪夫上台後，因內外因素的考量，開始向中國轉讓較先進的技術，比如說火箭筒，這讓中共國防工業發展取得長足的進步；而海軍艦艇與空軍戰機的研發與設計，在中蘇關係破裂前，中共在這兩者的生產、研製上亦依賴蘇聯的支持。因此，根據彭德懷軍事參謀的說法，「中共自主研製的武器只有個別項目起步，成品武器都是蘇製或仿蘇製的產品」。²³

除了常規武器與飛機、船艦外，導彈與核武器的發展亦是中共急於發展的重點，長期主管中共國防工業與科研工作的聶榮臻在其回憶錄寫道：

建國以後，……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大國已經實現現代化，進入所謂的「原子時代」與「噴氣時代」。我們已經有了抗美援朝戰爭的感受，技術裝備落後，使我們吃了虧。……為了擺脫被動局面，我們就得儘快地前進，這就需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²⁴

因此，在 1950 年代中期以後，核武器與導彈的研究成為中共的國防工業發展重點之一。研製「兩彈」的成功關鍵在於爭取蘇聯的幫助，1957 年 10 月，中共與蘇聯就火箭等技術援助部份達成協議（即《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²⁵其次，設置專門機構，如在國防部之下，成立第五研究院，以錢學森為院長，在航空委員會下負責導彈的研究、設計與試製工作。²⁶之後中共為集中力量、減少國防科技工作領導機構的重複並加強對國防科學研究工作單位的領導，統整國防部第五部、航空委員會以及總參謀部裝備計劃部等有關國防科研的部門，成立以聶榮臻為主任的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簡稱國防科委），並成立若干研究機構，如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簡稱

²¹ 黃永松，〈中共同防科技工業發展與前瞻〉，中共研究雜誌社、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中共建政暨兩岸分治 60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法務部調查局，2009），頁 383。

²² You Ji, *The Soviet Model and the Breakdown of the Military Alliance*, in Thomas P. Bernstein & Hua-yu Li, eds.,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0), p. 134.

²³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頁 67-100。

²⁴ 聶榮臻，《聶榮臻元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頁 609。

²⁵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 26-28。

²⁶ 黃永松，〈中共同防科技工業發展與前瞻〉，頁 385。

五院，研發導彈）、第六研究院（簡稱六院，研發軍用飛機）、第七研究院（簡稱七院，研發軍用艦艇）、第十研究院（簡稱十院，研發無線電設備）、國務院第三機械部九局（之後改稱二機部九局，主攻核武器研究）等組織，中共的國防工業體系，開始朝向分工細緻化發展。²⁷

建立一個完善國防工業體系是中共冀望的目標，然而國防工業投資金額大且需經相當長的研發時間才有收穫，並且有相當高的失敗風險；加上中共建國之初，資金有限而百廢待舉，勢必要有計劃的運用其有限資源。從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的文章到 1956 年的中共八大，所提倡的是合理化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並且壓低軍政經費佔全國預算費用；周恩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 1957 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中強調應當把國防工業步子放慢，加強冶金、機械與化學等基礎工業的建設，為國防工業的發展打好基礎。²⁸也因為這些基礎穩固之後，中共在 1960、70 年代在導彈、核武器、船艦與戰機等先進武器的研製上才有了突破性發展。

參、統一對軍隊建設方針與任務的認識

一、會議的共識

中共建國後，在軍事方面即努力朝向現代化、正規化的方向前進；韓戰的爆發加速共軍武器現代化的進程，但畢竟處於戰爭時間，解放軍的現代化、正規化方針仍會受到限制。等到 1953 年，韓戰已簽署停戰協議，加上中共此時正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展開建國後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在內外形勢有了重大變化的情況下，為統一全軍高級幹部對軍隊建設方針與任務的認識，解決軍隊建設產生的問題並提出新的國防戰略與軍事工作，因此在 1953 年 12 月 7 日到 1954 年 1 月 26 日，在北京召開「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簡稱全軍高幹會），總結 1949 到 1953 年這 4 年間的軍事工作，並做出軍事建設重大決策。²⁹

「全軍高幹會」通過的軍事建設的重大決策，彭德懷在會後的總結上提出四個重點：明確軍事建設的總方針與總任務；明確建設現代化軍隊的道路；解決現代化軍隊建設的若干問題，而其軍隊建設中長期的、經常的中心工作是訓練部

²⁷ 吳遠平等著，《新中國國防科技體系的形成與發展研究》（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6），頁 19-22。

²⁸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 236。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所做的報告，在收錄選集之後改篇名為《經濟建設的幾個分針性問題》。

²⁹ 林蘊暉等著，《凱歌行進的時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 343。

隊，特別是訓練幹部。³⁰除了上述幾點外，該會議也就軍隊組織、編制與各機構間的工作職責等問題進行研究，並做出相關規定。³¹

二、具體行動

中共的軍事建設總方針及總任務，即在建立一支世界最優良的現代化革命軍隊，以此達成保衛中共的社會主義建設並防禦帝國主義侵略之任務。在這條總路線下，進行裁軍行動，以節約軍費開支用來經濟建設；同時追求國防現代化，以 5 到 10 年的時間武器裝備現代化的工作。³²

關於軍隊建設問題，部隊的訓練工作，主要分成軍事、政治、文化教育三個部份，其比例為 6:2:2 的方式來進行調配；至於幹部的訓練部份則為加強建設院校工作，並強調「五統四性」³³以及確立「三大制度」（詳見第二節）；認為健全的司令機關是指揮現代戰爭的重要環節，也注意到完善的後勤制度在現代戰爭中佔有重要的角色，這兩者間的人材與架構應該加以充實；但在加強司令、後勤機關的同時，也重申中共建軍以來的傳統，即黨對軍的絕對領導以及政治工作，因此，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再一次被強調；最後，中共建國初期採取「一邊倒」政策，在各方面均以蘇聯為學習榜樣，但經過幾年下來，發現全盤向蘇聯學習的結果出現不少問題，因此前述的「全軍高幹會」強調對於蘇軍的先進經驗都學到手，然而對於共軍的光榮傳統也應繼續發揚，不可偏廢，雖然「全軍高幹會」為學習蘇聯的方式立下基調，但在執行過程中仍不斷出現問題，加上蘇聯內部秘密報告問題、中蘇關係出現變化，造成 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時就學習蘇聯產生的教條主義部份展開批判，也讓共軍的建軍路線出現變動。³⁴

「全軍高幹會」除了對有關軍隊內部的訓練、學習，以及黨軍關係等內在的部份做出明確的解釋外，在外在的部份，即軍隊組織機構，也進行精簡整編等措施，以利於軍隊現代化進行。

在組織部份，1949 年建國時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被撤銷；根據 1954 年通過的憲法規定，全國武裝力量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另成立國防委員會，雖仍將非黨人士張治中等人列入委員會名單中，但該委員會

³⁰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彭德懷軍事文選》，頁 498-499。

³¹ 徐焰，《六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頁 129。

³²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頁 297。

³³ 目前解放軍將領的相關回憶錄在討論建國初期的軍事現代化、正規化都會提到「五統四性」原則，該概念起源於毛澤東給軍事學院的訓詞。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選》，頁 357-358。「五統」意指統一的編制、統一的制度、統一的指揮、統一的紀律、統一的訓練；「四性」指的是組織性、計劃性、準確性、紀律性。

³⁴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頁 297-298。

為諮詢機構不具實質權力。³⁵為體現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中共決定在黨內成立中央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將原先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下設的實際業務單位移轉至中央軍委之下，而中央軍委下設的四個領導部門，分別為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幹部部、總後勤部，之後在學習蘇聯的口號下，以蘇軍領導機構為藍本，再增設四個部門，分別為訓練總監部、總軍械部、武裝力量監察部、總財務部，形成與蘇軍一致的八總部體制。然而 1956 年後，中共針對全盤蘇化的模式進行反思，也對軍隊管理體制是否需要八總部的管理架構進行思考，其後將總財務部和總軍械部併入總後勤部、總幹部部併入總政治部、而武裝力量監察部及訓練總監部則遭到撤銷，回歸共軍原先的三總部體制。³⁶

中共在 1954 年通過的憲法所成立國務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行政機關，而底下成立各種專門部會以便專業事務運作，其中也成立國防部，雖然在《關於成立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中規定：「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和軍事委員會有關軍事工作的決定，可用軍事委員會（簡稱軍委）的名義由內部系統下達，其須公開發佈的命令和指示，則用國務院或國防部的名義下達」，然而就國防部與總參謀部等中央軍委下管部會之間的關係則未做出規範，而國防部與各部之間的權責劃分亦不明確，哪些要以國防部的名義發佈，哪些不用，又沒有明確的規定。於是，總參為中央軍委起草的和總參本身下發的命令、文電，就常因署名問題而受到指責；之後粟裕要求制定國防部與總參職責條令，被指為是「向國防部要權」，這就造成在 1958 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除針對蕭克等人的「教條主義」進行批判外，也將矛頭指向時任總參謀長的粟裕，最終導致粟裕被免除總參謀長職務，³⁷繼任的總參謀長為協助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多年的黃克誠。

也因此有文獻指出，這場鬥爭並非是職權的衝突，主要是不同派系間的黨內衝突所致；³⁸因為這場衝突，1958 年的軍委擴大會議將國防部的角色做出解釋：「國防部是軍委對外的名義。軍委決定的事項，凡需經國務院批准，或需用行政名義下達的，由國防部長簽署，以解決這一混沌不明的情況」。³⁹然而這樣的矛盾還是存在，只是主角換成林彪與羅瑞卿。而現今中共國防部在中共軍事體系中，扮演著象徵性意義的角色，實際軍事工作均由中央軍委會所屬單位承擔，其職權僅有主要針對對外軍事交往及部分管理全國武裝力量建設工作，⁴⁰因此國防部和總參謀部之間在職權的糾紛上已不若以往。

³⁵ 張嘉中，《權力鬥爭與軍人的政治角色：1949-1973 年的中國》（台北：揚智文化，2008），頁 89-90。

³⁶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頁 300。

³⁷ 佚名，〈粟裕與陳毅、聶榮臻、彭德懷的分歧與誤會始末〉，《報刊薈萃》（西安），2009 年第 5 期，頁 20。

³⁸ 王志嵩，〈中共中央軍委會變遷之研究（1949-1976）〉（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2006），頁 75。

³⁹ 張萬年主編，《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頁 213-214。

⁴⁰ 蔡和順，〈象徵性軍事領導機構—國防部〉，《幼獅文化》，2010 年 9 月 24 日，取自：<http://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1001/m980218-r.htm>。

「全軍高幹會」也對地方軍事層級的建制做出調整的決定，基於作戰的對象、地形、與減少指揮層級的需要，同時為抑制地方軍頭勢力，將建國初期的 6 大軍區改為 12 個大軍區，之後台海局勢逐漸緊繃，最靠近前線的福建從南京軍區獨立出來，在 1956 年成立了福州軍區，使大軍區建制達到 13 個；而軍事指揮層級從四級軍區體制調整為大軍區、省軍區和軍分區三級軍區體制，地方軍區的司令員不再領導地方黨組織與政府，同時地方黨委的第一書記則兼所屬軍區的第一政委，體現「黨指揮槍」的原則。⁴¹

從中共建國初期一連串在軍、兵種上的改革，以及極力爭取蘇聯協助的態度，可得知軍事現代化是中共在建國後致力朝向的目標，而這個目標雖然屢次被簡化為以物質裝備主義，而林彪在主掌軍委日常工作後也宣稱「思想工作第一」，強調思想的力量大於物質力量，⁴²但解放軍現代化的腳步始終未長期停滯下來，導彈、核武器，核潛艇等現代化武器的研究也在 1960 年代之後開出花朵。

第二節 軍隊正規化與四大制度確立

現代化的武器裝備，但缺乏正統的訓練，仍然無法發揮武器的威力；而中共建國前在中國各地進行游擊戰，因為各地區戰情的不同，也因為戰爭的緣故，中共中央無法全盤指揮各地的情況。但是建國後軍事現代化的開展，需要有正式的規格化訓練做支持；同時指揮權限也應該統合在中共中央之下，劉伯承便提出，正規化的內容必須有：「統一的編制、統一的制度、統一的指揮、統一的紀律、統一的訓練」，⁴³因此建國後指揮軍隊全責在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並且建立各級軍事學校，加強對軍事幹部的訓練，同時確立三大制度與頒佈共同條令，以達成軍隊正規化的目標。

壹、 建立主管訓練機關

中共建軍以後，基本上在各地解放軍因應軍事的需要，在其根據地均有設置紅軍學校、軍政大學、抗日大學等學校進行幹部培養，然而因為根據地分佈四處故訓練方法未有統一標準；在士兵訓練的部份更缺乏統一的模式，由各地解放軍因其需要進行訓練。但中共建國後為加強中央的領導，在中央軍委下設置對全軍軍事訓練負全責的機構是刻不容緩的事。

⁴¹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頁 300-301。

⁴²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 231-233。

⁴³ 劉伯承，《劉伯承軍事文選》，頁 513-514。

對於世界各國普遍在軍隊內部建有軍訓部門，加上建國後大規模作戰任務也會減少，軍隊應轉以訓練為主，因此設置一個統管全軍軍事訓練的部門是當時解放軍內部高層的共識，於是自 1920 年代就開始投入軍事訓練的蕭克為首任軍訓部部長，軍訓部成立的任務在加強軍事訓練工作，讓軍隊現代化、正規化的工作能夠順利推展。所以軍訓部成立後的工作，主要有三點：首先是制定全軍軍事訓練計劃；其次是組織編寫條令條例；最後為籌備組建陸軍大學，⁴⁴在初期軍訓部內共設有訓練局、軍校局、⁴⁵出版局與高級研究室。

隨後，蘇聯顧問的建議加上對於開展現代化、正規化軍隊訓練的重視，1954 年 11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決定成立訓練總監部，統管全軍的軍事訓練。1955 年 5 月，軍委成立了與總參謀部平行，以總參軍訓部、軍校管理部、軍事出版局為基礎的訓練總監部。其領導人層級之高，蘇方顧問之多，都證明了訓總在共軍內所佔的份量。⁴⁶但之後中共開始反思全面學習蘇聯所產生的弊端，對於學習蘇聯過程中產生的「教條主義」展開批判，也讓 1958 年的軍委擴大會議變成反教條主義會議，訓總在這場會議上被指責為教條主義的司令部，因此該會議最後通過《關於改變組織體制的決議（草案）》，將訓總的軍事訓練職能劃歸總參謀部，軍事條令編寫工作則歸軍事科學院職掌。⁴⁷

貳、 建立軍事院校體系

現代化的武器運用與正規化的教育訓練兩者之間息息相關，雖然解放軍在與國民黨及美國的手中體會到何謂現代化的戰爭，但大多數的解放軍將領受限於學識的不足，對於現代化戰爭無法有完整理解，因此創辦一系列正規的軍事院校是中共高層內部的共識。

軍事學院創建於 1950 年 10 月，是中共當時的最高軍事學府，因位於南京，又稱為南京軍事學院；軍訓部原先將該學校命名為陸軍大學，但軍事學院除了高級速成系、上級速成系、基本系外，還包含海、空、裝甲、防化等新軍兵種專業系，所以劉伯承建議將這一個綜合性高等軍事學府命名為軍事學院，⁴⁸之後解放軍高階將領或先或後地進入該校進行深造，如陳錫聯、楊得志、許世友、陳再道、

⁴⁴ 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頁 414-416。

⁴⁵ 軍校局後來在蘇聯顧問的強烈要求下，於 1952 年 12 月獨立出來，作為管理全軍院校的最高部門，由張宗遜兼任部長，可以看出中共建國初期蘇聯顧問對於中共的影響力。但全盤照搬蘇聯模式用於中國上仍引起相當的討論。在彭德懷與蘇聯顧問討論、協商後，軍事訓練工作與軍校管理由訓練總監部職掌。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頁 170-174。

⁴⁶ 孟東，〈軍委訓練總監部的建立與撤銷〉，《黨史博覽》（鄭州），2002 年第 10 期，頁 49。層級高是因為訓總部長由劉伯承擔任，因其身體狀況不佳並事務繁重，遂由同為元帥的葉劍英代理部長職務，而訓總轄下的二級部的部長有蕭克、李達、張宗遜、彭紹輝、周士第、郭天民等六人均為上將，形成了「1 名元帥掛帥、6 名上將輔佐的格局」。

⁴⁷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頁 701。

⁴⁸ 舒雲，〈劉伯承和南京軍事學院〉，《黨史博覽》（北京），2001 年第 6 期，頁 13。

楊勇等人都曾到該校學習過，顯示出軍事學院在共軍高層中的份量與在軍事教育中的崇高地位。在向蘇聯學習的方針下，軍事學院的教學模式與教材大抵承襲蘇聯，這種照搬照抄的情況是中共進行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快速做法，雖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出現中、蘇國情不同而有「水土不服」的情況出現，最終導致 1958 年的「反教條主義」風波。

除了培養現代戰爭所需的指戰員外，現代戰爭大量依賴各種機械化的裝備，各式的裝備維修、保養都須仰賴專業的技術，韓戰開始後蘇聯大量向中共提供各種先進蘇式裝備，但共軍在裝備使用與維護方面，均有相當大的問題而無法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故聶榮臻與粟裕便向軍委提出設立一所專門培養軍事工程技術幹部的學校，加上史達林的支持，最後由毛澤東拍板定案，在物質條件和自然地位佔優勢的哈爾濱成立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由陳賡擔任首任院長兼政委。⁴⁹中共建國初期大量倚靠蘇聯的支持，現代戰爭所需的先進科學與技術知識，更是中共所欠缺的，毛澤東在給軍事工程學院的訓詞中，更指出：

向蘇聯學習，這是我們建軍史上的優良傳統，無論任何時候，任何工作部門，都應當如此。這點，對於你們這個學院，有更加重要的意義。我們必須學習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知識，……在學習上應該是虛心誠懇，不要學到一點就自滿和驕傲」。⁵⁰

是以學院內部的行政編制、各學科各專業的規劃與課程設計，都有濃厚的蘇式風格。

除了這兩所相當具有代表性的軍校外，共軍陸陸續續建立了一系列不同性質的軍事院校，如總高級步校、政治學院、後勤學院與各軍、兵種直屬學校，培養相關知識與技能人材。根據統計，1950 年中共全軍院校共有 96 所；到了 1950 年代末軍校數量共到達 115 所，其中指揮學校 55 所、政治學校 5 所、技術學校 27 所、醫務學校 8 所、飛行學校 15 所、預備學校 5 所，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軍事院校體系。⁵¹

參、編寫軍事條令與教育訓練

嚴格的軍事條令，是現代戰爭所需要的，也是現代化軍隊的標記之一；共軍內部雖然在 1930 年代即有相關的條令規定，但各個根據地間都依據其需要而頒行自己的條令，在規定上不統一，因應戰爭的需要，這情況是可以理解的，但中

⁴⁹ 趙陽輝，〈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籌建與蘇聯援助〉，《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哈爾濱），2006 年第 8 卷第 5 期，頁 1-3。

⁵⁰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選》（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1），頁 361。

⁵¹ 蘇士甲，《中國人民解放軍院校發展史》（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1），頁 511-512。

共建國後，解放軍高層了解到軍隊內部素質低落、組織性與紀律性差的情況是阻礙軍隊走向現代化、正規化的因素，因此在各種場合不斷宣揚要加強軍隊的「五統四性」、擺脫軍隊的游擊氣息。要貫徹軍隊的「五統四性」，嚴格遵守和執行軍事條令是必須的。

編寫軍事條令的權責在總參謀部軍訓部，軍事條令是個綜合性的稱呼，是由共同條令（包含內務條令、紀律條令、隊列條令）與戰鬥條令所組成，彭德懷稱軍事條令的功能在：

共同條令是建立我軍正規生活、鞏固軍隊紀律，保證部隊訓練的根本法典。貫徹執行共同條令，是我軍走向正規化的重要關鍵。各兵種戰鬥條令是平時訓練軍隊的基本指導原則，也是戰時組織與實施戰鬥的基本依據。

52

共軍的軍事條令的編寫，自然是以蘇聯現有條令為藍本，這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學習、仿效蘇聯模式到何種程度，共軍高層在當時並未有統一的認識。1951年2月，共軍總參謀部下發內務、紀律、隊列三個條令的草案，讓共軍在教育訓練、制度上有了統一的準則，對於軍隊走向現代化、正規化的道路當然有所助益。⁵³然而草案的內容尚保留政治委員、政治工作制度，這與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推展的軍隊「一長制」有所抵觸，成為了蘇聯駐華顧問與解放軍高層的爭論點。

共同條令草案頒佈兩年後，1953年3月在彭德懷的主持下，共軍就條令草案施行兩年以來的經驗與所碰到的問題開始進行修訂工作，是否保留政治委員制、政治工作制度的問題又被提出來討論，蘇聯顧問不斷的游說與蘇軍「一長制」推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面事例，讓當時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態度有所鬆動，開始有計劃地推動軍隊「一長制」。在軍訓部長蕭克、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的支持下，共同條令被有意識朝「一長制」的方向做修正，如彭德懷在內務條令中，有關營與連兩級的有關首長規定，營政治教導員與連政治指導員的首長地位被刪除，突顯營、連長的指揮地位，並將這份稿件帶入軍委會會議中討論；另外彭德懷決定推行以軍事首長作為單一首長的「一長制」，這勢必牽動政工人員的職責，然而中共當時決定在1953年6月開展正規軍訓，已無時間在內務條令中修正團、營、連之政工人員職責，所以彭德懷決定在《政治工作條例》中再規定政工人員的職責。⁵⁴但條令朝向一長制修正給解放軍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亂，對於中共建軍以來的政治工作制度有可能在學習蘇聯的浪潮下被棄置，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認為有需要釐清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與政工制度的關係。

⁵²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頁175-176。

⁵³ 蕭克，《蕭克回憶錄》，頁422。

⁵⁴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頁185-187。

羅榮桓早在 1951 年的政治工作綜合報告中提出：「要注意克服片面強調正規化，削弱政治工作的傾向」。1953 年 5 月頒佈修正過的內務條令草案未列及政工人員的相關職權，引發解放軍政工人員的騷動，面臨中共建軍以來的「光榮傳統」遭受到挑戰，羅榮桓趁彭德懷來探訪之際，表示其對政治工作制度的看法：

現在有些同志認為政治工作制度過時了，政治委員作用不大了，要學習蘇聯，搞一長制。如果那樣做，從井岡山時期就搞起來的政治工作傳統不就丟掉了嗎？我是搞政治工作的，不是怕取消政治工作我沒事幹了。這不是個人的問題，是黨的工作問題。⁵⁵

彭德懷相當重視羅榮桓的意見，在與其他軍內高幹進行磋商後，彭德懷放棄「一長制」的做法，朝「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修正。當時協助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黃克誠表示「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代表著司令員和政委有分工之別，無上下之差，共軍的政治工作具有優良的傳統與寶貴經驗，不應當全盤棄置。⁵⁶

因此在 1953 年底舉行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彭德懷在報告中明確「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的原則，作為隔（1954）年修正《政治工作條例》草案的依據。新修正的《政治工作條例》草案除了黨委在軍隊的領導作用外，也將政治工作形容為解放軍「生命線」，然而在學習蘇聯的影響下，中共建軍以來即存在、代表軍內三大民主的革命軍人委員會遭到取消，一直到 1960 年 10 月林彪上台後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革命軍人委員會才被恢復。⁵⁷而全軍高幹會上雖取得「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的共識，但解放軍內部有關「一長制」的呼聲沒有間斷過，也成為 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上批判軍隊內部教條主義的一個重點。

軍事條令的確定是為了後續開展的軍事訓練做準備，1950 年中共基本肅清內部的土匪與國民黨殘餘勢力後，計劃在 1951 年進行軍事正規化的訓練；考慮到共軍內部以農、工階級為骨幹，文化程度低、文盲多，因此學習文化也是 1951 年解放軍訓練重點。但 1950 年 10 月中共決定派兵參與韓戰後，軍訓重點改為戰備訓練。直到 1951 年 11 月，鑑於朝鮮半島局勢緩和，加上共軍要進行現代化，文化水準是一項關鍵，接替周恩來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認為 1952 年的軍訓應以文化教育為主，並取得周恩來、朱德等人支持，於是 11 月底中央軍委頒佈《關於 1952 年軍隊訓練的批示》，文化教育成為訓練的重心，軍事、政治、文化三者的比重為 3：2：5；1953 年中共開始正規軍訓後其比重才轉為 6：2：2。⁵⁸

⁵⁵ 劉漢，《羅榮桓元帥》（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頁 841。

⁵⁶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頁 245。

⁵⁷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頁 193-196。

⁵⁸ 李德、舒雲編著，《林彪日記》，下冊，頁 683。

肆、四大制度的實行

解放軍推行正規化的另外一項重大措施是施行三大制度，即施行義務兵役制、軍銜制、薪金制，有些學者則再加上勳章獎章制度，統稱為四大制度。

中共在於 1949 年建國之後，即開始醞釀施行四大制度，其中在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中通過的《共同綱領》即提到「準備在適當時機實行義務兵役制」；之後彭德懷在朝鮮戰場上，感受到軍官缺乏軍銜的不便，認為「職務識別，在目前的戰鬥中已感必要」。⁵⁹1953 年底召開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在總結中共建國以來的軍事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了四大制度實行的必要性與功能性。

1953 年中共成立分別以聶榮臻為主任的軍銜實施委員會及兵役法委員會、黃克誠為主任的薪金委員會、張宗遜為主任的勳章條例委員會，以推動四大制度。就兵役制度而言，準備由志願役朝向義務役過渡，除可以保持戰時後備軍力、提供穩定的兵源外，也避免了職業軍人所帶來的前途、婚姻與家庭問題，因此雖然毛澤東對義務役的施行有所疑慮，但最終在 1955 年仍簽署頒佈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兵役法》。⁶⁰

中共在建國之前，其黨內幹部的生活主要靠供給制，保證幹部的日常生活最低所需，這是在艱困的戰爭下不得不採取的制度；然而建國後財源已有所確保，加上大量幹部無法靠著供給制維持家庭所需，因此供給制逐漸轉變為薪金制，根據不同的級別，發給不同的工資。薪金制的施行對改善軍隊幹部的生活有所助益，但這種薪金的發放容易與資本主義劃上等號，毛澤東便多次對推行資產階級法權的薪金制度感到憂慮，雖然恢復供給制有其客觀上困難，但削弱、限制薪金制的發展成為毛澤東對抗視為資產階級法權的做法。⁶¹

至於勳章獎章制度，中共在蘇區時代已有對軍事上有功之人員頒授勳章的例子，只是並未建立相關的法規。中共建國後，為獎勵在戰爭中建功的幹部與士兵，頒發勳章的制度就被列為工作重點。彭德懷在 1953 年給毛澤東的一份報告就提到頒行動章獎章的建議。原先勳章條例要在 1953 年通過實行，然而考慮到軍隊組織編制、兵役法尚未通過，因此勳章的頒授一直到 1955 年才施行；1954 年的憲法主要將勳章獎章分為三種：八一勳章與八一獎章、獨立自由勳章與獨立自由獎章、解放勳章與解放獎章，分別授給在紅軍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與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戰爭有功的人員。⁶²雖然毛澤東對於頒授勳章獎章的做法頗有微詞，

⁵⁹ 楊貴華編著，《共和國軍隊回眸：重大事件決策和經過寫實》，頁 104。

⁶⁰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頁 147-150；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史要》，頁 370-371。

⁶¹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頁 150-157。

⁶² 徐平，《新中國首次軍銜制實錄》（北京：金城出版社，2007，第二版），頁 145-147。

如 1958 年在北戴河會議上說：「靠物質獎勵，重賞重罰過多，是不行的，我們今後不要發什麼勳章了」。⁶³然而勳章的頒佈是對有功人員的表彰，是一種「歷史總結性獎勵」，當時參與評定授勳相關法規與評定軍銜的總幹部部第一副部長宋任窮認為，授勳制度能「鼓勵廣大軍隊幹部的上進心，激發他們榮譽感和責任感，以至於推動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都有重要的作用」。⁶⁴

軍銜制的推動，是推動四大制度中最困難的，因為軍銜的評定涉及個人在黨與軍隊中的地位，軍銜的高低亦牽動著薪金分配及勳章的授與，因此評定軍銜的過程需相當慎重，宋任窮在其回憶錄提到評定軍銜須注意到各種方方面面：

當時在掌握評銜制度標準方面，除了依據現任職務、政治品質、業務能力、在軍隊服務的經歷和對革命事業的貢獻之外，還適當照顧到各個方面軍幹部的相對平衡，照顧到少數民族幹部和起義將領，同時還要考慮到已在地方工作的幹部與軍隊有歷史聯繫或某一地區有聯繫的代表人物的授銜問題。⁶⁵

從宋任窮回憶錄的字裡行間可看出評定軍銜的工作是如此繁雜，即便中共建國初期軍隊高層對於軍隊建立等級制度早有共識，⁶⁶但一直到解放軍正式施行軍銜制，中間隔了將近 6 年的時間，而軍隊的等級制度也是一步步建立起來。在進行評銜之前，中共首先進行評級的工作，原先預定於 1951 年完成，然而因為要在「思想、組織上做更多的準備」，因此延至 1952 年才進行。根據 1952 年軍委頒佈的《評定各級幹部等級指示》，軍隊幹部的級別從最高的軍委主席級到最低的副排級，共分為 9 等 21 級，評級工作的完成，為 1955 年的評定軍銜的工作立下基礎。⁶⁷

1955 年 1 月，中共中央軍委公布《關於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並在同年 2 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為評定軍銜確立法律基礎與標準。經過近 10 個月準備，考慮到各種不同的狀況，最終確立自元帥以下，4 等 15 級的軍銜制度，士兵軍銜則分為 2 等 5 級。⁶⁸軍銜制度的確立，有

⁶³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頁 164。

⁶⁴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頁 325。

⁶⁵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頁 322-323。

⁶⁶ 如朱德在 1950 年總幹部管理部會議上即強調，要建立層層節制的幹部管理制度，部隊的三等九級的等級制也必須建立。吳殿堯主編，《朱德年譜》（新編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 1388-1389。

⁶⁷ 徐平，《新中國首次軍銜制實錄》，頁 24-25。9 等 21 級分別為：軍委主席、副主席、總司令級；大軍區司令員、政委級，軍委委員級；正兵團級，副兵團級，準兵團級；正軍級，副軍級，準軍級；正師級，副師級，準師級；正團級，副團級，準團級；正營級，副營級；正連級，副連級；正排級，副排級。

⁶⁸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圖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479。軍官軍銜有 4 等 15 級，1955 年初次授銜時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元帥（毛澤東未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0 人）；大將（10 人）、上將（55 人）、中將（175 人），少將（800 人）；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準尉。士兵軍銜則有 2 等 5 級：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

助於加強部隊的組織性與紀律性、便於識別以利於軍事指揮，對於發展現代化、正規化的軍隊是相當重要的。然而並非所有解放軍將領都全盤接受軍銜制度，有些人認為自己的軍銜被評低了；有些人甚至認為軍銜的施行是照搬蘇聯經驗的結果，其在軍隊中實行等級制度不符合中共建軍以來的傳統，軍階是資產階級法權的展現。是以 1965 年，中共取消了施行 10 年的軍銜制度。⁶⁹

軍事現代化、正規化是中共建國後致力達成的目標，然而受限於經驗、技術的落後，「向蘇聯學習」是必然且唯一的選擇。武器統一改用蘇式裝備、透過合作、轉移的方式從蘇聯手中習得較為先進的工業技術，這些作法既不影響中國傳統思維，也有利於現代化的開展，受到的阻力較小。然而追求正規化無可避免需要各項正規制度、條令與完整的軍事體系架構，這些是解放軍所欠缺的，向蘇聯學習可以省去其中摸索的過程，加快正規化的速度；然而畢竟蘇聯與中國在國情及事物認識上是有些差距的，且經過 20 餘年的發展，解放軍也找出一些可行且行之多年的經驗，這些經驗一碰撞到蘇聯模式，雙方的矛盾、衝突便顯露出來。在中共「以我為主」的思維與中蘇關係惡化下，建國初期向蘇聯學來的制度、條令，後來不是被廢止，便是被解放軍傳統形成的條令規章所取代。

第三節 內外環境對中共軍事路線的影響

建國初期中共的軍事路線以現代化、正規化為主軸，大量地學習蘇聯經驗，以加速軍隊的現代化、正規化。然而在解放軍追求現代化、正規化的過程中，並非是一帆風順的，在這過程之中它不斷受到來自黨內外的因素所干擾，特別是來自蘇聯的各項制度，更是備受質疑；但基本上在 1958 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召開前，向蘇聯學習仍是主要的建軍路線，在細節部份，則因為內外環境的變化，而對軍事方針與政策造成影響。

壹、 國內因素的影響

中共自建軍後，毛澤東藉「三灣改編」的過程確立了「以黨領軍」的原則，而 1929 年召開的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更強化了「黨指揮槍」的原則。然而由於中共是經歷革命戰爭洗禮才取得政權的，這也造成在其建國後軍隊一直是左右中共政權的重要因素；反過來說，「以黨領軍」、「黨指揮槍」的原則，代表著解放軍內部的領導具有「雙重菁英身份」，即解放軍的

⁶⁹ 徐平，《新中國首次軍銜制實錄》，頁 197-200。

高階將領同時在中共黨內具有崇高地位，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即認為中共黨軍關係是一種緊密的結合。⁷⁰正因為黨和軍隊的密不可分，這兩個分析單位易相互影響，黨或國家在路線或政策上的變動會影響到軍事路線的變化。

中共建國後，雖然致力於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然而中共建軍以來的一些傳統也未隨著追求現代化、正規化而被揚棄，反而藉由各種正式決議或法律方式而加以強化。如前面提到，中共追求軍事現代化、正規化過程主要是根據蘇聯經驗做法，但是否向蘇軍所施行的「一長制」看齊，這在中共高層內部引發激烈的討論，在羅榮桓的堅持下，最終改變了主管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的看法，以至於中共還是決定在軍隊內部保留黨委制與政治委員制。從這例子可以看出 1950 年代初期的中共雖大舉向蘇聯學習，然而因涉及解放軍自建軍以來「光榮傳統」的存廢問題，黨的意見就改變了原先所決定的建軍方向。

除了放棄學習「一長制」外，「四大制度」作為正規化重要具體內容，雖然並未如「一長制」被否定而在 1955 年開始施行，然而從決定這些制度到正式施行，經過近 5 年的醞釀，這也許是因為中共並未有過施行這些制度的經驗，需要一些時間進行磨合與達成思想上的統一，但也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當時中共在政治與經濟方面出現問題，導致「四大制度」的施行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擾。⁷¹

經濟問題是指中共在 1953 年出現重大財政赤字，以及推行新稅制卻衍生出物價飆漲的問題。中共在 1953 年出現巨額的財政赤字，這起因於 1953 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造成政府預算大幅提升，然而 1953 年的財政收入並沒增加，這就出現財政缺口；然後中共將已貸出去的信貸資金也列為可支配資金，讓預算赤字更加擴大，粗估大約有 21.5 萬億（舊幣）的赤字。⁷²另外新稅制造成的混亂也不容忽視。時任中財委副主任、財政部長的薄一波為保證國家稅收及簡化稅制，進行中共建國後第一次的稅制修正，然而這卻引發了物價波動、搶購商品以及私商觀望等現象。⁷³由於中共要多花心力在解決這兩件事情所引發的經濟混亂情況，勢必延宕薪金制的推行進度。

政治問題指的是高崗事件，這是中共建國初期第一次的政治鬥爭，也是一場中共中央高層的權力角力，雖然如同鄧小平所言，高崗事件並未如之後的中共黨內鬥爭有牽連面過廣的問題，然而因為高崗位居高位，檯面下活動亦相當積極，事件的發生對於中共的黨、政、軍均造成一定影響，這場政治風波雖然在中共七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而暫時平息，但之後幾次的黨內鬥爭仍被提及而餘波盪漾。高崗事件的過程因第二章已做整理本節就不多

⁷⁰ David Shambaugh,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in China: 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7, Special Issue: The Individual and State in China, September 1991, pp. 532-533.

⁷¹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頁 152-153。

⁷² 陳大蒙、劉史，《落井下石—重審高崗案》（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第 2 版），頁 112-113。

⁷³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 163-165。

贅述，在試圖扳倒劉少奇與周恩來過程中，為尋求黨內更多支持，高崗曾對各大區的主要負責人進行游說工作，這些大區的負責人掌握數省的黨、政、軍大權，在黨內有著崇高地位及影響力，也讓高崗事件爆發後，中共黨內忙著解決高崗向外串聯產生的負面效應，這也可能是耽誤薪金、軍銜制施行的原因。

高崗事件除了對中共推行「四大制度」有所拖延之外，也讓中共中央做出取消建國初期施行的大區制度之決定。取消大區制度固然是因為中共開始進行計劃經濟故要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避免「獨立王國」的出現也是重要的原因。⁷⁴大區制度的取消，也影響到與大區相契合的 6 大軍區建制，學者張嘉中認為 1955 年中共將 6 大軍區變更為 12 大軍區的做法，除了是因應作戰的調整，還有削減地方軍人勢力的作用存在，⁷⁵從這例子可看出中共的黨內鬥爭對軍事路線確實有一定的影響。

貳、 國際因素的影響

國內因素會影響中共的政策決定，同樣的外部環境，即國際大環境的變化亦會對中共的政策制定產生影響。當時中共的外交政策主要採取一邊倒的策略，除了需要蘇聯的援助外，在各項制度建立的過程中亦以蘇聯現有的為藍本，毛澤東在其《論人民民主專政》即提到，「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⁷⁶在這前提下，中共的軍事建設深受蘇聯影響，直到 1950 年代中期之後解放軍開始提出「以我為主」的觀念，反思全面學習蘇聯產生的教條主義問題，解放軍逐漸走向以自我經驗為主的建軍方向；而且除了在建軍路線上擺脫蘇聯模式，因為中蘇關係交惡，中共還修正其軍事戰略，將蘇聯列為軍事上的假想敵。

一、 學習蘇聯產生的積極作用

向蘇聯學習無疑是中共當時要縮短與發達國家差距的唯一途徑，但向蘇聯學習的方式並非漫無目的、無方法的，而是經由幾個途徑，主要有：派遣高級軍事代表團訪蘇、參觀蘇聯軍事演習、對蘇聯進行實地考察、派員到蘇聯留學、邀請蘇聯軍事代表團訪華以及聘請蘇聯軍事專家來中國指導等。⁷⁷

在上述的幾種學習蘇聯方式中，訪問的方式或參觀蘇軍演習雖然對拓展中共在軍事觀念上的視野有很大的幫助，但畢竟這類方式屬於短期交流，對中共軍事

⁷⁴ 董晶，〈建國初期的大行政區制度始末〉，《中共鄭州市委黨校學報》（鄭州），2007 年第 1 期，頁 51-52。

⁷⁵ 張嘉中，《權力鬥爭與軍人的政治角色》，頁 218-220。

⁷⁶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 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二版），頁 1481。

⁷⁷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頁 101。

路線能產生較大影響的，還是歸因於蘇聯專家帶來的意見與學成歸國的留學生。有關蘇聯在與中共關係徹底破裂前，派遣多少專家和顧問到中國，尚未有一個確切的數字，大約估算後約有 1 萬人次來到中國協助解放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這些專家與顧問的工作，既有協助的部份，而在解放軍完全陌生的業務上，更是負起具體的工作任務。⁷⁸

派遣學員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重要途徑，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就近到在中國境內的蘇軍基地學習，這種方式主要在於加快解放軍熟悉以往未曾使用的裝備及使用方式，如中共將人員送至當時還是蘇聯太平洋海軍基地的旅順進行潛艇人員訓練。此外，派遣人員到蘇聯的各軍事學院學習是中共培養現代化軍官的主要模式，由於受限於語言，因此前往蘇聯學習的，主要是以下級的年輕幹部為主；⁷⁹這批學成歸國的幹部日後成為解放軍追求軍事現代化重要的骨幹，其中最有名為中共政壇最後一位具軍人身份的政治局常委，當時任大連海軍學校副校長的劉華清。⁸⁰

經過這些學習途徑，中共對於現代化戰爭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讓中共在進行軍事現代化、正規化中少去摸索、走冤枉路的過程，也對三軍協同作戰概念有更清楚的認識，1955 年共軍進攻一江山島便是第一次採取三軍協同作戰的方式，最終並取得勝利，若無蘇聯的幫助及透過各種管道向蘇聯學習，要讓原本對海、空戰爭的認識幾乎空白的共軍，於短短五年內發起對外島的三軍協同作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二、學習蘇聯造成的消極影響

以蘇聯為師，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全面向蘇聯學習的結果，雖然加快了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的進程，但中國與蘇聯對事物的看法與做法並非完全一致，這也造成解放軍幹部在向蘇聯學習的過程中，出現牴觸的情緒，也讓中共建軍過程幾經波折，這可從彭德懷對學習蘇聯的態度得知。

中共與蘇聯在軍隊建設上最大的分歧，就是在軍隊內是否施行「一長制」。有關解放軍內部對「一長制」爭論，前一節已有描述，這裡不再多談，但就這點便可看出中共在「向蘇聯學習」的口號下，各方面均以蘇聯模式作為先進經驗的代表，連中共自古田會議後即確立的政治委員制與政治工作，都受到蘇軍「一長制」的挑戰，甚至當時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也有所動搖，⁸¹爾後在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雖確立了解放軍內部仍為黨委集體領導下分工

⁷⁸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頁 114-116。

⁷⁹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頁 108-112。

⁸⁰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頁 265-274。

⁸¹ 《羅榮桓傳》編寫組，《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第 2 版），頁 320-321。

負責制，但有關辯論仍持續不斷，一直到 1958 年的軍委擴大會議批判教條主義後，相關討論才告停歇。

三、中蘇關係的變化對中共軍事建設的影響

中共建國後的外交政策，一開始採取「一邊倒」的策略，期望自蘇聯手中獲取大量援助，以加速中共自身的建設，但中共的期望並未完全實現；史達林對美國宣稱中共是「人造奶油」固然有其戰略考量，但也可看出蘇聯一開始對中共並非完全信任，直到韓戰爆發，中共在未獲蘇聯空軍的掩護下，仍派遣志願軍入朝作戰，自此史達林才解除對中共的疑心，加強對中共的援助。⁸²

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援助內容主要有提供貸款、武器販售及轉移技術以建立國防工業等，雖然韓戰爆發後蘇聯增加武器等物品的援助，但與赫魯曉夫主政後相比，史達林統治時期中共從蘇聯獲取武器、國防工業等援助仍較為艱辛，以海軍建軍過程為例，在中共造船工業尚未成熟之際，從蘇聯處購得海軍相關艦艇是共軍海軍建設一條捷徑、也是唯一選擇，然而向蘇聯購置艦艇的計畫，從 1952 年 4 月蕭勁光與羅舜初赴蘇進行談判，到 1953 年 6 月 4 日中、蘇雙方正式簽署《關於海軍交貨和關於在建造軍艦方面給予中國技術援助的協定》（簡稱六·四協定），共歷時 14 個月的談判，而且此次購買的船艦武器，大多數是蘇軍已不用的裝備，在「總比完全沒有好」的想法下從蘇聯購入，⁸³由此看出中共建國初期在軍事建設上面臨的困境。簡言之，在史達林時代，中共與蘇聯的互動屬於「老大哥」與「小老弟」的關係，在彼此間地位不平等的情況下，對於蘇聯在某些方面「吃定」中共，中共也只能選擇忍讓，畢竟雖然蘇聯移轉的技術與設備並非當時最先進的，但對於中共百廢待舉、一切從零開始的情況，還是有相當大的幫助。

1953 年 3 月，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史達林去世，蘇聯內部也開始了新一輪的權力鬥爭，在蘇共黨內高幹權力的競逐過程中，獲得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國家的認同，是蘇共領導人地位能否穩固的關鍵，中共是當時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僅次於蘇聯的大國，其意圖與動向牽動著蘇聯政局的發展。

蘇共領導人之爭，由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雪夫等三人進行角逐。赫魯雪夫首先聯合馬林科夫等蘇共領導核心，逮捕並處決掌握特務機構的貝利亞。赫魯雪夫在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後，於 1955 年 1 月迫使馬林科夫辭去部長會議主席一職。然而赫魯雪夫地位並未完全穩固，1957 年 6 月，馬林科夫等人密謀罷

⁸²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臺北：聯經，2001），頁 547-564。

⁸³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 100-107。蕭勁光係為解放軍第一任海軍司令員，在此本回憶錄中充分述說了中共建國初期在海軍建設上所面臨的問題與解決方法，對於了解中共海軍的建軍過程是極為重要的參考資料。

免赫魯雪夫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職務，雖然最終失敗，⁸⁴然而也可看出赫魯雪夫的地位在 1953 年到 1957 年間時而遭受挑戰，這加深了他對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國家的依賴，尤其是中共的支持。

為得到中共的支持，赫魯雪夫做出許多向中共表示友好的舉動。具體措施如利用參加中共建國五週年慶典的機會，向中國提供 5.2 億盧布的軍事貸款以及加強中蘇科學技術合作等，並且提前歸還旅順海軍基地給中共。⁸⁵除此之外，赫魯雪夫時期蘇聯對中共軍事建設最重要的貢獻，表現在海、空軍裝備與核武器的技術支援上。

中共的核武器發展是從民用核技術起家，並逐步朝向核武器研製；蘇聯一開始主要把核能民用技術轉移給中共，作為一種新的能源來源以及學術上的研究，但這畢竟為中國核武器研究奠定基礎，而蘇聯的民用核技術轉移，某種程度上縮短了中共核能研究的道路，仍是相當重要。⁸⁶最先蘇聯在核技術上僅限於民用技術的轉移，並在導彈技術上小幅給予援助，這對中共「兩彈」的研製計劃自然相當不利；但 1957 年 6 月赫魯雪夫與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黨內鬥爭中，中共選擇支持赫魯雪夫的領導權，在風波平息後，為回報中共的支持，赫魯雪夫在援助中共發展「兩彈」的技術上給予更多的協助，在歷時 1 個多月的談判後，以聶榮臻為團長的中國政府工業代表團於 10 月 15 日在莫斯科同蘇聯簽訂援助「兩彈」技術的《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簡稱 10 月 15 日協定或國防新技術協定），⁸⁷這項協定讓中共在核技術與導彈技術上有長足進展，即便 1960 年中蘇關係的破裂導致蘇聯專家全面從中國撤離，但中共軍事建設仍持續前進，於 1964 年成功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

在海軍裝備部份，前面提到的《六·四協定》對中共海軍建軍是具有相當意義的，除獲取更大噸數的船艦外，蘇聯更移轉船艦製造的初步技術以協助中共造船工業的發展；然而這些技術畢竟並非當時最先進技術，到《六·四協定》規定的技術移轉完成，加上 1957 年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重工業也具有一定規模後，中共開始向蘇聯謀求更新的技術。《10 月 15 日協定》的具體內容除了核技術與導彈技術外，主要集中在陸軍與空軍的問題解決上，為使海軍設備有所提升，海軍武器裝備的談判主要分為兩階段：在 1957 年底的莫斯科會議上，中共海軍司令員蕭勁光藉由參與中共代表團的機會，與蘇軍高層展開會談，獲取一些海軍武器裝備相關訊息，做為要求蘇聯協助中共海軍設備研製的談判基礎；其後中共雖然在長波電台的建造及中蘇共組聯合艦隊上與蘇聯意見有所分歧，但這並未損害中蘇的「親密關係」，赫魯雪夫在結束密訪中共的行程後，即表示願意就

⁸⁴ 閻明復、朱瑞真，〈我瞭解的赫魯雪夫權力鬥爭〉，《炎黃春秋》（北京），2005 年第 7 期，頁 19-21。

⁸⁵ 沈志華，〈蘇聯歸還旅順海軍基地內幕〉，《文史博覽》（長沙），2006 年第 9 期，頁 48-49。

⁸⁶ 沈志華，〈援助與限制：蘇聯與中國的核武器研製（1949—1960）〉，《歷史研究》（北京），2007 年第 3 期，頁 112-117。

⁸⁷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 618-623。

中共海軍建設給予技術援助，最終在 1959 年 2 月 4 日簽訂《關於蘇聯政府給予中國海軍製造艦艇方面新技術援助的協定》（簡稱二·四協定），在這協定下，蘇聯除了售予中共包括常規動力導彈潛艦在內五種船艦、並售出兩種艦用導彈，更將導彈與船艦結合等相關先進技術轉移給中共。⁸⁸這個協定對中共海軍發展是有重大意義的，它加快了中共海軍現代化的速度，並且改變了海軍的發展規劃，即將導彈的研發及配置列為海軍的重點發展，改變了原先以「空、潛、快」為主的建軍路線。

空軍的裝備同樣相當倚賴蘇聯的支持。中共空軍的主力戰機均購自蘇聯，並藉由技術轉移方式培養中共的航空工業。前述提到的《10 月 15 日協定》在內容中就包括作戰飛機的技術支援。簽署協定的隔（1959）年，時任國防科委主任的聶榮臻就中國政府航空工業代表團即將赴蘇聯談判有關米格-21 等先進戰機技術轉移部份，進行細節研究。⁸⁹而蘇聯對中共的軍事援助與技術轉移，同樣地也改變共軍空軍的建軍思維，在蘇聯同意就導彈技術轉移給中共後，共軍空軍內部出現導彈與飛機研製誰先誰後的爭辯，1959 年 10 月中共在一次中央軍委辦公會議上，聶榮臻為這場爭論定調，即「首先發展飛彈，飛機也要努力發展」，即便聶榮臻知道當時中共擁有的技術還不能用導彈全面替代飛機。⁹⁰

然而 1960 年後中蘇關係陷入僵局，之後雙方關係更是徹底破裂，這也導致蘇聯對中共的軍事援助斷絕；雖然在中蘇關係處於親密時期，中共藉由蘇聯的幫助在國防工業與技術上有了相當基礎，但之後較為更為新型的技术則無以為繼，迫使中共在國防工業的建設路線從仿製蘇聯、倚賴蘇聯，轉為自行設計、研製、生產的自力更生道路。

中共雖然在大陸戰場上擊敗國民黨，迫使國民黨撤退來台，但當時共軍的構成以陸軍為主，海、空軍體系尚未建立起來，在缺乏渡海作戰經驗的情況下，讓共軍在古寧頭戰役上受到重創，也讓共軍注意到建立一支現代化海、空軍的重要性。隨後中共投入韓戰，在人海戰術的運用下，成功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抗拒於北緯 38 度以南，但與美軍的交手過程更加讓中共體會到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重要性。在當時冷戰的思維下，謀求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蘇聯的幫助是唯一的選擇，但在史達林時期，蘇聯對中共的援助是比較少的，直到赫魯雪夫上任後，為鞏固自身的地位，以提供諮詢、技術轉移的方式謀求中共的支持，此時共軍的軍事現代化才有突破性發展。

⁸⁸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頁 173-185。

⁸⁹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下冊，頁 690。

⁹⁰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下冊，頁 689。

但是「全面向蘇聯學習」的背後，與共軍原有的做法產生衝突，包括「一長制」的爭論，以及蘇軍的經驗模式是否能符合中國實際狀況所需，最後這場衝突升級為兩條軍事路線鬥爭，造成共軍從人事到建軍路線都出現變化。



第四章 在正規化與革命化之間擺盪 （1958-1965）

在「一定要將蘇聯的一切先進經驗都學到手，改變我軍的落後狀態，建設我軍為第二支最優良的現代化的軍隊」的思維下，¹共軍開始以蘇聯為師，以蘇軍的軍事條令與規章為範本建立起共軍的制度，並大量地自蘇聯購買及仿製蘇聯武器，進行共軍的現代化、正規化，這不僅讓共軍脫離「小米加步槍」的情況，更將原先山頭氣息濃厚的各路共軍统一到中共中央的指揮之下。

然而這股軍隊正規化的走向，引發共軍內部關於軍隊是否捨棄革命化建軍路線疑慮，雖然在 1953 年底召開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仍肯定黨在軍隊的政治工作制度，但有關政治工作的存廢仍是爭論的焦點；而 1956 年蘇共 20 大上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及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的發生，對蘇聯在共產主義陣營龍頭地位產生挑戰，加上中共照搬蘇聯體制出現問題，讓中共開始思考發展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

1958、1959 兩年間共軍內部出現兩次鬥爭，造成共軍中央領導改組，彭德懷與林彪先後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使得共軍的軍事建設有所變動，但這並非意謂著彭德懷與林彪的作為是極端的對立。共軍從 1958 年到 1965 年文革前這 8 年的軍事建設，在正規化與革命化之間擺盪。

第一節 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對正規化的衝擊

藉由蘇聯經驗的運用，共軍在現代化、正規化的進程中少走許多冤枉路；但不假思索的向蘇聯學習難免會與中國原先的國情不同導致基層出現牴觸的情緒，然而在中共在建國初期百廢待舉、並欠缺統治經驗的情況下，中共高層只能加強宣傳向蘇聯學習的優點來化解疑慮，直到 1956 年中共召開八大，決定探尋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加上蘇共 20 大風波及波匈事件，才開始對於學習蘇聯經驗帶來負面效果進行反思。

¹ 見〈轉發蕭向榮關於各軍事部門與蘇聯顧問的關係的總結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 1。

壹、「全盤蘇化」的問題

中共建國後，為了提升軍隊素質並且消除軍隊內部長期存在的山頭主義、遊擊氣息，因而推行一連串軍隊正規化的工作，如建立軍事院校體系，培養軍事人才；並且以蘇軍條令為基礎，頒行統一共同條令，即內務條令、隊列條令與紀律條令。雖然在紅軍時期，中共在軍隊內部有建立各類型的紅軍大學及頒行軍隊條令，但這些學校與條令大多僅是符合當時環境需要、過於簡單。²

在蘇聯的幫助下，共軍開始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朝向軍隊正規化的目標前進，這成果是顯著的，如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建立仿效蘇軍的八總部制度；並且釐清各部門間的負責事項，做出適度的分工；³建立完整的軍事院校體系；並且以蘇軍條令為基礎，制定共軍的條令規章。

然而蘇聯經驗並非沒有缺點，中共在學習蘇聯的過程一開始是不假思索的學習、機械照搬，難免出現問題；此外學習蘇聯經驗未與共軍傳統經驗進行結合，都造成軍隊內部出現思想混亂的情況。雖然在「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針對學習蘇聯產生的弊端進行討論，並做出糾正，但問題仍未得到完全解決。學習蘇聯產生弊端最嚴重的兩個案例，出現在軍事學院與模仿蘇聯而制定出來的條令規章上。

後來被指為「教條主義大本營」的軍事學院，由於共軍欠缺對現代化戰爭相關學理基礎與實戰的認識，因此學院的教學模式與教材，基本上是借用蘇聯現有的制度、範本，雖然這縮短了摸索的過程，但仍會有許多問題，甚至出現因為蘇聯這麼做而我們也必須這麼做的「教條主義」傾向，這種「教條主義」的現象引發在學院學習的共軍將領不滿，1956年8月25日，軍事學院戰役系學員李夫克向劉伯承表示對於學院教學方面的問題，引爆了共軍內部對於「教條主義」的爭論。⁴李夫克信中主要討論的，是對於軍事學院內部在教學上仿效蘇聯採取「六小時一貫制」及「三堂會審制」的考試制度提出不同的見解，認為這些方式不適用於中國，教學上應重視理論與中國實情的結合。

關於「六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及「三堂會審制」的考試制度，不只李克夫表達出疑惑，根據當時同李克夫在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的廖漢生、張震、丁盛等人，其回憶錄中都有提到在軍事學院學習的點點滴滴，不約而同的是，同樣對

² 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頁428-429。

³ 如在軍委設立辦公廳前，軍委日常工作主要由總參謀部作戰部負責，但1949年成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及後來中共成立中央軍事委員會，都有設置軍委辦公廳，然而最初並未明訂這兩機關的職責，導致應劃歸給辦公廳執行的事項仍由作戰部在統籌。時任作戰部長的張震有感於這情況將對共軍正規化造成阻礙，因而根據中央軍委的要求，在蘇聯顧問的協助下，以蘇聯經驗為範本進行作戰部和軍委辦公廳的負責事務分工。張震，《張震回憶錄》，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頁503-506。

⁴ 劉統，〈彭德懷與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黨史天地》（北京），2001年第2期，頁10。

於學院仿效蘇聯採取「六小時一貫制」、「三堂會審制」感到不解，都直言「因蘇聯冬長夏短、夜長晝短，為集中學習才採取這種制度，但這卻與中國習慣八小時、分成上下午的工作習慣有所不同」；在考試部份，則採用蘇聯軍校考試方法，「考場外有哨兵站崗，試場內除了有主考外，還有陪考、監考數人，如同『三堂會審』，考題則以隨機抽取方式並當場回答，這種方式讓學員感到相當緊張，除了回答不出問題外，更有人當場昏倒」。⁵若說欠缺對現代戰爭的認識而以蘇聯的教材為範本，原是無可厚非的，然而教學與考試的方法未顧及中國傳統做法而援用蘇聯方式，這種僵化的做法容易激起學生的反彈情緒，對於學生的學習情緒容易造成阻礙。

若說教學方式僅對少部份進入軍事院校體系的軍隊幹部造成影響，帶來的衝擊面不會那麼大；那麼軍事條令關係到軍隊內部上下關係及行為，影響範圍是全體官兵，因此軍事條令若存在教條主義問題，造成的影響是難以估計的。而1951年頒行的共同條令是根據蘇聯現有的條令為基礎編寫而成，其中大量借鑑了蘇聯軍事條令中的相關規定，甚至原封不動的搬用過來，當初在編寫時並未考慮到與中國實際情況契合，導致條令頒佈實行後出現不少問題。

共軍共同條令的問題，除了上一章所討論的是否朝向「一長制」過渡外，還有幾個比較嚴重問題，如在1956年彭德懷根據總政治部整理的資料發現，該年因紀律問題受懲戒的士兵高達10萬人次，然而根據對9個連隊進行調查的結果發現，懲戒錯誤或處罰不當的比例高達71%，而受懲戒的原因種類繁多，甚至「胃口不適不願喝辣子湯」都列為處罰理由，處分不正確的問題引發軍隊內部關係的緊張，⁶事實上羅榮桓在1955年發表的《繼續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一文中就注意到這個問題：

目前部隊中，削弱我軍光榮傳統的現象是存在的，並且有某些滋長，這是一個極端危險的傾向。例如有些同志把嚴格紀律、嚴格管理與說服教育對立起來，把軍隊正規化與必要的民主對立起來，不瞭解兩者的統一性與一致性，錯誤地認為：「要正規化就不能講民主，要講民主就不能正規化」。因而濫用職權，濫施處罰，嚴重地損害了我軍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光榮傳統。這些同志們忘記了，紀律必須建築在自覺的基礎上。沒有官兵覺悟的提高，思想認識的一致，幹部的模範作用等，就不能有嚴格的紀律。⁷

⁵ 丁盛口述、金光談話紀錄、余汝信整理編註，《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香港：星克爾出版，2008），頁135-136；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頁110-111；張震，《張震回憶錄》，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頁11-12。

⁶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206-207。

⁷ 羅榮桓，〈繼續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人民網》，2010年10月2日，取自：<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99988/100014/9080074.html>。

除了紀律問題外，內務條令的規定亦有不顧現實照搬、照用蘇聯經驗的問題出現，如軍旗保護與軍人誓詞。軍旗對蘇軍而言是相當神聖的，在其軍事條令中均有軍旗保護的規定，此一精神亦影響到共軍的內務條令編寫，也對軍旗的保護做出相關規定，然而共軍自建軍以來對於軍旗的認識並未像蘇軍般莊嚴、神聖，共軍的內務條令將軍旗的保護列為重點實為教條主義，但 1951、1953 年編寫、修訂內務條令均未發現這個問題，直到彭德懷在 1956 年 11 月江蘇新沂縣視察時才注意到，彭德懷的秘書鄭文翰在日記中寫下彭對這個教條案例做出的批判：

看到師的軍旗專設一軍旗室，還有一衛兵晝夜守衛，夜間開電燈。軍旗進出軍旗室，要用一武裝儀仗排正步護送。彭說，這種從外國搬來的做法，實在沒有必要。⁸

彭德懷以「實在沒有必要」一詞來表達對內務條令有關軍旗保護相關條文的不滿，而在此次視察中，他也發現內務條令亦仿製蘇軍而對軍人誓詞做了相關規定，這種誓詞容易流於繁瑣，與共軍傳統的「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精神格格不入，並且將共軍說成「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彭德懷對此表示：

這個說法有毛病，我們的軍隊雖然是共產黨絕對領導的，但現在的軍隊是國家的，不能說在哪一個人領導之下。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毛主席死了誰領導？今後應當注意修改。⁹

針對共同條令存在的問題，彭德懷在 1956 年 3 月 17 日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就提出「要對現行共同條令修改」，¹⁰而在到基層部隊進行視察與閱讀各總部呈送的相關資料後，更加讓彭德懷決定加速共同條令的修改。在彭德懷的主持下，於 1957 年 8 月及 10 月公佈新的紀律條令與內務條令，彭德懷認為新的紀律條令是「建立在自覺遵守紀律，軍官以身作則，起模範作用的基礎上的」；¹¹在新的內務條令部份，則將士兵可以批評軍官的共軍傳統重新寫入內務條令，並提升士兵的自主性，同時擴大保障下級官兵的權益，取消或限制軍隊上級首長不適當的條文規定。¹²至於隊列條令的修訂，則交由 1958 年成立的軍事科學院完成。而尚未編寫的戰鬥條令在反教條主義的濃厚思維下，條令的編寫在「以我為主」的前提下展開。

⁸ 鄭文翰著，王焰、王亞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頁 135。

⁹ 王箴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 632。

¹⁰ 王箴主編，《彭德懷年譜》，頁 618。

¹¹ 王箴主編，《彭德懷年譜》，頁 661。

¹² 鄭文翰著，王焰、王亞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 199-200。

貳、 反思「教條主義」

對於學習蘇聯過程中出現的教條主義問題，中共中央相當重視，軍隊領導人如彭德懷、劉伯承等人也多次提出對於蘇聯的軍事經驗應該有批判的使用，並與共軍的傳統經驗相結合，¹³然而學習蘇軍而產生的教條主義問題仍然嚴重，這與共軍內部對於學習蘇聯的態度不一致有關。

1956 年對中共來說，國內及國際形勢都出現相當大的變化。國際部份，赫魯雪夫於 1956 年 2 月的蘇共二十大上，全面批判史達林，敲碎了史達林在共產陣營巨人的形象，同時也造成共產陣營內部對蘇聯老大哥產生質疑；而蘇聯在輕、重工業及農業等經濟建設方針配置方針的失當，這些問題也在此時突顯出來，這讓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注意到這個問題；而中共此時也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開始探索如何建設一個強大社會主義國家的道路。¹⁴ 因此如何重新認識蘇聯並向它學習，是中共首先要面對的。

為克服黨、軍、政內部存在已久的教條主義傾向，同時導正人民的學習態度與思想方法，1956 年 6 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五個文件的通知》，¹⁵企圖克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在 8 月 31 日的八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強調學習蘇聯先進經驗之外，也要反對與克服教條主義機械照搬。¹⁶彭德懷在八大會議中也針對軍事工作問題做出報告，報告內容與毛澤東雷同，即在肯定學習蘇軍經驗之餘，對訓練及工作方法的教條主義傾向提出批評，要求「端正學習的方法，糾正機械搬運」。¹⁷

這股對學習蘇聯經驗的反思對共軍影響是深遠的，如讓尚未編寫的戰鬥條令在制定過程中不以蘇軍條令為最高指導原則，開始重視到共軍的傳統經驗，葉劍英 1958 年 5 月召開的中央軍委訓練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強調戰鬥條令的編寫步驟應該是：

首先從總結我軍經驗開始。……第二步從研究我軍具體情況下手，……第三步是採取批評學習的態度學習蘇軍的各種條令，以便吸取其先進經驗，充實我軍現代戰爭的知識，編寫出我軍的作戰條令。¹⁸

¹³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彭德懷軍事文選》，頁 567-569；劉伯承，《劉伯承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頁 529-530。

¹⁴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 3-7。

¹⁵ 五個文件為：《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¹⁶ 高連升，〈淺析 1958 年解放軍反「教條主義」的鬥爭〉，《軍事歷史》（北京），1994 年第 1 期，頁 7。

¹⁷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彭德懷軍事文選》，頁 566-569。

¹⁸ 葉劍英，〈軍事科學院籌建經過及工作方針〉，《人民網》，2010 年 10 月 2 日，取自：<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118416/118419/6995091.html>。

雖然中共中央高層對於學習蘇聯產生的教條主義問題已有所注意，並屢次在公開場合提到要注意教條主義問題並要求予以糾正，然而對於如何學習蘇聯，共軍內部出現不同的看法。時任軍事學院的戰史系教授會主任的蔡鐵根在 1956 年曾寫信給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表達他對於軍隊內部學習教條主義的看法，信中提到：

為了確實瞭解蘇聯軍事科學的全部內容，在步驟上，第一步應該是全部學會、學通。只有真正地全部融會貫通之後，才談得到批判。幾年來，我們深深體會到蘇聯軍事科學的系統性，它雖然不是天衣無縫，確實漏洞很少。小自對一個日常生活小節的規定，大至軍事原則的規定，都是互相結合、互相為用、互相保障著的一整套。但我們在學習和運用蘇軍這一整套的時候，卻往往是割裂開來，隨意取捨。採用了這一套，丟掉了那一套；吸收了這一規定，拋棄了那一規定，結果弄得四分五裂，驢唇不對馬嘴，八方不對頭。還美其名曰「批判地接受」，最後只好都執行不通。不說自己學習上有問題，還說蘇軍的東西不適合我軍的情況。¹⁹

蔡鐵根信中的說法，認為教條主義問題的出現乃是學習蘇聯不夠深入所致，這與中共高層對教條主義的認識相去甚遠，也與李夫克信的內容有相當大差異，對於這個結果，顯然口頭上的爭辯已無法解決問題，因此 1956 年 11 月主管軍校工作的副總參謀長張宗遜組成一個工作隊來到軍事學院及總高級步兵學校進行考察，其報告雖然肯定建國以來軍隊學習蘇聯的成效，但同時也批評學習過程中的某些片面性，「把一些不適用於我軍的東西也學來了」，²⁰同來的總政副主任甘泗琪更宣稱：「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同時還傳出一個論調，即「訓練總監部是教條主義的司令部」。²¹

鑑於軍事學院內部的教條主義論爭，1957 年 2 月底彭德懷親自來到軍事學院進行視察，在與學院幹部及部份學員交談後，彭德懷肯定軍事學校 6 年多來有系統地介紹、研究與學習蘇聯的軍事學術，也認為學院的教學「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相適應」、「在反對教條主義問題上，黨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明確地積極地進行領導」，然而當時彭德懷尚能保持對事不對人的態度，認為軍事學院出現的教條主義問題，「不能把責任歸咎於哪一個人。要論責任，我也是有責任的」。²²

之後彭德懷將視察軍事學院的心得匯整成一份報告，中央軍委隨即在秘書長黃克誠組織下討論這篇報告，時任訓練總監部副部長蕭克對於講話中提到的「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相適應」一詞表示反對意見，認為這有全盤

¹⁹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 546-547。

²⁰ 張宗遜，《張宗遜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頁 450。

²¹ 蕭克，《蕭克回憶錄》，頁 442。

²² 鄭文翰著，王焰、王亞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 501-502。

否定學院教學工作的意涵，最終黃克誠將「不相適應」改為「不大相適應」，²³從這可以看出共軍內部對於教條主義的現象仍未有一定的共識。

彭德懷的結論顯然對軍事學院造成不小壓力，為回應外界對軍事學院存在教條主義問題，軍事學院代理院長陳伯鈞、代理政委鍾期光召開院黨委擴大會議，檢查總結學院的工作。會議認為，「學院成立以來的工作成績是基本的、主要的」，「但同時在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也是很多的」，問題性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會議最終通過了《關於深入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決定》。彭德懷對此次會議的批覆是「你們關於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決定很好，同意你們這個決定，望按照決定的精神貫徹執行」、「同時教條主義現象，不單是在學院教學工作中存在，而是在全軍許多工作中都存在，如果要論責任，軍委的責任更大」。²⁴

彭德懷雖然多次對於軍隊內部教條主義現象提出批判，但身為一個主管軍隊日常事務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他認為中央軍委無法置身事外，主動承擔起教條主義的責任，而共軍內部也開始進行反教條主義，此時共軍內部在教條主義的論爭上，仍屬於認識問題，尚未上綱上線到路線鬥爭的問題。²⁵而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基於負起學院出現教條主義的責任，也可能是在鄧小平的勸告之下，向毛澤東請求辭去軍事學院院長並獲准，²⁶軍事學院院長一職改由廖漢生接任。

共軍對於內部的教條主義檢討尚未停歇之際，中共黨內的氣氛陡然轉變。中共自 1957 年 9 月召開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在此次會議上對 1956 年周恩來推動的「反冒進」的批評開了頭，提出要恢復「多、快、好、省」，隨後在 1957 年 11 月 13 日、12 月 12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中，批判農業生產中的「右傾保守」情況，²⁷為了「反保守」，中共中央甚至在 1958 年 3 月 3 日發出的《關於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這股「反冒進」、「反右傾保守」一直延續到 1958 年，成為大躍進運動的基礎。

雖然這股「反右傾保守」思潮一開始是針對農業及工業生產的問題，但很快地影響到軍隊，這股「反右傾」、「反保守」的思潮變成檢討共軍在教育及訓練上的「經驗主義」問題，這使得軍隊「反教條主義」工作暫時中斷。²⁸

²³ 董保存，〈關於 1958 年反教條主義對蕭克將軍的訪談〉，《黨史博覽》（鄭州），2001 年第 2 期，頁 11。

²⁴ 鍾期光，《鍾期光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頁 517。

²⁵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頁 218。

²⁶ 鍾延麟，〈1958 年鄧小平在解放軍「反教條主義」運動中之角色與活動〉，《中國大陸研究》（臺北），2006 年第 49 卷第 4 期，頁 83。

²⁷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 770-773。

²⁸ 劉志青，〈20 世紀 50 年代人民解放軍學習蘇軍的爭論與結局〉，《黨史博覽》（鄭州），2005 年第 1 期，頁 9。

前面提到 1957 年 9 月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重提「多、快、好、省」為大躍進運動立下基礎。大躍進運動是毛澤東決定探尋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嘗試，在兩個發動大躍進的關鍵會議：南寧工作會議與成都會議，為發動群眾積極性，毛澤東大力批判周恩來的「反冒進」言論，毛澤東甚至在成都會議上將反冒進同 1957 年的反右運動相聯繫，「認為黨內反冒進和右傾保守思想是不瞭解合作化後農民社會主義積極性」，為肅清反冒進帶來的右傾保守思想，中共中央在成都會議召開前已做出《關於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這也讓大躍進運動走向冒進的左傾方向。²⁹而反保守之餘，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也提到教條主義問題，雖然毛澤東認為「軍事工作搬了一部份教條，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³⁰但仍呼籲要注意教條主義在黨內的發展情況。除了注意到共軍內部的教條主義外，「朱可夫事件」³¹的發生及為調動相對於地方要顯得消極、落後的軍隊參與大躍進運動，都讓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意識到要加強對軍隊的掌控，所以毛澤東在會議上提出「今年要回過頭來搞點軍事工作」，³²並決議在 1958 年召開一次軍委擴大會議，進行整風、整編以加強軍隊的積極性和效率。

在軍委擴大會議前，為執行中共中央在 1958 年 3 月 3 日發出的《關於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訓練總監部決定在 3 月 20 日召開四級幹部會議來解決浪費及保守兩個問題。對於浪費問題，訓總內部的認識較為一致，然而在反保守的問題上，訓總內部較為分歧，接替劉伯承擔任訓練總監部部長的蕭克主張應該藉由這次會議澄清一下「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訓練總監部是教條主義的司令部」的論點，³³並認為軍隊訓練工作存在著保守思想，其思想體現在於「拒絕學習蘇聯的經驗，死抱著我軍過去的經驗不放」，³⁴而蕭克等人認為存在這種保守思想的人，主要是之前提出「不走樣的學」、「不願意學蘇聯的滾開」等言論，但後來將學習蘇聯說成是教條主義的前訓練總監部副部長、時任副總參謀長張宗遜。在蕭克的要求下，張宗遜被指派前往訓總參與四級幹部會議，會議過程對張宗遜的批判不斷升高，從「保守主義」、「經驗主義」、「修正主義」的指責上升到「反蘇」、「右派」等罪名。³⁵但四級幹部會議批張宗遜的做法，彭德懷相當不以為然，而總政治部此時也派出由總政組織部長劉其人組成的工作組參與會議，劉其人明確表態「訓練總監部是搞教條主義的」，並宣佈「訓總的四級幹部會，是向黨進攻的會，因為反對張宗遜就是反對彭總，就是反

²⁹ 姜華宣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頁 274-275。

³⁰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上冊，頁 791。

³¹ 朱可夫是蘇聯國防部長，因為赫魯雪夫為首的中共中央擔心握有重兵的朱可夫會有「兵變」的動作，因而在 1957 年 10 月解除朱可夫的國防部長職務。林蘊暉，〈朱可夫事件與彭德懷廬山罷官〉，《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2010 年 7 月 25 日，取自：<http://coldwarchina.org/zgyj/dyjjrmgs/000957.html>。

³²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 254。

³³ 蕭克，《蕭克回憶錄》，頁 446-447。

³⁴ 張宗遜，《張宗遜回憶錄》，頁 452。

³⁵ 張宗遜，《張宗遜回憶錄》，頁 453。

黨反中央」；³⁶而鄧小平閱讀四級幹部會議的相關文件後認為，該會議「方向不對，風氣不正，水準太低」，³⁷會議風向於是再度轉變，轉而反教條主義。而 5 月 20 日軍委發出通知，將訓總爭論列為擴大會議議題，因此訓總四級幹部會議被迫暫時休會。

參、 軍委擴大會議的召開

一、 會議初期：討論建軍原則與批判粟裕

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央軍委於 1958 年 5 月 27 日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根據彭德懷 5 月 24 日的會前講話，這次會議的內容除了討論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提出的軍隊整風、整編問題外，還要將建軍原則、建軍方針及戰略方針三個方面問題「搞一致」。³⁸

雖然「反教條主義」一開始並非會議的主軸，然而共軍高層認為這次軍委擴大會議的召開，是解決軍隊內部對教條主義的論爭最好的時機。如黃克誠在預備會議前一天的軍委例會上，便提出「訓練問題已爭了兩年，這次會議非作結論不可」，羅榮桓也說：「……現代化開始以後，訓練最亂了，主要是學習蘇聯就要全套無缺地學……蕭克、張宗遜兩個人的爭論，實際上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³⁹在 6 月 5 日的會議上，時任總幹部部部長蕭華也發言道：「訓總的爭論是路線鬥爭」。⁴⁰但會議初期彭德懷對於教條主義問題仍沒有看得很重，5 月 31 日，彭德懷邀請蕭克、張宗遜、李達、彭紹輝、李作鵬來商談，在肯定大家都是好人之餘，也認為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最主要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育，不追究責任」，「今天講清楚，不是整倒哪個，只是把相互間的成見、意見消除掉」，⁴¹總之，有關軍隊存在教條主義問題在彭德懷的想法裡雖是嚴重的，但卻不會立即造成危險，能有辦法來解決。

在徹底檢討、批判教條主義之前，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一開始的重點在於批判時任總參謀長的粟裕。這次擴大會議的開會模式主要有全體大會、小型會、小組會。在 5 月 27 日開會前，中央軍委於 26 日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開由鄧小平主持小範圍會議，會中就「總參與國防部關係」等問題責成粟裕做檢討，「為軍委

³⁶ 林蘊暉，〈1958 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紀實〉，《黨史博覽》（鄭州），2005 年第 3 期，頁 7。

³⁷ 鄭文翰著，王焰、王亞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 261。

³⁸ 鄭文翰著，王焰、王亞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 272-275。

³⁹ 鄭文翰著，王焰、王亞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 271。

⁴⁰ 齊德學，〈彭德懷與 1958 年反教條主義鬥爭〉，《軍事歷史》（北京），1998 年第 5 期，頁 46。

⁴¹ 鄭文翰著，王焰、王亞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 282。

擴大會議批粟定了調子」。⁴²最終粟裕被扣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帽子，主要罪名有三個。⁴³

三個罪名首先是「向黨要權、向國防部要權、爭奪軍隊權限」。向黨跟國防部要權的部份在第三章已有說明，這裡不再重覆；爭奪軍隊權限則是在說是否建立統帥部戰略預備隊問題，粟裕提出要抽調幾個軍作為機動部隊，然而這一戰略構想被認為是「爭奪這幾個軍」。這一爭論反映出粟裕與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關係惡劣，所以粟裕第二個罪名就是「一貫反領導」，除了與彭德懷關係不好外，還有與聶榮臻、陳毅的關係緊張，然而這些指控均是莫須有的。第三個罪名則為「告洋狀」，是說粟裕到蘇聯訪問時，曾向蘇軍總參謀長要求提供蘇聯總參謀部與國防部之間關係的資料作為制定兩機構職責條例的基礎，但這次活動卻被說成粟裕「告洋狀」，後來更被無限上綱到「裡通外國」。

批判粟裕的力道逐級上升，也讓粟裕被迫承認「錯誤」，先後進行了八次檢討，雖然毛澤東在會議期間曾找蕭勁光詢問對粟裕的看法，蕭勁光表示「粟裕為人正派，沒有二心，是好人」，毛澤東對此表示同意；⁴⁴並在粟裕的第二次檢討會議上表示：「粟裕同志戰爭年代打仗打得好，是為公的。到北京以後是為公還是為私？不能說都是為私吧！請大家來判斷」，⁴⁵然而最終粟裕仍舊被解除總參謀長職務。這些加在粟裕身上的「罪名」一直到1994年，才由粟裕當年三野下屬，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張震聯同劉華清發表《追憶粟裕同志》一文，徹底為粟裕平反。⁴⁶

二、會議轉向：批判教條主義

但是會議批判的重點漸漸從討論建軍原則、方針及批判粟裕轉變到對教條主義的批判。會議風向的轉變目前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林彪的政治投機行為；第二種則是源於海軍副司令方強寫給彭德懷的一封信。

林彪在1959年8月軍委擴大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曾提到為何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突然轉向批判教條主義：

去年軍委擴大會議反教條主義的情況，我記得很清楚。訓總四級幹部會議開了個把月，這時候彭德懷同志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是很含糊的，……我

⁴²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粟裕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627。除了5月26日外，鄧小平也在5月28日、6月4日主持這種小範圍會議對粟裕進行批判，參加會議為彭德懷、林彪、賀龍、羅榮桓、陳毅、聶榮臻、葉劍英7名元帥外，還有黃克誠、譚政、蕭華，因元帥佔多數，又稱元帥會議。這三場會議均由鄧小平主持，也代表鄧小平在此次軍委擴大會議上，實扮演重要角色。

⁴³ 《粟裕傳》編寫組，《粟裕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937-941。

⁴⁴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一代名將—回憶粟裕同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頁14。

⁴⁵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粟裕年譜》，頁627。

⁴⁶ 梁丞，〈粟裕大將的蒙冤與平反〉，《領導科學》（鄭州），2002年第2期，頁43。

剛回京時，劉其人同志找到我那裡去，無意中談到蕭克，……蕭克有教條主義傾向，我才開始接觸到這個問題，當時軍委擴大會議馬上要開，但並沒有確定以反教條主義為主題。我得到這個材料以後，認為應該以這個報告為主題，軍委擴大會議應該有這個思想內容。把情況報告毛主席，毛主席認為應該開展這個鬥爭。會議是毛主席決定的，材料是XXX提供的，這才有去年以反教條主義為中心的軍委擴大會議……⁴⁷

從林彪的言談中可得知，軍委擴大會議之所以會轉向，是因為林彪接到劉其人的報告後，才注意到共軍內部對教條主義的狀況，並告之毛澤東這個訊息，毛澤東表示「這麼多人來整一個中央委員，搞張宗遜，我們還不知道」，因此同意將訓練總監部的論爭作為軍委擴大會議的中心議題。⁴⁸

然而林彪這段談話是在隔年批判彭德懷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才提出來的，現今看來頗有事後諸葛的味道；對於教條主義問題的關注者，並非只有林彪，海軍副司令員方強曾在5月29日寫信給軍委擴大會議主席團提到教條主義問題：

我們軍隊曾有過一個時期，有這樣一種趨向：只強調正規化，不重視發揚我軍的光榮優良傳統；只強調業務技術，不強調政治；只講集中，不重視民主；只講學習蘇聯（這是必要的），不注意總結自己的經驗；……這種種，使我軍的一些優良傳統，在某個時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使我軍某些根本制度發生過搖擺。⁴⁹

彭德懷後來在6月5日將這封信轉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這封信上做了批註：

此件寫得很好，提出了問題，彭、黃、鄧看後還我。我暫時不宜於講話，先要讓他們把問題都放出來。過幾天，我準備找各小組組長分別談一下，調查一下情況，摸一下底。

他在信中最後提到：

彭黃閱後退小平：有些同志對會議的開法感到不滿。此事容易，調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氣，大有可為。請小平商彭黃召集七八個同志經常談一下，似可不必開小型會，只開大會和小組會。如何，請酌定。⁵⁰

因此，在方強上書後，毛澤東認為現行軍委擴大會議的開會方向需要更動，因此委託與軍隊關係頗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介入這次會議，毛澤東並於6月7日凌晨4點寫信給鄧小平，指示鄧小平的任務：

⁴⁷ 蕭克，《蕭克回憶錄》，頁450。

⁴⁸ 李德、舒雲編著，《林彪日記》，下冊（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頁690。

⁴⁹ 林蘊暉，〈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紀實〉，頁6。

⁵⁰ 〈在方強對軍委擴大會議開法的意見上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260-261。

小平同志：

六、七月你應做兩件事：一、第二個五年計劃佈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幫助德懷同志將軍事會議開好，關鍵是本月一個月，宜與彭等少數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來幹，多快好省。

軍事會上，你應準備去講一次，時機可在結尾的時候。⁵¹

在接到毛澤東的充分授權後，鄧小平隨即於6月7日上午召集林彪、彭德懷、羅榮桓、葉劍英、黃克誠開會，檢討並討論會議的未來走向。之後黃克誠在下午的軍委擴大會議全體大會上傳達鄧小平在上午的講話：

對前幾天會議的估計。小平同志認為，會議的「溫度」不夠。意思大體上是說，只有35度，沒有37、38度，更沒有40度。暴露問題不夠，在同志們思想中存在的意見是很多的，是多方面的，從建軍原則、方針，領導方式方法，到許多工作的具體措施都有意見，還沒有端出來，應當鼓勵大家擺開。

今後會議的開法，決定採取機關整風的辦法，不再開小型會，只開小組會和大會。寫大字報、小字報，配合大會、小會的發言，爭取在一週內造成鳴放的緊張氣氛。希望同志們大膽發言，以共產主義的風格提意見，把話都講出來。批判的對象，主要應當是對軍委、總部。軍委和各總部的負責同志要沉住氣，聽別人把意見講完，再展開辯論，進行專題鳴放，然後就爭論結果分別起草文件（即決議草案）。這些文件主要依靠下邊的同志幫助各總部寫。⁵²

從鄧小平的話中可以看出，他認為原先會議對於教條主義討論的溫度不夠、暴露問題也不夠，因此要改變原先的會議型態，會議應集中對軍隊內部教條主義展開批判，也讓軍委擴大會議進入另一個階段。6月9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在會議上宣佈，軍委擴大會議要增加成員，每個師的黨委書記都來。會議出席人數增加到1004人，列席人數上升到438人，全體會議在6月20日開幕。⁵³對於會議方向的轉變，黃克誠認為自己與彭德懷「未能體會中央精神，所以主持會議顯得很被動」，而鄧小平決定採取新辦法來開會的方式，讓會議在「一周內使空氣緊張起來」。⁵⁴

在會議進入新階段後，彭德懷在6月20日超過千人的全體大會上做了講話。內容提到了共軍內部存在著「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以及建國後軍事教條主義在中共內部的「復活」；並公開點名蕭克，說他們「誇大蘇聯軍事科學的完整無

⁵¹ 〈關於做好第二個五年計劃佈局和開好軍委會議問題給鄧小平的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64。

⁵² 鄭文翰著，王焰、王亞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86-287。

⁵³ 朱啟友，〈毛澤東與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黨史研究與教學》（北京），2007年第194期，頁23-36。

⁵⁴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頁246-247。

缺，使別人不敢分析，……他們反對張宗遜，說他是保守主義者，實際上教條主義才是真正保守主義」。⁵⁵毛澤東對於彭德懷這次講話相當讚賞，對於其它中央政治局常委表示「此件值得一閱」，⁵⁶他更是親上前線展開對教條主義的攻擊。毛澤東在6月21日、23日、29日發表講話，內容均在檢討中共建軍以來屢次受到教條主義的衝擊，而「建軍中兩條路線鬥爭是歷來都存在的」，並認為「政治和軍事的關係是，政治路線犯錯誤，軍事路線也必然犯錯誤」，⁵⁷最後他提出「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的口號；他在23日的會議上指劉伯承這個人：

伯承身上的舊軍閥氣息就完全沒有嗎？當著他的面我也要說，我看還是有的。他一到蘇區，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塊兒，軍事上完全是本本主義、教條主義那一套。抗戰時期，好一點。解放戰爭初期，特別是進入大別山，也不行。辦了軍事學院，好為人師，搞起了老本行——教條主義，莫誤人子弟。⁵⁸

若說之後在批判劉伯承還有所轉圜的情況，那對蕭克的批判就更加嚴厲了。毛澤東在29日的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座談會上提到劉伯承與蕭克問題，相對於23日會議上大肆抨擊的舉動，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對劉伯承的批判稍稍降溫，他提到劉伯承是「黨內很老的同志，基本上是好的，很有能力」；但指責蕭克是「壞人」、「不僅有教條主義，而且有資產階級思想，軍閥主義、封建主義思想」。⁵⁹在對教條主義的態度上，則因「破除迷信」、「以我為主」、「幾百萬軍隊也應該能搞得出自己的一套來」。⁶⁰

總之，在毛澤東與鄧小平相互接力替軍委擴大會議提升「溫度」之後，開始進行「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批判軍隊工作中的所謂「教條主義路線」、「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宗派活動」，⁶¹主管軍事訓練的負責人，如蕭克、李達、陳伯鈞、宋時輪、粟裕、葉劍英、劉伯承等人都被點名批判，即使毛允許劉伯承不需到場檢討，然而在反教條主義的氣氛已達到最高點情況下，劉伯承也只能拖著虛弱的身體到場做自我檢討，後來在昔日搭檔鄧小平的保護下，才勉強過了關。⁶²

⁵⁵ 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98-299。在此之前，蕭克曾針對彭德懷在蘇聯紅軍建軍三十周年大會的演講初稿提出個人見解，認為所要針對的並非學習蘇聯的口號，而是要對於在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一些偏差提出來糾正。然而這封信與在訓總四級幹部會議上批判張宗遜兩件事，最後卻演變成蕭克等人坐實教條主義、向彭老總進攻及「挑刺挑到國防部」的罪證。蕭克，《蕭克回憶錄》，頁445-446。

⁵⁶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彭德懷傳》，頁554。

⁵⁷ 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頁125。

⁵⁸ 曉農、疆文，〈彭德懷劉伯承的誤會與糾葛〉，《黨史文苑》（南昌），2005年第1期，頁31。

⁵⁹ 鄭文翰著，王焰、王亞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05。

⁶⁰ 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頁127-128。

⁶¹ 林蘊暉，〈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紀實〉，頁8。

⁶² 鍾延麟，〈1958年鄧小平在解放軍「反教條主義」運動中之角色與活動〉，頁92-94。

最終軍委擴大會議在 7 月 19 日通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決議》，內容提到「訓練總監部和一些院校，教條主義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著統治地位。而且某些個別同志，還堅持了一條與黨的軍事路線相對抗的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目前軍隊中的錯誤軍事路線，實際上是歷史上的錯誤路線在某些範圍內的復活」，「現在我軍中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基本上是我軍歷史上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鬥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反映」，「錯誤路線可以在受過歷史裁判以後捲土重來，在一段時間和一些部門、一些單位中可以橫行無忌，俘虜群眾，甚至有計劃有組織地向中央和軍委的正確路線猖狂進攻」，結論的結語還要求「目前的鬥爭必須在全軍認真展開」。⁶³

此外，這次會議也通過《關於處理蕭克同志所犯錯誤的決議》，《決議》決定對於蕭克問題「暫不作最後結論」，有待進一步徹底揭發後，再做結論。之後訓練總監部舉行黨委擴大會議，將蕭克、李達、郭天民三個訓總領導人及李鐘奇、吳偉、趙凌漢、葉楚屏、楊力勇、李文芳、王波、劉光第、王時彥、陳緒英等人打成「反黨分子」，隨後，總政治部向中共中央遞交《關於以蕭克同志為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活動》的報告，將蕭克、李達的作為形容為「一貫堅持『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公開抗拒中央關於反教條主義的指示」，「有組織、有計劃地向黨的正確路線開展猖狂進攻」，以及「卑鄙的野心家和軍閥主義」的結論；而軍事學院及高等軍事學院亦舉行兩院黨委聯席擴大會議，對劉伯承、陳伯鈞、宋時輪等進行批判，並作出「過去南京軍事學院成立以來所犯的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這條錯誤路線統治學院數年之久，在軍事訓練和科學研究中表現最為嚴重，其影響遍及全軍」。⁶⁴在對這些「教條主義」者的處分上，劉伯承被免去了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一職；葉劍英調任軍事科學院院長；粟裕被免去總參謀長一職，轉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被指為「反黨分子」的蕭克、李達則被調出軍隊，轉任農墾部副部長與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

肆、 會議結果的影響

1958 年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對共軍的建軍方向之影響是相當深遠的，這種影響有正面積極的成份在裡頭，但也帶來一些負面的效果。

正面部份在於打破「教條主義」的迷思，宣示「以我為主」的分針。在這次會議之後，共軍在看待如何學習蘇聯的問題上有了新的認識，即「重視共軍經驗為主，有選擇的選擇外國經驗，絕不盲目地機械搬運」，這是中共在建國後對於幾年來共軍進行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經驗總結，對於中蘇關係破裂之後，中共

⁶³ 姜華宣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頁 280。

⁶⁴ 林蘊暉，〈1958 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紀實〉，頁 9。

能在蘇聯全面撤回對中共的援助之下能在制度上不引發混亂，國防工業也能持續發展，1958年所確立的「以我為主」的軍隊建設方針是相當重要的。⁶⁵

然而這場會議所帶來的負面效果的衝擊也是很大的，特別反映在軍事訓練上。經歷這場反教條主義運動後，造成共軍內部深怕運用任何訓練方式都會被作為教條主義而被批鬥，在「抓政治保險，抓軍事訓練危險」的思維下，扼殺了共軍開展現代化軍事訓練的士氣。有資料統計，陸軍全訓師在1957年佔全軍的77%，1958年降為60%，到了1962年時僅剩下20%，⁶⁶此外還有停止師以上的軍事演習、軍事院校的課程受到衝擊，軍事訓練陷入低潮。這情況也造成之後羅瑞卿在軍中推行全軍大比武運動，力圖提振軍隊的訓練工作。

此外，過分強調「以我為主」的情況下，軍事理論研究只以毛澤東軍事理論為圭臬，將蘇聯及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理論的優點棄如草芥；雖然打破了對蘇聯教條的迷思，但卻把毛澤東的論著「教條化」。而建國初期提出的正規化、現代化口號則被認定是否定了「革命化」，被當成「錯誤的建軍路線」而加以反對，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後，以「突出政治」來加強「革命化」論述，現代化及正規化的口號則愈來愈少被提及了。⁶⁷而將工作上所面臨的問題當成是軍事路線問題及黨內鬥爭問題，這方法是相當不妥的，也造成之後中共黨內意見相左時，往往被形容為兩條路線的鬥爭。

最後，軍委擴大會議正逢中共開始進行大躍進運動，毛澤東在會議期間多次將推展大躍進運動相關文件轉批給參加軍委擴大會議的成員閱讀，⁶⁸而承擔大躍進領導工作的鄧小平也奉毛澤東之命到軍委擴大會議全體大會上發表講話，講話內容對國內形勢的分析讓聽眾感到興奮樂觀，⁶⁹這也掀起了共軍投入大躍進活動中，從參與建設到大辦民兵師、技術革新，都可看到共軍投入大躍進活動，這樣的行為也為後來文革時期共軍的「三支兩軍」立下了基礎。⁷⁰

⁶⁵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頁313。

⁶⁶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史要》（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頁253。

⁶⁷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217。

⁶⁸ 相關文件如〈關於向軍委會會議印發李富春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報告的批語〉、〈關於向軍委會會議印發李先念第二個五年財政計劃要點的批語〉，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73-276。

⁶⁹ 如當時在場的彭德懷秘書鄭文翰就有這樣的看法，見鄭文翰著，王焰、王亞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12。

⁷⁰ 鍾延麟，〈中共軍方對大躍進運動之參與、活動及其影響〉，出自宋永毅、丁抒編，《大躍進一大饑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與思辨》（九龍：田園書屋，2009），頁379-394。

第二節 革命化的建軍走向

1959 年廬山會議，彭德懷的「上書」被解讀為是向黨及毛澤東發動「進攻」的行動，最後彭德懷與支持彭的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被打為「反黨集團」並分別被調離軍隊、外交、地方第一線工作。彭德懷被撤職後，由林彪接替國防部長一職並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在林彪的主導下，軍隊的政治工作被更加強調，而軍隊對於毛澤東的崇拜也一步步被建立。

壹、 共軍高層的調整

一、 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後的情況

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後，共軍內部基於對「教條主義」的鬥爭，除了將仿效蘇軍經驗而建立的八總部縮編為三總部體制外，也將犯有「教條主義」錯誤的軍隊領導人調離現職。

粟裕因「個人極端主義」等罪名被解除總參謀長一職，調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並限制他與部隊的接觸；⁷¹蕭克、李達則因訓練總監部撤銷的緣故順勢被調出軍隊，轉任農墾部副部長與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經過這次會議之後，主張學習蘇聯經驗的共軍將領大多遭到撤換，「以我為主」成為之後中共建軍的基本路線。

共軍在 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召開前，對於總結共軍自建軍以來的戰爭經驗、編寫符合共軍的作戰條令早就有共識，只是在 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上大肆批判學習蘇軍出現的「教條主義」之後，制定「以我為主」的條令規章便更加迫切，在訓練總監部因「反教條主義」的浪潮而遭到撤銷後，編寫軍事條令與戰史的重擔便落在新成立的軍事科學院上。⁷²

二、 1959 年廬山會議後情況

1958 年共軍內部的「反教條主義」風波造成共軍內部出現一輪鬥爭，共軍高層出現洗牌，然而這次高階將領的更迭大多限於共軍有關軍事訓練、教育部

⁷¹ 《粟裕傳》編寫組，《粟裕傳》，頁 947。

⁷² 早在 1956 年時，中央軍委在對於總結共軍經驗，編寫戰史和符合共軍的條令規章上已有所共識，於是 1956 年 12 月 4 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以訓練總監部科學條令部為基礎，籌建軍事科學院，並任命葉劍英為籌備處主任，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頁 838。

門，並未影響到其它系統的人事。然而 1959 年廬山會議，當時主管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的「上書」舉動，被指責為企圖進行「反黨」，由於彭德懷身份敏感，為避免軍方內部支持彭德懷的勢力威脅到統治基礎，肅清彭德懷為首的「軍事俱樂部」成為毛澤東首要大事。

為解決彭德懷的信所引發的對於大躍進運動產生之問題，毛澤東決定以召開中央委員會來進行反擊，最終在八屆八中全會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定》在內的四個決議及決定。會議結束後，為了進一步揭發彭德懷及黃克誠「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問題，清理軍隊內部存在的「軍事俱樂部」成員，中共隨即在 1959 年 8 月 18 日舉行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指稱彭德懷是「單純軍事觀點」與「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倡導者，也是「教條主義的總根子」。

73

相對於 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1959 年軍委擴大會議的會議氣氛更為緊張，更多高階將領被列入批判行列，也讓共軍高層又進行新一波人事調整。「反黨集團」的首腦彭德懷被免去國防部長一職，主持軍委常務工作的任務及國防部長一職由毛澤東的親信林彪擔任；在林彪的建議下，總參謀長一職由同樣為毛澤東所信任的羅瑞卿擔任。⁷⁴

除了彭德懷與黃克誠外，還有許多高層將領受到牽連而被免去軍隊職務。時任總後勤部部長洪學智在廬山會議上對於彭德懷的「揭發」最不積極，並且為彭德懷提出一些辯解言論，導致他也牽扯進彭德懷的「反黨集團」。由於洪學智與彭德懷在韓戰過程中合作相當愉快，使得他被認為與彭德懷並非一般關係；同時洪學智自新四軍時期即與黃克誠有所合作，也被懷疑與黃克誠關係密切。因此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後，洪學智被免去總後勤部部長職務，下放到吉林省當農業機械廳擔任廳長，直到 1977 年才回到軍隊任職，擔任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⁷⁵總後勤部部長一職，由林彪得力手下，被稱為「四大金剛」之一的邱會作接任。

與彭德懷在朝鮮戰場上合作密切的志願軍副司令員鄧華與韓先楚，也遭到波及。在廬山會議中，鄧華對彭德懷的批判是採避重就輕的方式，因此被其它人指責是「假批判，真保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鄧華被劃為是「彭德懷軍事俱樂部」主要成員，雖然毛澤東之後將鄧華與彭德懷的關係定為是「鄧是彭的人。但是，鄧與彭是有所區別」，然而鄧華最終仍被解除瀋陽軍區司令員一職，被迫退出軍界調任四川省負責農業機械工作的副省長，1977 年才重返軍界，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中央軍委委員；相對於鄧華的狀況，韓先楚的遭遇幸運的多，雖然

⁷³ 姜華宣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頁 299-300。這次會議的規模相當龐大，大軍區領導除留一人值班外，其餘全部參加；省軍區司令員、政委和野戰軍軍長、政委全部參加；此外，全軍師以上單位各派兩名正職幹部參加，實際到會總人數為 1070 人。

⁷⁴ 李德、舒雲編著，《林彪日記》，下冊，頁 699、703。

⁷⁵ 洪學智，《洪學智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第 2 版），頁 585-589。

有人利用韓先楚與彭德懷的關係大做文章，但韓先楚獲得林彪的保護，最後仍繼續留任福州軍區擔任司令員。⁷⁶

時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萬毅，在廬山會議的小組會上討論彭德懷的信時，認為：「彭德懷同志把自己考慮的問題提出來，對於此次會議深入討論有推動作用；提出意見，精神是好的，是赤膽忠心的」，並表示「基本同意彭總的信」，因此在八屆八中全會上被迫公開檢討，並在緊接而來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遭受批判，被定為是「彭、黃反黨集團篡奪國防新技術的主要工具」，隨後被逐出軍界，下放為陝西省建委副主任，一直到 1977 年才重返軍隊任總後勤部顧問。⁷⁷

被貶責的高階將領，還有時任北京軍區參謀長的鍾偉，他也是對彭德懷問題反應最強烈的。在軍委擴大會議的綜合小組聯席會議上，鍾偉極力為彭德懷和黃克誠申辯，甚至表示「你們不是在逼彭總交代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嗎，算我一個，也把我拉去槍斃吧！」。鍾偉最後的下場同樣是被迫轉業，下放到安徽省農業廳任副廳長，⁷⁸直到 1980 年 12 月，中共中央軍委才為鍾偉進行平反。

在軍委擴大會議期間，共有 847 名軍隊幹部被重點批判，之後有 1848 名幹部被劃歸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⁷⁹軍隊幹部受到牽連的程度，比起 1958 年的軍委擴大會議有過之而無不及。

貳、新軍委、新措施

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後，在經濟上面臨「大躍進」運動所帶來的負面效果，各地出現災荒及物資供應缺乏導致基層將士出現反彈情緒；⁸⁰軍隊思想出現波動、混亂的結果導致軍隊發生許多重大意外事故，諸如 1959 年 12 月 1 日海軍在訓練過程中出現意外，造成潛艇在舟山群島外海沉沒與 38 人罹難，更甚的是在 1960 年 1 月 12 日的海軍航空兵駕機叛逃，更使得共軍高層必須正視軍隊失序的狀況。⁸¹為解決這樣的狀況，除了加強生產，安定部隊基本生活外，林彪更決定從政治工作著手，從思想上解決軍隊內部的不安狀況。

⁷⁶ 李意根，〈1959 年廬山會議上的上將們〉，《文史精華》（石家庄），2009 年總第 231 期，頁 20-22。

⁷⁷ 萬毅，《萬毅將軍回憶錄》（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8），頁 253-261。

⁷⁸ 尹家民，〈廬山會議後蒙冤的開國四將〉，《報刊薈萃》（西安），2007 年第 12 期，頁 57-58。

⁷⁹ 尹家民，〈廬山會議後蒙冤的開國四將〉，頁 57。

⁸⁰ 大躍進期間連十大元帥豬肉供應都出現狀況，軍隊基層物資短缺情況可想而知，見李逸民，《李逸民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頁 189-190；而為了加強農副業生產，海軍甚至利用現有船艦進行漁獲捕撈，以增加食物來源，見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 206。

⁸¹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頁 206-207。

一、學習毛澤東思想

在加強政治工作部份，林彪首先主張向毛澤東學習。林彪在 1959 年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形容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捷徑要先從毛澤東的著作著手，⁸²在林彪的推動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運動開始在軍隊內部展開。

林彪主張學習毛澤東的著作，必須「帶著問題學」，從毛澤東的著作中找出解決的辦法；這個想法在他對《關於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的批示上具體化成二十一字方針：「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⁸³同時為了快速學習毛澤東著作中的精華部份，他表示：「要背一點東西，首先是要把毛澤東同志著作中最精闢最重要的話背下來。腦子裡就是要記住那麼幾條」⁸⁴，因此林彪除了共軍編輯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讀本外，並從 1961 年 5 月開始從毛澤東著作中挑選最簡潔、精闢的句子刊登在解放軍報上，由於軍隊內部反應熱烈，最後解放軍報編輯部收集了 267 條毛澤東著作中出現的句子或講話，編成《毛主席語錄》，⁸⁵《毛主席語錄》的出版將學習毛澤東思想浪潮帶到最高點。

然而將毛澤東思想濃縮為幾個句子的方式雖有助於思想的推廣，但是卻有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疑慮，共軍高層內部也對於林彪的這種作法感到懷疑，這其中以掌管政治工作的羅榮桓質疑聲浪最高。

羅榮桓接替譚政第二次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後，多次對林彪所提出的學習毛澤東思想方法提出質疑，並公開地表示其意見，如他在 1960 年 10 月 28 日於政治學院的講話中就提到這樣的看法：

什麼叫系統？從實際出發研究理論，而不是從經驗主義出發。以經驗主義（態度）學理論不行。看問題不要帶片面性，所以許多東西都要很好解釋。

⁸⁶

羅榮桓在政治學院的講話因為是原始記錄，語句記錄可能比較不完整。但他跟兒子羅東進解釋關於如何學習好毛澤東的著作問題上，做出比較系統的闡述：

東進：

你四月八日來信收到，你所提出的問題，我簡略答覆如下：

⁸² 李德、舒雲編著，《林彪日記》，下冊，頁 700。

⁸³ 李德、舒雲編著，《林彪日記》，下冊，頁 791。

⁸⁴ 轉引自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臺北：新新聞文化，1997），頁 128。

⁸⁵ 吉元，〈《毛主席語錄》出版內幕〉，《炎黃春秋》（北京），2009 年第 10 期，頁 48-49。

⁸⁶ 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頁 810。

理論學習必須聯繫實際，因為理論是來自實踐，而又去指導實踐，再為實踐所證實、所補充。如果理論離開實踐，就會成為空談，成為死的東西。學毛主席的著作，亦不要只滿足於一些現成的詞句或條文，最要緊的是了解其實質與精神。

所謂帶著問題去學毛主席著作，絕不能只是從書本上找現成的答案。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事物是多樣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給我們寫成萬應藥方。⁸⁷

從羅榮桓的講話與寫給兒子的信可看出他要表達的意涵是認為系統（學習）和實際出發是一致的，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應該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以中共黨史為線索來學習毛澤東的著作，羅榮桓將這方法稱之為「一條線」的學習方法。透過這種方法才能理解毛澤東的某一判斷是在何種時空背景下針對何種問題而發的，才能理解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與方法；⁸⁸然而這一方式與林彪主張的學習毛澤東思想只要背好幾句警語是相去甚遠的，這也造成林彪與羅榮桓之間的矛盾加大，而林彪始終未正式公佈羅榮桓擔任總政治部主任的任命。

二、推行「三八作風」與「四個第一」

為加強政治工作在軍隊的推展，解決政治思想工作的問題，林彪決定在 1960 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這次會議雖然對共軍開展政治工作有相當的助益，但林彪藉由這次會議批判了與其意見相左的總政治部主任譚政，並以學習毛澤東思想為由大搞個人崇拜，積聚個人政治資本。⁸⁹

林彪為了加強軍隊政治工作，除了在軍隊內部推廣學習毛澤東著作外，還主張在軍隊中樹立「三八作風」。「三」是毛澤東在 1939 年時為抗日軍政大學成立 3 周年所撰寫的專稿中所提到的三句話：「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八」代表是抗大校訓中的八個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林彪在 1960 年 1 月的廣州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重提這三句話與八個字作為軍隊作風的準則，並將其合起來稱為「三八作風」。⁹⁰

然而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譚政對林彪的主張不能苟同，他認為應該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同時認為林彪將三句話與八個字簡單概括為「三八作風」的方式表示異議，認為這可能會讓人誤解與「三八婦女節」之間的關係，因此譚政在 1960 年 3 月至 4 月所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並未向與會人員宣

⁸⁷ 此信是當時就讀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羅東進寫給父親羅榮桓的一封信，信中除了向羅榮桓報告學習毛著的情況外，並就如何進一步學好毛著的事向羅榮桓請教，見羅東進，《我的父親羅榮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頁 351-352。

⁸⁸ 《羅榮桓傳》編寫組，《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第 2 版），頁 351。

⁸⁹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 226-236。

⁹⁰ 李德、舒雲編著，《林彪日記》，下冊，頁 727-728。

揚「三八作風」的概念，而總政治部之下的文宣品亦避開「三八」兩字。但譚政的抵制做法引發林彪相當不滿，除了多次指責譚政外，更趁譚政外出期間，命令總政治部下發《關於開展培養三八作風運動的指示》，《指示》內容將「三八作風」沒有提倡原因歸咎於受到彭、黃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影響，這成為之後批判譚政的一大罪狀。

為解決軍隊工作問題，林彪決定在 1960 年 9 月 14 日召開軍委擴大會議來進行討論。會議過程中批評譚政主持的總政治部工作偏離了方向，在林彪主持軍委工作後對軍委的許多指示沒有執行，並且抵制開展「三八作風」運動，會議批判的調子與 1958、59 年兩次軍委擴大會議一樣，都是逐步升級、上綱上線，甚至將譚政與彭德懷、黃克誠連繫起來，直指譚政是彭德懷「軍事俱樂部」的政治部主任，譚政的錯誤包括了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等。會議最後通過《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關於譚政同志錯誤的決議》，譚政被撤銷了軍委常委、軍委辦公會議成員與總政治部主任職務，降任總政治部副主任。⁹¹

軍委擴大會議開始前兩天，林彪先是召開軍委常委⁹²擴大會議確定軍委擴大會議的議程。在常委擴大會議上，林彪認為軍隊工作領域有四個相互關連的問題：首先是武器與人的關係；其次是各種工作與政治工作的關係；再次是政治工作中的各種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關係；最後是書本思想與活的思想的關係。要處理這四個關係，就是要堅持「四個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這種「突出政治」的精神被寫進了會議的最終決議《關於加強軍隊思想工作的決議》，雖然這項《決議》指出「中共在新時期的政治工作方向，繼承與發揚古田會議的傳統；肯定新中國成立 11 年來軍隊政治工作的成績，總結政治工作經驗並提出一些具體辦法」，但這種過度強調人與政治因素重要性的唯心主義觀點將一切事物完全對立起來，背離 1953 年底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確定的軍事建設總方針，這套「左」傾的做法讓軍隊建設受到不小的影響。⁹³

⁹¹ 斯夫、鹿海燕，〈林彪在譚政冤案的台前幕後〉，《黨史縱覽》（合肥），2003 年第 5 期，頁 21-23。

⁹² 廬山會議後，由於彭德懷和黃克誠被撤除中央軍委委員職務並由林彪接手軍委日常工作，中共中央軍委成員也略為調整。新一屆中央軍委主席仍為毛澤東；新設副主席一職，由林彪、賀龍及聶榮臻擔任；亦新設軍委常委一職，成員除正、副主席外，再加上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與譚政；軍委委員則是除常委成員之外，還有粟裕、陳賡、蕭勁光、王樹聲、許光達、蕭華、劉亞樓、蘇振華等人；軍委秘書長由羅瑞卿兼任，副秘書長為蘇振華、蕭向榮。

⁹³ 廖國良等著，《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頁 501-502；斯夫、鹿海燕，〈林彪在譚政冤案的台前幕後〉，頁 23-24。

三、「以我為主」的建軍路線

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之後，「以我為主」成為共軍重要的建軍路線，即便 1959 年廬山會議後林彪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這條路線基本上並未被改變。中共建國初期囿於經驗所限，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做法主要採全盤向蘇聯學習的方式來進行，軍事條令的編寫也大多以蘇軍現有條令為範本，然而照搬條文的作法容易與中國國情不相符合，以致衍生出許多問題而必須修正。在負責軍事科研、戰史編修與編寫條令的軍事科學院成立前，共軍已完成共同條令（包含內務條令、紀律條令、隊列條令）的制定，然而有關戰鬥條令的部份仍然使用蘇軍現有條令，因此毛澤東在 1958 年 6 月 29 日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座談會上指出：「軍隊訓練已經 8 年多了，連一本戰鬥條令都沒有搞出來，這次要集中一些有豐富經驗和戰鬥經驗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戰鬥條令來」。⁹⁴而這項任務，是由不久前才成立的軍事科學院來負責。

在 1959 年 7 月的「編寫合成軍隊戰鬥條令概則專業會議」上，時任軍事科學院院長葉劍英在開幕演講提到共軍的訓練與制定條令需要學習蘇聯，但也認為共軍也有許多寶貴的經驗，這些經驗要透過「學習毛主席的軍事著作」後才能獲得；而在 22 日的閉幕演講上，他也再次強調軍事科學研究工作須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指針，並總結共軍的戰爭經驗以作為條令編寫的基礎。⁹⁵在葉劍英的主持下，由軍事科學院、瀋陽軍區、南京軍區、十二軍、二十七軍、南京軍事學院等單位分工參與編寫《中國人民解放軍合成軍隊戰鬥條令概則》，這是一份概括性的條令，是合同軍隊行動的一般原則；而《中國人民解放軍合成軍隊軍師戰鬥條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合成軍隊團營戰鬥條令》、《中國人民解放軍步兵戰鬥條令》則是寫具體的情況，但是有「共性」的內容也要有所交待。⁹⁶當時協助葉劍英編寫戰鬥條令的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彭紹輝在 1961 年 11 月 3 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對於編寫共軍自己的戰鬥條令感到相當高興：

我軍戰鬥條令的誕生，使我軍在執行訓練、戰備和作戰任務時，有了依據。這對軍隊訓練和學術研究工作都有極為重大的意義。……這是值得全軍慶幸的一件大事。⁹⁷

除了條令編寫，軍事科學院還有另外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編寫共軍自建軍以來的戰史。戰史的編寫除了是理順共軍的發展歷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整理建

⁹⁴ 袁偉等編著，《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頁 909。

⁹⁵ 葉劍英，〈編寫合成軍隊戰鬥條令的意義〉，《人民網》，2010 年 10 月 2 日，取自：<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118416/118419/6994958.html>；葉劍英，〈深入開展全軍軍事科學研究工作〉，《人民網》，2010 年 10 月 2 日，取自：<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118416/118419/6994937.html>。

⁹⁶ 王新亭，《王新亭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8，第 2 版），頁 408-413。

⁹⁷ 王沂力，《獨臂上將彭紹輝》（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頁 390。

軍以來的各項戰役、戰鬥，從而得到各種經驗，作為之後條令編寫及訓練的基礎。軍事科學院成立後即設立戰爭歷史研究部，主要任務是將各個單位的戰史編寫工作統整到戰史部領導之下，並在「全軍分頭編史的基礎上，負責綜合編寫全軍戰史」。但 1960 年代初期軍事科學院的工作重心是在各級戰鬥條令的編寫上，加之歷史的編寫牽涉複雜的人、事、物因素，並容易受到政治因素所制約，故戰史編寫主要停留在建立組織、搜集資料上，⁹⁸隨後 1966 年中共開始進行文化大革命，戰史編寫更整個停頓下來。

總結自身經驗之餘，若未將這些經驗匯整成有系統的理論，是相當可惜的，因此毛澤東在 1958 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也提出要編寫自己的戰役教材，但如前面提到的，軍事科學院建院初期的任務在編寫各級戰鬥條令，所以《戰役學》的編寫工作一直到 1964 年才確立為軍事科學院的重點任務。葉劍英在 1963 年 11 月針對戰役教材編寫問題召開軍事科學院與高等軍事學院黨委聯席會議，他認為《戰役學》的編寫工作，需透過「學習毛主席著作和研究我軍戰例」作為基礎，而在解決建軍及作戰問題上，也要運用毛澤東思想來解決。⁹⁹然而《戰役學》等軍事理論的編寫過程同樣受到文革的干擾，一直到 1980 年代時才正式編寫完成。

經過幾年的摸索之後，共軍在關於建軍路線上逐漸找出自己的做法，不再盲目學習蘇軍的經驗，並確立了「以我為主」的建軍道路。然而其中的轉變卻造成共軍內部出現多次鬥爭，造成組織、人事上出現變動。而林彪加強政治工作的結果，讓基層部隊對於各種基礎訓練迷惘，也讓軍隊內部瀰漫著「抓政治保險、抓軍事訓練危險」的思想。

第三節 持續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

幾次的黨內鬥爭及中蘇關係惡化，讓共軍內部高層出現人事更迭外，也確立「以我為主」的建軍路線。林彪接掌軍委工作後大力鼓吹「政治掛帥」，強調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這些作法雖然讓共軍出現對訓練工作產生懷疑，並認為「人」的因素佔戰爭勝負首位，但共軍對於軍事現代化、訓練正規化的重視並未改變。林彪主管軍委日常工作後，「兩彈一星」的成功與核潛艇的研製，代表中共的軍事科技有了突破性進展；而為了消除突出政治帶來的負面效果，共軍內部多次提出要加強軍事訓練工作，並在 1964 年舉行全軍「大比武」運動。

⁹⁸ 鍾期光，《鍾期光回憶錄》，頁 576-579。1949 年 12 月 25 日中央軍委下達全軍編寫軍戰史的指示，具體由總參謀部領導，而當時總參規定，軍以下編寫軍史，軍以上編寫戰史。

⁹⁹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一九四七—一九八六）》，下卷，頁 905-907。

壹、 尖端科技的發展

中共建國之後，在國防科技部份因技術落後，相當仰賴蘇聯的幫助，中蘇雙方在武器技術轉移和尖端科技的發展上簽署相當多協議，但是中蘇關係破裂後，蘇聯單方面召回駐華專家，撕毀與中共簽署的多項合同，讓共軍的軍事科技發展陷入困境，然而毛澤東在 1960 年 7 月北戴河會議上指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¹⁰⁰所以中共並未因此停止尖端武器的研製工作，在重整腳步後，國防尖端科技的研製工作重新進行起來。

一、 導彈技術的研發

共軍在 1960 年廣州軍委擴大會議討論了國防尖端科技發展問題，最終決定「兩彈為主，導彈第一」的方針，並要求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最短時間內突破技術限制。¹⁰¹

中共的導彈研製工作由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主導，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共仿制蘇聯的 P-2 導彈，取名為「東風一型」於 1960 年 11 月 5 日發射成功，這是採用液態燃料的近程地地導彈。¹⁰²然而 1960 年 7 月蘇聯專家全部從中國撤離並帶走相關設計圖紙，使中共的導彈研製陷入困境，也讓中共的導彈研製工作從仿制轉向自我研製。

由於中共決定在尖端科技研發上採「自力更生」，為加強導彈研製工作，共軍在 1960 年大規模擴展第五研究院的人數，編制人數由 17000 人增加到 30000 人、技術幹部由 3500 人增加到 10000 人、工人由 9000 人增加到 11000 人，而導彈的研製也由近程導彈開始，再來是中程、中遠程、洲際，循序漸進，並開始針對固體燃料進行研究。¹⁰³

由於導彈的研製過程，正處於中蘇關係破裂、大躍進運動失敗導致三年全國大饑荒之時期，在技術缺乏與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中共內部對於需要高投入的導彈研發有些雜音。面對黨內的質疑聲浪，毛澤東率先表態對「兩彈」研製的支持，1962 年 6 月 8 日，毛澤東在約見楊成武、許世友時表示「對尖端武器的研究、

¹⁰⁰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 728-729。

¹⁰¹ 吳遠平等著，《新中國國防科技體系的形成與發展研究》（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6），頁 29。

¹⁰² 白潔，〈從國防部五院到七機部—王秉璋將軍談中國航天事業〉，《黨史博覽》（鄭州），2005 年第 3 期，頁 15。

¹⁰³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 280-301。

試製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放鬆或下馬」；¹⁰⁴而其它中共領導人也對導彈研製表示支持，如 1962 年 7 月 11 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周恩來提出要「研製出以打破美帝等八國的新半月包圍圈為目標的導彈」；鄧小平則表示「五院不僅不要減人，還要投資」；林彪則認為「軍隊要向導彈化方向走，常規武器和尖端導彈的研製不能兼顧時，寧可多把重點指向尖端」。¹⁰⁵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對於導彈的研製工作不僅沒有「下馬」，反而獲得更多資源投入，中共中央於 1964 年 11 月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為基礎成立第七機械工業部，王秉璋被任命為部長，中共並從三機部調撥 4 個工廠，四機部調撥 3 個工廠，五機部調撥 5 個工廠的方式來充實七機部，此時七機部人員增加到 9 萬 6 千餘人，人力物力大為增強，也讓中共的導彈研製工作持續推展。

二、核武器研製

與導彈研製過程一樣，中共在核武器發展上一樣相當艱辛。中共在 1956 年成立國務院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 年改稱第二機械工業部），主管核工業建設及核武器製造，如上一章所提到的，由於蘇聯內部的鬥爭，赫魯雪夫為取得中共的支持，於是對中共的核工業及核武器發展提供不少援助，從 1955 年到 1958 年，中蘇雙方就核能及核武器領域簽署 6 項協定，其中最為重要的是 1957 年 10 月 15 日所簽署的《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根據協定蘇聯將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¹⁰⁶然而中蘇關係惡化後，蘇聯對中共的核技術援助愈來愈緊縮，先於 1959 年 6 月 20 日照會中共將原先要移轉給中共的原子彈模型及資料延後兩年；1960 年 7 月 16 日，蘇聯更單方面宣佈，將停止援助中國原子能工業及國防工業的協議，並撤離蘇聯在華專家及終止供應材料設備，這對正要起步核武器發展的中共，無疑是重大打擊。

但是中共領導人對於核武器的研製大多是持肯定的態度，在蘇聯斷絕一切援助後，中共決定集中更多資源投入「兩彈」的研製上，在組織部份，先後成立國防工辦¹⁰⁷與中央專委¹⁰⁸兩個單位，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其次中共中央在 1961 年

¹⁰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下冊（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03），頁 1226。

¹⁰⁵ 葉青松，〈「導彈元勳」王秉璋首任人民解放軍第十七軍軍長〉，《黨史博覽》（鄭州），2009 年第 7 期，頁 38。

¹⁰⁶ 6 項協定包括兩個地質協定、一個科研協定、兩個工業協定、一個武器協定，見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頁 340-342。

¹⁰⁷ 中共的武器的研發與製造分屬於國防科委及國防工委，加上工業部門隸屬國務院，因此體系相當龐大且雜亂，橫跨國務院與軍隊兩大系統，歸口負責人有賀龍、羅瑞卿、聶榮臻。因為機構多，頭緒也多自然會有扯皮之事，見張勝，《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頁 244。因此周恩來在 1961 年國防工委北戴河會議上提出在國務院設立國防工業口，專責管理，於是中共中央在 11 月 8 日在國務院之下成立國防工業辦公室，主要任務在直接歸口管理二機部（主管原子能工業）、三機部（主管國防工業）和國防科委所屬單位之工作，並作為國防工委、國防科委之間聯繫協作及組織日常事務的機構；1962 年 12 月 5 日，中央

7月16日下達《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除從各地抽調領導幹部及技術人員加強二機部的人力資源外，也要求應先滿足二機部對於設備、儀表儀器的需求。¹⁰⁹除了調集人力、物力加強二機部研製實力外，當時中共有20多個部委、20個省市區之下的90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及共軍各軍兵種都動員投入核武器研製過程。¹¹⁰

在傾全國之力下，中共在原子彈相關技術研發上取得關鍵性突破，中央專委於1964年1月向中共中央報告原子彈爆炸測試可能在當年10月左右進行，經過近10個月的準備，中共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引爆第一顆自製的原子彈，正式躋身「核子俱樂部」；1967年6月17日，中共氫彈試爆成功，打破美蘇兩強對核武器技術壟斷的局面。¹¹¹

三、海軍艦艇研製

為加強海軍艦艇的研製工作，中共中央軍委在1961年6月7日成立以艦艇研製為主的研究院，正式名稱為「國防部第七研究院」（簡稱七院）。對於七院的工作重點，時任七院院長的劉華清在回憶錄中提到：

軍委批覆中，對七院的任務作了明確規定，以核潛艇工程為重點，實現造船規劃所規定的各型艦艇及其配套設備的研究、設計、試製、定型工作，直接為海軍建設服務。

書記處更進一步明確國防工辦職責，即規定國防工辦在工作上與國防科委、國防工委的關係是指導關係，兩委的各項工作，應先經國防工辦研究處理。1963年9月中共中央撤銷國防工委，其職責併入國防工辦，國防工辦的重要性更為加強，見〈關於成立國防工業辦公室的報告〉，載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422-424。

¹⁰⁸ 有鑑於「實現原子彈爆炸，是全國科學技術和工業生產水平的集中表現，絕非哪一個部門所能單獨辦到的」，羅瑞卿於1962年10月30日向中共中央遞交《關於加強原子能工業領導問題的報告》（有些書將該文件標題變更為《關於成立原子能工業領導的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的建議》），《報告》建議將原子能工業轉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設立一個專門委員會檢查、監督執行狀況，並建議由周恩來負總責，這是羅瑞卿考量到，核武器發展牽涉軍隊、國防科委、國防工委多個部門，這些單位之間並未有上下隸屬關係，似不宜由其中一個擔任領頭工作，故建議由周恩來擔任領頭工作。對於羅瑞卿的提議，毛澤東在該份文件寫下批語：「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隨後中共中央宣佈成立以周恩來為主任的「中共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以保證1964年實現原子彈爆炸的目標，見《羅瑞卿傳》編寫組，《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第2版），頁254-255；張勝，《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頁250-252。毛澤東的批語見〈對羅瑞卿關於成立專門委員會加強對原子能工業領導的報告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212。

¹⁰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11-513。

¹¹⁰ 張勝，《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頁259。

¹¹¹ 吳遠平等著，《新中國國防科技體系的形成與發展研究》，頁37-40。

但核潛艇所需技術複雜，當時中共的核技術尚未突破，加上正處經濟困難，中共決定將有限的資源集中在「兩彈」的研製上，因此中央軍委在對七院的工作批覆上提到：

在目前，艦艇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方針是：集中一切力量，首先完成「二四協定」轉讓產品的仿製任務，並通過仿製，掌握和消化蘇聯轉讓的技術資料，培養和鍛煉技術力量，逐步形成較完整的造船科學研究體系，為自行研究設計新型艦艇打下基礎。¹¹²

在此方針下，七院以先仿製後自行設計的步驟進行艦艇研製的工作。1964年3月，七院完成「二四協定」中蘇聯移轉的五種類型戰鬥艦艇的仿製工作，並在仿製的經驗上自行設計中小型艦艇。1965年的八六海戰及崇武以東海戰，共軍擊沉國軍章門、劍門號護衛艦及永昌號護衛炮艇，所使用護衛艦即是自行研製的，這可看出共軍在船艦研製上已取得相當成果。¹¹³而潛艇研製部份，在常規動力潛艇的研製上，中共在1967年開始自行研製第一代中型常規動力潛艇，其航速比先前仿製的潛艇之航速快了近40%；在核潛艇研製上，因中共經濟困難，1958年6月開始進行的導彈核潛艇研製工作不得不先「下馬」，直到1965年經濟好轉後中央專委才將核潛艇的研製工作重新「上馬」，先研製魚雷核潛艦、再研製導彈核潛艦，魚雷核潛艦在1974年8月交付海軍使用，而導彈核潛艦直到1983年8月才納入海軍戰鬥序列中。¹¹⁴

四、軍用飛機的研製

共軍軍用飛機的研製工作同樣是從仿製入手，再過渡到自行設計階段，但由於中共在韓戰戰場上投入空軍參戰，因此需要完善的軍機修理技術，共軍便利用維修之便，掌握軍機的構造、相關需要的零組件，從而初步掌握飛機生產製造技術。¹¹⁵

從1956年起，中共開始建立研製飛機所需的各類型研究機構，如氣動力、航空材料、工藝及飛行試驗研究所。為了完善研製體系，中共在1962年1月組建國防部第六研究院作為軍用飛機的研製單位。通過仿製生產殲6型超音速殲擊機、兩倍音速的殲7型殲擊機及轟6型中型轟炸機等機型所累積的經驗，中共自行研製了強5型飛機和殲8型高空高速殲擊機，這兩類型飛機的研製成功，代表中國軍用飛機的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¹¹⁶

¹¹²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第2版），頁294-295。

¹¹³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頁294-300。

¹¹⁴ 吳遠平等著，《新中國國防科技體系的形成與發展研究》，頁158-163。

¹¹⁵ 吳遠平等著，《新中國國防科技體系的形成與發展研究》，頁205。

¹¹⁶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下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175-178。

貳、 加強訓練工作

一、 提倡軍事訓練重要性與「郭興福教學法」的推廣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的「反教條主義」運動及林彪接掌軍委工作後主張「政治掛帥」的作法，讓共軍基層幹部普遍對於軍事訓練感到迷惘，深怕過度抓軍事的結果反而被認為是「教條主義」的同路人，這使得部隊訓練每況愈下。但1960年代初期由於中蘇關係破裂，導致中共陷入美蘇兩強夾擊之中，而國民黨利用大躍進運動失敗導致經濟社會一片混亂的局面，派遣小股軍隊及特務在中國東南沿海活動，大有「反攻大陸」的氣勢，所以如何將鬆弛已久的軍事訓練重新上緊發條，是共軍高層所需面對的。

這些問題到1961年時還是存在的，分管軍隊訓練工作的葉劍英鑑於軍隊訓練廢弛的情況，於1961年5月6日到6月7日間前往陸、海、空三軍調查訓練情況，在他上交給中央軍委的報告（即《關於軍事訓練問題向軍委的報告》）中提到軍隊的訓練問題，其一是如何掌握訓練的「少而精」；其次是訓練的領導問題，其中便提到軍隊訓練太過專注政治教育而排擠到原有訓練，以及基層幹部不敢「抓」訓練的現象：

……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仍然是：一是一般號召多，具體措施少，沒有把上面的東西和本部隊的情況很好地結合起來，使上級的指示落到實處。二是各項工作的安排不盡妥善，不少同志反映政治教育和生產勞動安排得過於集中，工作落到基層形成「橫隊前進」，有的同志形容今年軍事訓練有點像金門打炮、「打打停停」。在訓練工作本身安排上也有問題，幹部訓練還很不落實，許多訓練課目都推到了後半年，各級幹部工學矛盾還很突出。……

在報告的最後，葉劍英認為要解決上述的問題，應從改進領導作風入手，「帶領基層幹部，繼承我軍光榮傳統」；此外是要由「黨委抓總，統一安排」，四好為綱，以軍事訓練為主，統一安排各項工作。¹¹⁷為了加強軍事訓練工作及軍事訓練與軍事學術的結合，1961年7月，中央軍委成立軍事訓練和軍事學術研究委員會（簡稱軍委訓委），負責指導全軍院校和部隊的教育和訓練，由葉劍英擔任主任，粟裕與張宗遜為副主任。

¹¹⁷ 葉劍英，〈關於軍事訓練問題向軍委的報告〉，《人民網》，2010年10月2日，取自：<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118416/118419/6994199.html>。四好是指四好連隊，即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

由於林彪後來被認為是反革命集團首腦，所有罪名也都往他身上傾倒，1960年代初期共軍軍事訓練廢弛的問題，便認為是林彪的「突出政治」主張的結果，¹¹⁸然而事實上林彪對於軍事訓練有自己的見解，並非全盤否定軍事訓練的作用，如在1960年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就在閉幕會議上說到：

我強調政治掛帥，但是，不要以為政治掛帥就不要軍事，那不行的。事情總是由幾個方面合成的，缺了一樣就不行的。政治固然要，軍事也要。現在我們應該這樣想：軍事和政治比較，那個重要？沒有話說，政治第一。可是講時間，那個應該多佔一點，那個應該少佔一點？政治應該少佔一點，文化更應該少佔一點，軍事應該佔多些。軍事應該佔60%、70%以至80%。……¹¹⁹

又如在1961年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林彪也指出：

軍事訓練好。為什麼要把訓練提得這麼突出，過去內戰、抗戰時期，天天打仗，打仗就是訓練。現在不打仗，只有訓練，靠訓練來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不訓練就不能打仗，不訓練就要誤大事。……軍事學校主要是搞軍事訓練，軍事科學技術學校主要學技術，特種兵就更要以大量時間搞技術訓練。……現在有一種看法，好像搞軍事技術是單純技術觀點，這種看法不對。科學家如果不搞專業，只搞政治，那科學還搞得成嗎？我們的政治任務是共同的，但是要通過各種不同的專業綜合起來去完成。¹²⁰

從林彪的講話中可看出，雖然突出政治是主要的，但軍事訓練並不能就此放棄，反而需要更多時間在軍事訓練上，在這樣的背景下，找出新的軍事訓練方針是共軍高層的目標，最後發現南京軍區某單位副連長郭興福，施行的一套新的教學方式，對於士兵練好單兵、小組戰術動作頗有成效，這套「郭興福教學法」先被軍方雜誌《軍訓通訊》所報導，接著在1962年時南京軍區將「郭興福教學法」廣為宣傳並要求軍區部隊依此法訓練。¹²¹

而南京軍區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的做法也引起共軍高層注意，1963年12月24日，分管軍事訓練工作的葉劍英特別到江蘇鎮江觀察「郭興福教學法」的成效，觀察結束後表示「郭興福教學法是一個創造，是一個好方法」；隨即寫份報告給中央軍委和毛澤東，認為這一種教學法「不僅適合於部隊，而且適合於學校，不僅適合於步兵，而且適合於各軍種、兵種」。葉劍英的這份報告得到中央軍委與毛澤東的認同，1964年1月3日，中央軍委轉發了葉劍英這份報告，此後共軍內部掀起「郭興福教學法」的熱潮，並將軍事訓練推向高峰。¹²²

¹¹⁸ 徐焰，《六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頁215。

¹¹⁹ 李德、舒雲編著，《林彪日記》，下冊，頁775。

¹²⁰ 李德、舒雲編著，《林彪日記》，下冊，頁816-817。

¹²¹ 李谷城，《中國大陸政治術語》（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頁395。

¹²²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一九四七—一九八六）》，下卷，頁909-911。

二、舉行「大比武」

共軍內部推廣「郭興福教學法」之餘，為了檢測訓練成效，各軍區、軍兵種部隊紛紛舉辦各式「比武」大會，舉拔各自的「尖子」。為了進一步掀起練兵風潮，中央軍委決定在全軍進行一次全面的軍事訓練「比武」，並成立了全軍軍訓比武籌備委員會。

而這類的「比武」活動也引起中共高層的注意，甚至在毛澤東知道「比武」的情況後，向賀龍表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讓我也看看」，而毛澤東在觀看完濟南與北京兩軍區的比武情況後，對於全軍的訓練狀況表示讚許，並表示僅有「尖子」是不夠的，要在全軍中進行普及。在毛澤東的指示下，總參謀部、總政治部聯合下發《關於開展「三手」活動的情況報告》，要求把群眾性練兵和爭創神槍手、神炮手、技術能手活動結合起來，掀起一個更大規模的比、學、趕、幫、超的群眾性大練兵活動。¹²³而這股「比武」熱潮，一直到1964年7月上旬才告終，透過這次比武，1964年全軍步兵武器訓練獲得優等成績的師比1963年增加了4倍，神槍手、神炮手和技術能手也成倍地增長。¹²⁴

但共軍內部為了選出「尖子」部隊，並突出訓練成績，導致有些單位出現弄虛作假的情況，對此賀龍與羅瑞卿均給與嚴厲的批評，要求改正這種報喜不報憂的風氣，¹²⁵雖然這種作假的情況得到遏止，但1965年林彪批鬥羅瑞卿時，這情況成為羅瑞卿的一項罪狀。對於提倡「大比武」活動，林彪雖然沒有完全否定，然而在看了葉群與劉志堅針對「比武」問題在基層部隊的蹲點報告後，林彪雖然肯定1964年共軍的工作成績，並認為「1965年的軍事訓練一定要搞好」，但是「要糾正訓練過程中一些不適當的做法，使部隊訓練正常化」，要達到這個目標，除了「要切實控制軍事訓練時間」外，「今後兩三年都不要搞全軍的比武，軍區、軍、師大規模比武也都不搞，要搞就是團營搞一點」。¹²⁶在林彪表態後，全軍「大比武」運動戛然而止。

¹²³ 楊貴華編著，《共和國軍隊回眸：重大事件決策和經過寫實》（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頁235-240。

¹²⁴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史要》，頁256。

¹²⁵ 羅瑞卿傳編寫組，《羅瑞卿傳》，頁288、295-296。

¹²⁶ 李德、舒雲編著，《林彪日記》，下冊，頁872。

第四節 正規化與革命化兼容下的矛盾

以中共的角度來看，軍隊正規化與革命化之間本身並不衝突，如彭德懷在1954年1月「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的閉幕總結上說到「把我軍建設成為世界上優良的現代化革命軍隊」，¹²⁷這句話道盡中共高層幹部的想法。然而在實際運作中，建設一支現代化正規化軍隊與一支具革命光榮傳統的部隊如何取得平衡，一直是共軍的一大難題，而共軍建軍方向就不斷地在正規化與革命化之間擺盪，這種情況也造成軍隊內部鬥爭問題始終無法斷絕。

壹、「紅」與「專」的矛盾

在追求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與軍隊革命化的道路上，共軍始終無法擺脫「紅」與「專」的矛盾。「專」意指專業化的訓練以及正規的制度，一般的正規軍隊都需具備這類的條件，共軍因建軍之後即面對國軍的圍剿及對日抗戰，始終無法建立一套完備訓練計劃及進行專業訓練，一直到中共建國後，因參與韓戰而體認到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重要性，並得到蘇聯的幫助，開始走向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道路。

但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做法意謂著軍隊將只專注於軍事工作上，而不涉及其它事務，這與共軍建軍以來的傳統與任務有極大的牴觸。毛澤東曾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上提到軍隊的任務：

以為紅軍的任務也和白軍相彷彿，只是單純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絕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¹²⁸

因此共軍自建軍後，除承擔著戰鬥任務外，還負擔著做群眾工作以促進軍民關係、從事生產工作以建設根據地，共軍始終保持著這種「多功能原則」的傳統，因此在中共歷次的政治運動中，均可看到軍隊的身影，如軍隊投入大躍進運動¹²⁹和文化大革命的三支兩軍。

¹²⁷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彭德懷軍事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507。

¹²⁸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版），頁86。

¹²⁹ 軍方對大躍進活動的支持可參見鍾延麟，〈中共軍方對大躍進運動之參與、活動及其影響〉，頁374-394。

這種「紅」與「專」之間的矛盾隨著學習蘇聯經驗的深化而擴大，並在軍隊內部產生極大的爭論，然而要注意的是，「紅」與「專」之間的爭論並不是共軍內部鬥爭的主要焦點，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批判劉伯承、蕭克等人主要是針對學習蘇聯過程中產生的「教條主義」問題；1959年軍委擴大會議鬥爭彭德懷主要是因為彭德懷對於大躍進的批判，而非彭德懷主張軍事現代化主張，彭德懷被冠上「單純軍事觀點」的罪名是在批判擴大化，甚至變成「兩條路線鬥爭」之後。本章第三節提到，即便林彪接掌軍委日常工作後，對於軍隊的訓練工作並非完全廢棄，因此「紅」與「專」之間的爭論或許是中共的黨內鬥爭的一環，但絕非主要的問題點，齊茂吉甚至認為：「中共職業軍人在追求國防現代化的目標方向並無異議」；¹³⁰而朱方（Fang Zhu）更認為對「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批判，主要是為了掩飾批判背後的派系鬥爭目的，而非對西方型態的軍事專業主義（military professionalism）的抗拒；¹³¹舒曼則在檢視文革時期的資料中發現，「紅」與「專」的字眼從未出現過，¹³²因此若單純以「紅」與「專」的角度來探討共軍內部的鬥爭及路線變化，似乎不盡正確。

貳、軍事訓練問題與羅瑞卿的垮台

軍隊的訓練關係到一支部隊的戰鬥力，對於以武力奪天下的中共而言，軍隊戰鬥力強盛是其所重視的，然而對於強調政治工作的共軍而言，軍事訓練教育與政治教育的優先順序、比例輕重，有時是難以抉擇的，而必須取決於共軍高層的個人意志。林彪在得知大比武情況後了下列指示：

1964年全軍各方面的工作成績是很大的，部隊的政治情緒高，作風好，幹勁大，毛主席思想紅旗舉得高。總的來說，成績是主要的。但是，現在出現不好的苗頭，軍事訓練搞得太突出，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虛作假，搞錦標主義與形式主義，這樣下去，必然把政治工作衝垮，把其它一切東西衝垮，也會把軍事訓練本身衝垮。……要趕快採取措施，使軍政比例工作正常化，恢復1962、1963年的正常情況，糾正最近一個時期出現的失調現象。¹³³

林彪對於「大比武」運動帶來的練兵熱潮雖然沒有給予否定，但對於部隊將大多數時間投入單兵戰技訓練以求訓練成績達到高標準的做法感到不滿，認為這是一種「蠻幹」的行為；而忽視對政治工作的重視性，是否會再發生部隊叛逃或

¹³⁰ 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頁40。

¹³¹ Fang Zhu, *Gun Barrel Politics: Party-Army Relations in Mao's Chin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 p. 29.

¹³²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 564.

¹³³ 李德、舒雲編著，《林彪日記》，下冊，頁870。

殺人等違法違紀的事情，這或許是林彪下令取消「大比武」活動的考量點之一。這種立意雖然可以理解，但在軍事訓練與政治教育的比重上，林彪卻指示：

……政治教育時間佔十分之三，這個比例，無論如何不能減少，有時還要擴大一些。比如搞運動，政治教育就不是三成，而是四成，一半，甚至是七成。政治和軍事時間比例，一般情況是三比七，特殊情況應倒過來，七比三。時間上誰讓誰的問題，基本要確定一個原則，讓給政治。……¹³⁴

對比 1960 年軍委擴大會議的閉幕講話，林彪在 1964 年底的口頭指示對於軍事訓練時間是較為限縮的，甚至認為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可以壓縮軍事訓練時間，從這可看出林彪對於軍事訓練與政治工作優先性的問題，態度有了變化，這牽涉到黨內鬥爭的問題。

1964 年中共面臨的國際局勢是緊張的，美國在該年藉由北越魚雷艇攻擊美國軍艦的「東京灣事件」大舉出兵越南，導致越戰升級，美國對中國的威脅加大；¹³⁵中蘇關係則不因赫魯雪夫下台而好轉，雙方更因意識型態、爭奪共產陣營龍頭地位而更加惡化。¹³⁶

在美蘇雙方夾擊的態勢下，林彪卻認為軍事訓練時間不用過多，這頗為令人不解。然而從林彪在 1965 年底鬥爭羅瑞卿的事情來看，便可看出林彪對於軍事訓練看法的轉變應是針對羅瑞卿與賀龍而來，這其中牽涉到羅瑞卿與林彪、賀龍的關係。

1959 年軍委擴大會議雖由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但是戰爭時代所受的傷害，導致林彪身體有相當大的病痛，具體症狀有怕風、怕水、怕出汗等，¹³⁷這些怪病未隨著時間而消逝，反而有加劇的趨勢，因此 1963 年 9 月 27 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林彪同志長期生病，身體不好，我建議由賀龍同志主持軍委日常工作」，¹³⁸因此 1963-1964 年間中央軍委推行「郭興福教學法」及舉行全軍「大比武」的決策，是由賀龍及羅瑞卿所推定的，林彪在這個決策過程中並未實際參與。《賀龍傳》便將這件事情納為林彪日後迫害賀龍、羅瑞卿的理由之一，認為林彪害怕被賀龍取而代之；¹³⁹而《羅瑞卿傳》則提出林彪打倒羅瑞卿的理由在林彪認為羅瑞卿不再「緊跟」林彪，對林彪展開「封鎖」、「疏遠」，這意指林彪認為羅瑞卿倒向賀龍，被「架空」的疑慮導致林彪最終決定鬥垮羅瑞卿。¹⁴⁰但是舒雲編寫的《林彪畫傳》卻提出相反的論證，

¹³⁴ 李德、舒雲編著，《林彪日記》，下冊，頁 871。

¹³⁵ 徐焰，《六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頁 260-261。

¹³⁶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 442-447。

¹³⁷ 宋德金，《真實的林彪—林彪秘書最後的回憶錄》（香港：皇福圖書，2010，第 4 版），頁 78-82。

¹³⁸ 李烈主編，《賀龍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 713。

¹³⁹ 《賀龍傳》編寫組，《賀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第 2 版），頁 367-377。

¹⁴⁰ 《羅瑞卿傳》編寫組，《羅瑞卿傳》，頁 297-325。

直指打倒羅瑞卿的主要決策者是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感覺到羅瑞卿與賀龍，同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關係過於密切；加上羅瑞卿與葉劍英、聶榮臻等老師間有許多摩擦，這些共軍元老私下也密謀串連批鬥羅瑞卿，而林彪對於羅瑞卿反而是表示支持的態度，一直到 1965 年 11 月葉劍英奉毛澤東之命向林彪傳達不要再保羅瑞卿後，林彪才轉而支持打倒羅瑞卿。¹⁴¹

批判羅瑞卿第一步是先由批判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入手，指責其「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並指稱「蕭的後台是羅瑞卿」，之後葉群透過吳法憲之口，以在 1965 年 5 月過世的空軍司令劉亞樓之言為證據，指稱羅瑞卿有「向黨伸手與奪取軍權的野心」。為處理羅瑞卿問題，中共中央在 12 月 8 日至 15 日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羅瑞卿的問題，會後成立「中央工作小組」繼續調查。「中央工作小組」在 1966 年 3 到 4 月接連召開兩次會議，會議最終通過《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罪名包括「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逼迫林彪同志『讓權』、『讓賢』」等，並將羅瑞卿與彭真、陸定一、楊尚昆的問題聯繫在一起，形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¹⁴²

從中共建國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共軍在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道路上雖走得跌跌撞撞，但是方向卻是堅定的，即便林彪上台後主張「政治第一」，但是軍事現代化、正規化卻是毫無半點遲疑的。然而中共黨軍菁英具有「雙重菁英」特性，導致黨內出現變化時，作為黨的高級幹部一員的共軍高階將領，無可避免被捲入黨內鬥爭的漩渦之中而無法獨立於風波之外，黨內鬥爭帶入軍隊運作的結果，除造成共軍高層領導人出現多次更迭外，對於建軍路線及軍事政策均造成影響；黨內如此，與其它國家關係亦然。中蘇關係從向蘇聯一面倒到分歧，以至決裂，除了影響到對外決策外，對於共軍的建軍路線也產生決定性影響。

¹⁴¹ 舒雲，《林彪畫傳》（紐約：明鏡出版社，2007），頁 518-551。

¹⁴²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 471-475。批判羅瑞卿的上海會議除林彪等人事先知情外，其它與會的政治局常委及列席人員如劉少奇、賀龍、李井泉等人事先均不知情，以致在會上對羅瑞卿展開批判時，許多到會人「深感驚訝」。

第五章 文革的建軍方向 (1966-1976)

1966年中共開始進行文化大革命運動後，在「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思維下，無論是中央或地方的黨、政等機關，都受到造反派的衝擊，黨政領導人被批鬥、糾鬥的情況屢見不鮮，也因為各領導機構負責人被鬥倒鬥臭，造成黨政機構實際陷入癱瘓狀態。

在這場黨內鬥爭中，軍隊同樣無法置身事外，大批軍方將領主動或被動捲入文革漩渦中。軍隊人事的劇烈變動加上軍隊投入權力競逐，導致軍隊運作處於不正常狀態；軍隊大舉介入文革，也導致軍隊承擔繁重的業務。從1966年文革開始，到1971年林彪叛逃身亡這段期間，是共軍運作最為不正常時期；林彪身亡後，老幹部開始被「解放」出來，加上毛澤東重新起用鄧小平整頓軍隊，這才使軍隊運作逐漸走向正常。

第一節 軍事正規體系的破壞

在文革爆發之後，許多共軍高階將領都被鬥倒鬥臭，運氣好的「靠邊站」，運氣差的不僅被撤職、甚至遭到身體上迫害而終身致殘或死亡，在此情況下，原先共軍的體系亦遭到破壞而不得不以其它方式來因應。

壹、中央層級軍事體系的破壞

一、中央軍委及下屬各總部

對羅瑞卿展開批判、罷黜，是毛澤東決定進行文革的信號之一，而羅瑞卿被撤職前擔任多項要職：共軍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國防工辦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在羅瑞卿被指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成員之後，隨即被解除一切職務，由葉劍英接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職負責軍委日常工作，¹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

文革初期，為避免造反派衝擊軍隊而導致軍隊陷入混亂，葉劍英藉由主持軍委會之便，通過一系列措施將軍隊的文革運動納入軍隊各級黨委領導之下，使得

¹ 《葉劍英傳》編寫組，《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第2版），頁334。

軍隊運作基本上未陷入混亂。²但是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認為軍隊將文革活動置於黨委控制之下與限制「四大」³的做法極為不滿，向毛澤東、林彪「告狀」；而毛澤東、林彪在接見軍事院校紅衛兵時，有紅衛兵代表趁機向毛澤東、林彪表示軍事院校對文革運動的限制，林彪根據毛澤東的態度，提出軍隊這樣搞不行，命令全軍文化革命小組起草《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撤銷軍事院校黨委領導文革的規定，這使得造反派開始衝擊軍事院校機關，也讓軍隊運作受到影響。⁴

隨著文革的進展，江青、陳伯達所屬的中央文革小組與葉劍英等老師所組成的中央軍委之間的摩擦也愈來愈大，在1967年1月19日軍委碰頭會上，雙方就要不要在軍隊進行「四大」而展開交鋒，會議爭論十分激烈，會議過程中江青與陳伯達又將矛頭指向總政治部主任蕭華，說蕭華「反對林副主席、破壞文化大革命」等，並要求蕭華到群眾大會進行檢討，而葉劍英等老師則堅決反對展開對蕭華的批判，在會議沒有共識之下，主持會議的徐向前宣佈散會，並要求與會人員不得將會議內容外流。然而散會後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將會議內容對外散播，加上總政治部副主任袁子欽做的會議紀錄被造反派發現，於是當夜北京軍區及總政治部的造反派便企圖糾鬥蕭華，結果蕭華事先聽到風聲而逃到葉劍英住所才幸免於難。1月20日的軍委碰頭會，江青與葉劍英、徐向前等老師就糾鬥蕭華問題再一次進行爭論，葉、徐兩人甚至都拍了桌子，極為震怒，⁵這行為後來被說成是老師「大鬧京西賓館」。

隨後在1967年2月11日的中央碰頭會上，葉劍英等老師再次與中央文革小組起衝突，這起衝突被渲染成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雖然毛澤東並沒有打倒這些老師的念頭，但這些老師也被迫「靠邊站」。

從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揭開文革序幕後，軍方高層便受到不小衝擊，以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成員為例，1966年軍委常委鄧小平受到批判，1967年2月發生的「二月逆流」，使得三名軍委副主席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靠邊站」，1967年9月正式關押與劉少奇過從甚密的軍委副主席賀龍，軍委常委蕭華、楊成武等人也相後被打倒。1969年4月中共第9屆中央政治局通過新中央軍委名單，此屆軍委未設常委，由毛澤東擔任主席，六位元帥林彪、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擔任副主席，由軍委辦事組負責常務工作。913事件後，「四大金剛」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被隔離審查，軍委日常工作由葉劍英主持。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選出新一任軍委，仍由毛澤東任主席，在1975年2月中共中央取消軍委辦公會議，另組中央軍委常委會，仍由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之後葉劍英受「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影響，

² 《葉劍英傳》編寫組，《葉劍英傳》，頁334-335。

³ 四大指的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⁴ 李德、舒雲編著，《林彪日記》，下冊（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頁959。

⁵ 《徐向前傳》編寫組，《徐向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第2版），頁321-322。

被以「生病」為由停止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軍委日常工作改由陳錫聯主持。⁶中央軍委組織結構在文革時期多次變動，人員組成也隨著黨內鬥爭的進展，不斷有新的變化。

中央軍委領導人相繼被打倒，原先負責軍委日常事務處理的軍委辦公會議成員亦受到衝擊，1966年5月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有楊成武、蕭華、邱會作、張愛萍等4人，不久後蕭華、張愛萍因受到打擊而失勢，僅剩楊成武及邱會作支撐運作，1967年7月因楊成武陪同毛澤東到南方巡視文革執行情況，中央軍委日常運作將陷入癱瘓，因此周恩來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建議成立中央軍委臨時看守小組，由吳法憲任組長；在楊成武返回北京後，中央軍委臨時看守小組被撤銷，改為軍委辦事組，由楊成武擔任組長，「楊余傅事件」⁷後組長一職由總參謀長黃永勝接任；成員有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葉群等，之後再加上謝富治、李德生、張才千、溫玉成、紀登奎等人。軍委辦事組實際上取代了軍委辦公會議的職能，負責軍委日常工作，直到913事件之後軍委辦事組才被撤銷，軍委日常工作改由新成立的軍委辦公會執行。⁸

中央軍委下面的三總部同樣是文革的「重災區」。總參謀部是負責軍隊建設和指揮作戰的最高軍事統率機構，地位最為重要。然而在文革開始前，毛澤東為斷絕劉少奇獲取軍方的支持，罷黜與劉少奇日益親密的總參謀長羅瑞卿，由第一副總參謀長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之後為了肅清賀龍在軍隊的影響力，林彪藉由總參「八二五」事件鬥倒賀龍的老部下——總參謀部作戰部部長王尚榮，⁹在「楊余傅事件」後由林彪信任的黃永勝接任總參謀長，913事件後黃永勝因與林彪關係

⁶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史要》（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頁77-80。

⁷ 楊余傅事件指的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同時被撤職的事件，事件起因至今仍未有一個合理解釋。據王年一推斷，楊余傅事件的發生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江青等人為了反擊「右傾翻案風」而希望捉個「典型」整一下；第二個是楊、傅兩人被認為是晉察冀勢力，余則出身新四軍，這兩單位的首長聶榮臻、陳毅因「二月逆流」而飽受批判，這使得楊、余、傅三人失去「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信任，種下被打倒遠因，而文革時期楊、余、傅三人在一些事件處理上未如中央文革之意，加速出現三人挨整的結果。林彪指稱楊、余、傅三人被打倒的罪名在於楊成武聯合余立金鬥爭吳法憲、聯合傅崇碧要打倒謝富治，還要排擠許世友、韓先楚、黃永勝，並存在著山頭主義問題、衝擊中央文革小組等，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209-215。

⁸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9，第4版），頁676-677。

⁹ 總參「八二五事件」是指總參內部針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進行批鬥的一次活動。1966年8月25日針對總參外事局局長潘振武是否出席毛澤東接見坦尚尼亞軍事代表團的活動，總參內部對此分成兩派，其後潘振武在周恩來的同意下未出席這次的外事活動。但此舉動被外事局的造反派認為是毛澤東支持總參內部造反的決定，並認為這是默許對楊成武進行鬥爭，隨後外事局並對楊成武貼了大字報，作戰部也隨後跟進，而作戰部所貼的批判海報中因為有著作戰部正、副部長王尚榮、雷英夫的簽名，一個單純的批判活動瞬間升級為總參內部的「奪權」行動。雖然最後周恩來與毛澤東秘書徐業夫都親自證明同意潘振武的缺席行為是周恩來同意的，並對王尚榮、雷英夫的行為進行口頭批判，但林彪認為這起事件是「受賀龍指使的」，並認為這件事與之前空軍顛覆吳法憲、海軍反李作鵬、王宏坤等「同出一個根源」，最後王尚榮、雷英夫雙雙被免職。見陳虹，《總參「八二五」事件真相》，《黨史博覽》（鄭州），1999年第9期，頁20-22；李烈主編，《賀龍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779。

而撤銷職務，總參謀長一職空缺，直到 1975 年 1 月鄧小平接任總參謀長後，才結束總參謀部長期無首長的怪現象。

既然老師都無法倖免，下面部屬的悲慘情況可想而知。蕭華雖然在葉劍英、徐向前的保護下暫時過關，然而「二月逆流」後老師們紛紛「靠邊站」，在失去保護傘的情況下，中央文革小組開始攻擊蕭華及總政其它幹部，總政治部運作遂陷入癱瘓之中，之後軍委辦事組政工組取代總政治部領導，一直到 1969 年 10 月，總政治部才重新組建，李德生任總政治部主任，但直到 1976 年文革結束前，總政治部的職能一直未能恢復到文革前的狀態。¹⁰

總後勤部雖由林彪座下「四大金剛」邱會作擔任部長，但文革初期總後勤部同樣遭受到造反派的衝擊，總後勤部的造反派甚至公開揪鬥邱會作，據邱會作之子邱路光回憶，邱會作被總後勤部造反派帶走後，「造反派以『車輪戰』批鬥之，剃陰陽頭，坐『噴氣式』，罰跪請罪，致邱肩胛骨骨膜、肌肉斷裂，右肋骨斷裂並橫出，多次昏厥，命在旦夕」，之後在林彪的介入下，邱會作才被總後勤部造反派釋放。¹¹然而隨著邱會作在文革中逐漸得勢，總後勤部冤案並未減少，而有更激烈的趨勢，據曾任總後勤部部長的張震回憶，總後勤部在文革期間光「反黨集團」、「特務叛國外逃集團」等大大小小冤案有 35 個，3500 多人被立案審查，有 143 人被迫害至死，¹²總後勤部一樣是文革的「重災區」。

表 5.1 文革期間中央各總部負責人名單

中央軍委下屬各總部	正職幹部（任職時間）	副職幹部（任職時間）
總參謀部	楊成武（代理，1965.12-1968.03） 黃永勝（1968.03-1971.09） 鄧小平（1975.01-1976.04）	張宗遜（1954.10-1969.12） 張愛萍（1954.10-1967.08） 彭紹輝（1954.10-1967.08；1969.08-1976.10） 李天佑（1963.09-1970.12） 王新亭（1963.09-1972.10） 溫玉成（1967.11-1970.06） 吳法憲（1967.12-1971.09） 李作鵬（1968.09-1971.09） 邱會作（1968.09-1971.09） 閻仲川（1969.05-1971.10） 陳繼德（1970.07-1972.12） 張才千（1971.04-1980.01）

¹⁰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史要》，頁 93-94。

¹¹ 吳東峰，〈邱會作：老師大鬧懷仁堂的重要導火索〉，《歷史千年》，2010 年 10 月 6 日，取自：<http://www.lsqn.cn/ChinaHistory/other/201002/206369.html>。

¹² 張震，《張震回憶錄》，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頁 131。

		向仲華 (1972.04-1977.09) 李 達 (1972.10-1980.01) 王尚榮 (1974.11-1985.03) 胡 煒 (1974.11-1977.02) 何正文 (1974.11-1985.03) 伍修權 (1975.04-1983.01)
總政治部	蕭 華 (1964.09-) 李德生 (1970.04-1973.12) 張春橋 (1975.01-1976.10)	劉志堅 (1957.10-) 徐立清 (1960.12-1966.05 ; 1975.08-1980.01) 梁必業 (1960.12-1966.05 ; 1974.12-1982.09) 傅 鍾 (1954.10-1985.03) 袁子欽 (1966.06-1968.02) 劉西元 (1967.06-) 黃志勇 (1969.10-1972.07) 田維新 (1969.10-1974.03 ; 1974.12-1977.10) 魏伯亭 (1974.01-) 黃玉昆 (1975.08-1985.03)
總後勤部	邱會作 (1959.10-1971.09) 張宗遜 (1973.06-1978.02)	張令彬 (1954.10-1982.12) 饒正錫 (1957.04-1967.04 ; 1975.08) 張賢約 (1957.05-1975.08) 湯 平 (1962.10-1968.01) 張池明 (1962.10-1967.07) 張天雲 (1964.03-1975.08) 陳 龐 (1969.09-1971.09) 王希克 (1969.09-1971.09) 伊 文 (1969.09-1971.09) 封永順 (1969.09-1980.10) 張明遠 (1969.09-1971.09) 嚴 俊 (1969.09-1971.09) 丁先國 (1969.09-1971.09) 邱創成 (1970.12-1976.02) 徐 斌 (1973.08-1975.08) 張汝光 (1973.08-1982.12) 詹海英 (1973.08-1975.08) 孫洪珍 (1973.08-1985.05)

	栾學文（1973.08-1975.08）
	白相國（1973.10-1975.08）
	賀 誠（1975.05-1982.12）
	張 震（1975.05-1978.02）
	張元培（1975.05-1982.12）
	李 元（1975.05-1985.03）

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附卷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1949.10-1997.09）》。

二、各軍兵種的情況

受到文革衝擊的不只是中央軍委及下屬機構，各軍、兵種同樣受到大小不一的衝擊。海軍與空軍所受的影響是比較大的，文革前期林彪試圖掌握這兩個技術軍種，林彪失勢後則換「四人幫」有此企圖。各方勢力傾軋的結果，導致這兩個軍種的內鬥相當激烈，連帶影響到部隊的戰力。

共軍海軍第一任司令員蕭勁光雖曾在四野任職，與林彪有上下級關係，但是林、蕭兩的互動並不緊密，因此 1960 年代初期海軍接連幾次事故後，林彪便派李作鵬、張秀川前往海軍進行調查並調至海軍任職。李作鵬到海軍後，在幾次黨委全會及擴大會議上批判蕭勁光，逐步迫使蕭勁光「靠邊站」；羅瑞卿的倒台與文革的爆發，導致 1966 年 5 月海軍三屆三次全體會議的討論主軸成為肅清海軍內部的「羅瑞卿份子」，在李作鵬的引導下，會議批判蕭勁光「單純軍事觀點」、反對「突出政治」，致使會議上出現撤除蕭勁光、蘇振華的海軍司令員、政委職務的呼聲。

雖然中央軍委介入，指出「由會議本身作出決議撤換領導，這樣的方式是錯誤的」，¹³但李作鵬在林彪的支持下，漸漸取得海軍的控制權，在 1967 年 1 月的海軍十七級以上幹部會議中，海軍政委蘇振華被隔離審查，海軍常委會改組，由李作鵬任海軍第一政委、海軍黨委第二書記主持海軍常委工作，蕭勁光雖仍保留海軍司令員、黨委第一書記職務，但實質上已「靠邊站」，此後海軍在 1967、1968 年的黨委擴大會議、全體會議仍持續對蕭勁光的海軍建軍路線進行批判；913 事件後，蕭勁光因李作鵬的垮台而恢復主持海軍工作，但隨後張春橋以蕭勁光曾上了林彪「賊船」為由，再度對蕭勁光進行批判，主持海軍工作的權力也由蕭勁光轉移到蘇振華手中。「四人幫」倒台後，隨著鄧小平與華國鋒之間的鬥爭白熱化，海軍再次捲進中共黨內鬥爭中。¹⁴從此看出中共海軍在文革開始後到鄧小平成為第二代領導核心前，一直是各方人馬的爭奪點，以至海軍建設受到嚴重干擾，劉

¹³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頁 940。

¹⁴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 273-305；355-363。

華清在回憶錄中提到當時中共海軍存在著派性問題、領導班子團結問題等，是一個公認的「重災區」。¹⁵

共軍空軍也是受文革衝擊的重災區，空軍與海軍的情況類似，內部存在嚴重的派系問題，在文革時期「奪權」觀念下，空軍內部出現幾波的鬥爭，影響所及司令員一職甚至長期出缺。¹⁶共軍空軍的第一任司令員劉亞樓是林彪在統率四野的得力助手，然而 1965 年時卻因病過世，司令員一職由空軍政委吳法憲接任，余立金接替吳法憲任空軍政委，但這樣的安排卻讓空軍內部出現分裂。據吳法憲回憶，1966 年空軍黨委常委成員中主要分成三派：吳法憲、余立金、鄭任農是一派；劉震、曹裏懷、成鈞等人一派；張廷發則不歸屬於前兩派。在 1966 年 6 月召開的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體會議上，劉震等人針對吳法憲推遲文化大革命等問題向吳法憲、余立金發難，並將批判矛頭指向已逝世的劉亞樓，但在中央軍委的支持下，形勢漸漸對吳法憲一派有力，最後以吳法憲的勝利為告終，在會議結束後進行檢討時，吳法憲將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體會議最初刮起的「倒吳、余風」說成是賀龍在背後操控會議走向所致，成為日後批鬥賀龍的「罪證」。¹⁷

「楊余傳事件」後，余立金被撤銷空軍政委職務，改由王輝球接替。913 事件後吳法憲被撤職調查，中央軍委決定由曹裏懷、王輝球、鄭任農、薛少卿、梁璞五人組成領導小組，由曹裏懷主持空軍工作，但空軍司令員一職卻一直空缺下來，直到 1973 年 5 月空軍黨委四屆五次全體會議，才推舉飛行員出身的馬寧擔任空軍司令員。¹⁸文革後期「四人幫」急於在空軍中擴展勢力，王洪文多次插手空軍內部事務，但都被鄧小平的二野部下，時任空軍政委的張廷發所阻撓。

儘管「四人幫」插手空軍事務的企圖未能得逞，然而文革對空軍建軍道路的影響還是相當深遠的，除了訓練時間下降外，吳法憲在文革時也將空軍條令、條例、操典、大綱廢止，機械方面更缺乏維護工作，導致事故頻仍，這些情況在文革結束、鄧小平積極投入整軍工作後才有所改善。¹⁹

¹⁵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第 2 版），頁 414。

¹⁶ 913 事件後吳法憲受到牽連而被隔離審查，直到 1973 年 5 月任命飛行員出身的馬寧任司令員，這期間司令員一直空缺達 20 個月，見鄧禮峰，《建國後軍事行動全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 488。

¹⁷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冊，頁 570-593。吳法憲在回憶錄上指出 1966 年 7 月 20 日中央軍委常委會議討論了空軍黨委全體會議與領導班子問題，然而查遍葉劍英、聶榮臻與賀龍的年譜並未發現 7 月 20 日有召開軍委常委會議的紀錄，根據 3 人的年譜記載，討論空軍問題的軍委常委會議時間應在 7 月 11 日，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頁 941；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 1021；李烈主編，《賀龍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 755。有趣的是葉、聶兩人的年譜記載中，對於空軍內部的地下活動強烈批判，然而賀龍年譜的記載中全然不提此事，反而特別突出吳法憲與林彪的問題。

¹⁸ 孫國，〈空軍傳奇司令員—馬寧訪談錄〉，《黨史博覽》（鄭州），2007 年第 3 期，頁 46。

¹⁹ 慕安，〈空軍司令員張廷發的「非常歲月」〉，《黨史博覽》（鄭州），2006 年第 10 期，頁 12-15。飛機機械缺乏維護，其結果是飛機掉了鉚釘、發動機斷軸、或是渦輪片折斷，甚至有飛機炮彈膛炸與直升機在飛行中旋翼飛掉等情況出現。

除了海、空軍外，共軍其它軍、兵種中遭文革破壞很深的還有裝甲兵及第二炮兵兩個兵種。與海、空軍內部鬥爭不一樣的是，裝甲兵在文革時遭受的衝擊並非來自裝甲兵內部派系的奪權行為，而是與賀龍有關。賀龍被打倒之後，中央專案小組隨即成立「賀龍專案組」，針對賀龍的「問題」專案審查；而在賀龍專案組成立（專案組成立時間為1967年9月13日）前，1966年8月共軍第26軍政委程世清即寫信給林彪「揭發」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林彪肯定其看法，並根據許光達與賀龍的關係，斷定「賀龍準備利用許光達控制總參」；而賀龍被指控私下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後，許光達被指為是兵變的「總參謀長」，所以在「賀龍專案組」成立後，「許光達專案組」成為「賀龍專案組」底下的一個分案，許光達本人也被隔離審訊，在各式的批鬥、審訊之後於1969年6月去世，成為文革時期第一個被迫害致死的高階將領。²⁰

中共的國防科技在1960年代有重大突破，導彈與核子武器相繼試驗成功，為加強管理並統一指揮這些戰略武器，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將導彈的管理從原先的炮兵部隊獨立出來，組建「第二炮兵」。然而二炮部隊成立於1966年7月，此時中共內部處於黨內激鬥的時刻，黨內生活開始不正常，中共中央軍委在1967年7月才任命向守志為第二炮兵司令員，然而這項任命並未對外傳達，加上林彪的妻子葉群向二炮機關「打招呼」，指「向守志不是林總的人」，向守志尚未向二炮部隊報到即被打倒。直到913事件後，向守志重新被「解放」出來，並再度被任命為第二炮兵司令員。在向守志的回憶中，二炮部隊受到文革的衝擊，內部派系問題嚴重，因此葉劍英才希望向守志重新整頓二炮機關。²¹

貳、對地方軍區的衝擊

地方軍區在文革時期同樣受到相當大衝擊，即便是大軍區的司令員與政委都面臨軍區內部造反派程度不一的批鬥，輕則被「抄家」，重則被徹底打倒。

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被軍區機關的造反派貼上大字報，稱「瀋陽軍區執行的是修正主義路線」、要「火燒陳錫聯」、打倒「陳、曾、曾」，其住所也被抄。²²南京軍區則是有八個軍區領導人遭到揪鬥，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甚至被迫跑到大別山躲避造反派的騷擾；而福州軍區最緊鄰台灣，是對台作戰的前線，然而司令員韓先楚在1967年1月軍委擴大會議上也說道：「首都『三司』的學生跑來福州胡鬧，弄得戰備工作無法進行」。²³

上述這些軍區雖然受到軍區內部或外來造反派的衝擊，但基本上軍區領導人

²⁰ 李意根，〈大將許光達的「文革」歲月〉，《黨史文苑》（南昌），2008年第5期，頁36-40。

²¹ 向守志，《向守志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頁330-336；341-352。

²² 陳錫聯，《陳錫聯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第2版），頁352。「陳、曾、曾」是指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政委曾紹山、副司令員曾思玉。

²³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冊，頁647。

仍保持職務，軍區運作尚屬正常。文革初期受衝擊最大的軍區有兩個，一個是位於權力中樞、位置重要的北京軍區；另一個則是發生「七二〇事件」的武漢軍區。與其它軍區相同，北京軍區也受到內部造反派的衝擊，然而北京軍區的兩位主要負責人：司令員楊勇與政委廖漢生，在被批判的過程中並未獲得毛澤東與林彪的支持，因而被打倒，而楊勇、廖漢生倒台後，司令員與政委便一直由鄭維山和陳先瑞代理，直到中共九大召開後才真除，但由於北京軍區負責首都安全，且轄有重兵，故成為各方人馬力圖掌控的重點，也造成林彪和後來的「四人幫」相繼插手北京軍區事務。²⁴

武漢軍區在文革時期多次遭受造反派的進攻，武漢內部就擁護湖北省委與武漢軍區領導人與否，分裂成兩個派別：支持武漢軍區及省委的「百萬雄師」以及以「三鋼三新」為主的造反派組織。在軍區負責人陳再道的支持下，「百萬雄師」的勢力較為龐大，「三鋼三新」則被武漢軍區嚴厲打壓，成為「反革命組織」。但後來毛澤東介入，指示要承認「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同時認為「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希望以此降低武漢的對立局面，然而王力在1967年7月19日於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支一派、壓一派」的講話，挑起「百萬雄師」的怒火，這也讓當天晚上「百萬雄師」強抓王力並要求王力承認「百萬雄師」是革命組織；7月20日「百萬雄師」成員在武漢進行大規模遊行，打出「揪出王力」、「中央派人來，王力滾下台」的口號，這次的群眾公開對中央文革進行抗議的活動被稱為「七二〇事件」。²⁵後來中央文革將「七二〇事件」形容為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在背後操控的、「公然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道路」，最後兩人被打倒、撤職，這是繼北京軍區之後，又一個大軍區的軍事、政治一把手遭到撤職。

參、中央軍委的應對

文化大革命所掀起的造反、奪權熱潮對於軍隊的運作有極大的影響，葉劍英在1967年1月11日政治局會議上曾提到軍隊混亂的問題：

全國13個軍區，有7個軍區在搞運動。全軍157所院校都在搞運動。到處抓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目標就是抓各個軍區、軍種兵種領導人。三個總部，總後癱瘓了，總政幾乎癱瘓，總參部份癱瘓。海軍癱瘓了，空軍癱瘓了。凡癱瘓了的單位，所有的辦事機構、會議室、招待所全部被佔領。領導人來一個抓一個。²⁶

軍隊運作陷入癱瘓的情況令軍隊老幹部十分憂心，認為這種情況對於國家安

²⁴ 陳先瑞，〈廖漢生、楊勇被抓與所謂「華北山頭主義」問題〉，《百年潮》（北京），2000年第4期，頁19-24。

²⁵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第2版），頁528-535。

²⁶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卷，頁954-955。

全將造成極大威脅，因此在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人的力爭下，1月14日中共中央頒佈《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不許任何人衝擊人民解放軍機關」，並要求各軍區機關應分批進行文革運動，不要與地方同時展開。²⁷然而《通知》頒佈後造反派衝擊軍區的情況並未有所好轉，鑑於這種情況，當時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在1月24日晚上到林彪住處反映軍隊的情況，並要求「要搞幾條規定，如不能成立戰鬥組織、不能隨意揪鬥領導幹部、不准奪權等」，林彪贊同徐向前的意見，並表示：「軍隊不能亂，我同意軍委搞一個文件」，隨即向秘書口授七條內容，之後經葉劍英、聶榮臻與陳伯達討論後形成初稿，再送到釣魚台徵求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最後則送交毛澤東審批。²⁸

毛澤東在收到七條之後表示：「所定七條，很好，照發」，並建議再「加上一條關於管教幹部子女的問題」，徐向前等人經過討論後，將毛澤東的意見列入，從而變成八條。1月28日，毛澤東看完之後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這八條命令後來被稱為《軍委八條命令》。²⁹為了進一步穩定軍隊局勢，葉劍英等人在2月10日的中央碰頭會上提出《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個規定》草案進行討論，隔天毛澤東批准這份文件，這份《規定》明確規定陸、空軍的軍以下單位，海軍基地以下單位一律不搞「四大」，並要求軍以上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由黨委領導。³⁰這些命令的頒佈對於解決軍隊遭到內部造反派衝擊的情況是有正面幫助的。

《軍委八條命令》的出台為各軍區鎮壓內部造反派的行動創造依據，各個軍區開始取締造反派組織，然而這種行動引發中央文革不滿，而各地造反派也對軍方的強力鎮壓大表不滿，這種矛盾最終釀成青海「二二三事件」。³¹「二二三事件」中對群眾組織「八一八」進行鎮壓的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最後被認為是「密謀奪取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的權力」、「對革命組織進行鎮壓」而被打倒，鑑於各軍區鎮壓造反派的情況，林彪主張需要制定新的命令，1967年4月2日，林彪向毛澤東遞交《中央軍委十條命令》草稿，4月6日毛澤東批准發佈。《中央軍委十條命令》使得造反派衝擊軍區機關的情況再度重現，也讓軍隊與造反派的矛盾更加激化，這也成為武漢「七二〇事件」的遠因。

²⁷ 《葉劍英傳》編寫組，《葉劍英傳》，頁342。

²⁸ 徐向前，《徐向前元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頁622。

²⁹ 〈對軍委八條命令稿和中央通知稿的命令與修改〉，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203。

³⁰ 《葉劍英傳》編寫組，《葉劍英傳》，頁345-346。

³¹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頁461-463。

第二節 文革的建軍路線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展，中國幾乎所有人都被捲入，甚至在西方觀念中應保持獨立、客觀、中立的軍隊亦捲入這次活動中。³²這當然是共軍高階將領具有「雙重菁英」的特質，使得軍人在這次由黨中央發動的活動中無法置身事外；另外共軍從事非軍事活動亦是共軍建軍以來的傳統，這些因素綜合的結果導致文革時期共軍大量介入文革，共軍介入文革的過程被統稱為「三支兩軍」，這成為共軍在文革時期的建軍路線。

「三支兩軍」的概念形成，是由 1967 年 3 月 19 日中央軍委作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而來的。該《決定》首次將「三支兩軍」作為一個整體任務向全體共軍提出，命令全體共軍集中力量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³³

壹、 介入文革、支持左派、工業與農業生產

1967 年 2 月至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期間，每月投入「三支兩軍」的部隊人員，均達 90 萬左右。其中最多時是 1968 年上半年，全軍參加「三支兩軍」的人數達到 95 萬多人，空軍出動飛機 1976 架次、海軍出動艦艇 237 艘。九大以後，隨著各級「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形勢逐漸穩定，「三支兩軍」的人員也逐漸減少，到 1972 年上半年，全軍「三支兩軍」人員僅剩 27 萬左右。³⁴

中共在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間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並通過《五一六通知》，使文化大革命進入一個新階段，學校機關最先遭到衝擊而陷入癱瘓。軍隊文革運動的開展剛開始時是受到限制的，在《五一六通知》公佈之後，共軍總政治部便發出《關於執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將文革運動方向納入全軍黨委領導之下，並限制軍隊的文化革命範圍在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與出版界。³⁵然而這些限制後來便名存實亡，軍隊根本無法置身於文革之外。

軍隊正式介入文革，並協助「左派」奪權，現有文獻可查的時間，最早是 1967 年 1 月。1967 年 1 月 21 日安徽省軍區向中共中央軍委請示是否派出部隊到

³² 在西方社會中，認為軍人統治是獨裁政權、而文人統治是民主政權的展現，因此民主國家內部，透過憲法等法律形式，將軍人權力限縮到最小程度；杭亭頓主張，透過客觀上培養軍人專業主義，服從文人領導(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在主觀上擴張文人權威、掌握軍隊(su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兩種方式，提高文人權威及讓軍人在政治上保持客觀中立，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80-84.

³³ 〈軍隊新任務〉，《中國網》，2010 年 10 月 21 日，取自：
http://www.china.com.cn/book/txt/2009-07/27/content_18213316.htm。

³⁴ 鄧禮峰，〈「三支兩軍」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北京），2001 年第 6 期，頁 41。

³⁵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頁 120。

該省造反派組織批鬥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的大會，象徵「軍隊支持左派」。毛澤東接到林彪所轉呈的這篇報告後即批示：

林彪同志：

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請酌處。

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又及。³⁶

毛澤東在批示完之後，隨即召開一個小範圍會議，據參與會議的王力回憶，毛澤東再度指出過去緊急通知的規定是不對的，並要求王力「起草一個指示」，³⁷王力起草完後兩天，毛澤東隨即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下發《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左派群眾的決定》，在這《決定》之中，要求軍隊派出部隊支持左派群眾的奪權活動，在這道命令下，軍隊開始介入地方群眾組織的奪權活動。然而何謂「左派」，事實上很難認定，也因此各軍區負責人在認定左派的態度上，主要以哪一個群眾組織是支持自己來作為標準，然而這可能與毛澤東或中央文革的認定是相反的，因此在軍隊開始「支左」不久後，一些軍區陸續被毛澤東認為「犯了方向路線錯誤」³⁸。這樣的矛盾也是發生武漢「七二〇事件」最直接的因素。

共軍「支左」的工作從 1967 年 1 月開始，一直到 1972 年才結束，由於軍隊因進行「支左」而大量介入地方事務，導致軍人勢力日益高漲，並擔任重要的角色。最明顯例子如 1968 年 9 月，中國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大體成立後，29 個主任位子中由軍隊幹部擔任者有 20 個，而軍隊「支左」人員擔任縣以上革委會第一、第二把手的約有 5 千餘人，擔任委員的有近 5 萬人。³⁹

軍隊除了要支持左派外，還負擔兩項重要的支援任務：支持工業與農業生產。在文革的衝擊下，工業產值逐漸滑落，這情況引起毛澤東的警惕，因而指示林彪與周恩來，「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軍隊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⁴⁰因此在武鬥嚴重的工廠，都派有軍隊維持秩序，這種方式有助於讓癱瘓的工廠重新運作；至於支援農業的任務，則是軍隊協助農民進行農業生產，並成立領導生產辦公室以動員外出串連的農民回鄉生產。⁴¹

³⁶ 〈對南京軍區黨委關於是否派軍隊支持造反派的請示報告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 197。

³⁷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 846。

³⁸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852-853。

³⁹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頁 374。

⁴⁰ 〈在瀋陽軍區組織機關幹部到工廠宣傳毛澤東思想情況簡報上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 248。

⁴¹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頁 375。

貳、軍事管制與軍事訓練

軍隊大舉介入文革的結果，除了讓軍隊成為各機關內部造反派奪權重要憑藉外，也因為黨政機關的癱瘓，需要靠軍隊來填補權力真空及穩定局勢。因此在某些重要部門進行軍事管制成為最主要手段。

在 1967 年 4 月 3 日的軍委常委會議上，決定成立中央軍委軍管工作辦公室，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擔任；科研系統的軍事接管工作由軍委副主席聶榮臻負責；國防工辦與國防工業系統的軍事管制工作，由軍委常委粟裕負責。⁴²

在接受軍事管制部份，中央層級的單位（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被實施軍管和派出軍代表的單位即達到了 68 個，甚至連共軍總政治部都實行了軍事管制，除了總政治部外，總後勤部 301、302、309 醫院，北京軍區總醫院、京西賓館、高等軍事學院、軍事博物館、總政 1201 印刷廠、總後裝備技術研究院和軍事醫學科學院等被軍事接管。在地方層級部份，有 9 個省被軍事接管，即江蘇、浙江、安徽、廣東、雲南、青海、福建、西藏、河北；大城市有 25 個，如南京、廣州、旅大、汕頭、阜新、鎮江、無錫、常州、揚州、溫州、淮南、湛江、個舊等；全國實行軍管的專區（包括自治州和特區）19 個，如大慶特區、伊春特區、延邊、南通、舟山、銅陵特區、惠陽、佛山、海南島、麗江、臨滄、保山、思茅、紅河、文山、阿裏、玉樹等；全國實行軍管的縣 176 個。⁴³軍事接管的結果，讓原先受到文革衝擊而運作陷入混亂的各個機關逐漸穩定下來，對於機關恢復正常運作起了積極作用。

軍隊投入文化大革命最後一個任務，即對大、中、專院校的師生、職工進行軍事訓練。軍隊投入軍訓工作為毛澤東所支持，在一次接見革命師生的場合上，毛澤東談到：

派軍隊幹部訓練革命師生的方法很好。訓練一下和不訓練大不一樣。這樣做，可以向解放軍學政治，學軍事，學四個第一，學三八作風，學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加強組織紀律性。駐京部隊派幹部訓練革命師生的經驗很好，很有成效，應當在全國推廣。⁴⁴

在毛澤東的談話之後，中共中央、國務院即在 1966 年 12 月 31 日發出《關於對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短期軍政訓練的通知》，軍隊派出人員至各學校進行短期軍事訓練工作。然而這些屬於短期性，軍隊並未正式介入各單位的文化大革

⁴²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粟裕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 659；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 1059。

⁴³ 鄧禮峰，〈「三支兩軍」述論〉，頁 48。

⁴⁴ 〈關於派軍隊幹部訓練學校師生的談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 161。

命運動。一直到 1967 年 3 月 7 日，毛澤東在《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行全校大聯合和整頓、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的報告上批示：「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預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鬥、批、改的工作」。⁴⁵在毛澤東的批示之後，軍隊改變原先短期軍事訓練方式，轉而成全面參與各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據鄧禮峰的資料，1967 年 4 月共軍每天派出 5.3 萬餘人，對 3091 所學校的師生進行軍訓，到 1968 年接受軍訓的學校發展到 1.17 萬餘所。僅北京駐軍和北京軍區部隊在 1967 年即先後派出了 2.8 萬餘名指戰員，對 2041 所學校的 177 萬名師生進行了軍政訓練。⁴⁶

參、「三支兩軍」的成效與影響

共軍部隊大舉投入文革，從事「三支兩軍」的任務，對於穩定文革掀起的造反風潮所導致的混亂狀況，有相當大的助益，在一些武鬥激烈的省份實施軍管，以控制失控的秩序；保護重要機關與設施免遭破壞；支援農業與工業，以維持正常的生產。這些成果是相當重要的，避免了「全面內戰」、經濟與社會全面崩潰的情況在中國出現。

但是軍隊介入政治的情況同樣造成另一波矛盾點的出現，其中之一是軍管的結果，導致軍隊勢力快速膨脹，即便 1969 年之後各地黨委會陸續重建，軍隊仍過度介入地方事務，毛澤東對這種現象提出批評：

廣州軍區寫的那個三支兩軍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語上，我添了「認真研究」四個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視。地方黨委已經成立了，應當由地方黨委實行一元化領導。如果地方黨委已經決定了的事，還拿到部隊黨委去討論，這不是搞顛倒了嗎？⁴⁷

這情況反映出一個現象，即軍隊執行「三支兩軍」的任務後勢力過度膨脹，各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大多由軍隊幹部擔任一把手工作，即使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會陸續重建，亦由革委會主任的軍人擔任省委第一書記職務。這種情況令毛澤東相當憂心，故才在 1971 年於外地巡視時針對這種現象提出批判，同時也開始削減軍人在地方上的勢力。1971 年林彪事件後，若革委會主任有出缺時，大多以非軍人身份的老黨員接任；1973 年毛澤東在葉劍英的建議下進行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原先兼任省革委會主任之職的司令員在調到其它軍區後便不再出任

⁴⁵ 〈在關於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行全校大聯合的報告上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 250。

⁴⁶ 鄧禮峰，〈「三支兩軍」述論〉，頁 50。

⁴⁷ 〈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江山主編，《共和國檔案：影響新中國歷史進程的 100 篇文章》（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頁 359。

省革委會主任，透過這些方式，讓文革中勢力過於膨脹的軍隊退出地方領導崗位。⁴⁸

此外，軍隊介入群眾組織的鬥爭，「支左」的結果造成「支一派、壓一派」的情況，這造成群眾之間更加對立，也讓民眾與軍隊之間出現隔閡。而軍隊大舉介入文革，雖然能夠穩定混亂的局面，卻也造成軍隊許多工作無法進行，影響軍隊的日常訓練工作。針對「三支兩軍」是利還是弊的問題，鄧小平有下列的看法：

對於「三支兩軍」，只講一句話不好，光戴帽子不好，一定要講兩句話。第一句話：當時軍隊不出面不能維持局面，出面是正確的，「三支兩軍」是起了積極作用的。第二句話：「三支兩軍」給部隊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帶來了許多壞東西，對軍隊的威信損害很大。比如派性，還有一些「左」的東西，相當大的成分是從那裡來的。⁴⁹

表 5.2：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名單

原任			更動後		
地區	主任	軍內職務	地區	主任（前任被撤職時間）	軍內職務
黑龍江	潘復生	黑龍江省軍區第一政委	黑龍江	汪家道(1971) 劉光濤(1974) 楊易辰(1971)	少將、黑龍江軍區司令員 少將、黑龍江軍區第一政委 黑龍江軍區第一政委
山東	王效禹	山東省軍區第一政委	山東	楊得志(1971) 白如冰(1975)	上將、濟南軍區司令員 濟南軍區第一政委
貴州	李再含	貴州省軍區第一政委	貴州	藍亦農(1969) 魯瑞林(1973) 馬力(1977)	大校、昆明軍區副政委 少將、昆明軍區副司令員 貴州省軍區第一政委
上海	張春橋	南京軍區第一政委	上海	蘇振華(1976) 彭沖(1979)	上將、海軍政委 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
山西	劉格平	山西省軍區第一政委	山西	謝振華(1969) 王謙(1975)	少將、陸軍 69 軍軍長 山西省軍區第一政委
北京	謝富治	上將、中央軍委委員	北京	吳德(1972) 林乎加(1978)	北京軍區政委 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
青海	劉賢權	少將、青海省軍區司令員	青海	譚啟龍(1977) 張國聲(1979)	青海省軍區第一政委 青海省軍區第一政委
內蒙古	滕海清	中將、內蒙古軍區司令員	內蒙古	尤太忠(1971) 孔飛(1977)	少將、內蒙古軍區司令員 少將
天津	解學恭	天津警備區第一政委	天津	林乎加(1978)	天津警備區第一政委

⁴⁸ 〈文革中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主任〉，《新浪博客》，2010年10月22日，取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1104ee0100avw1.html。在林彪事件前，有八個革委會主任調動，其中除了雲南省由文職的周興接任外，山西、貴州、河北、山東、黑龍江、內蒙古與西藏等7個地方的革委會主任仍由軍人擔任。直到林彪事件後，非軍人身份黨員才開始大量出任革委會委員，直至革委會取消前，29個革委會主任中，僅於5人具軍人身份。

⁴⁹ 劉炳峰，〈中國人民解放軍「三支兩軍」的前前后后〉，《黨史縱覽》（合肥），2006年第1期，頁8。

中共軍事路線的轉變—黨內鬥爭所扮演之角色（1949-1976）

原任			更動後		
				陳偉達(1978)	天津警備區第一政委
江西	程世清	少將、江西省軍區政委	江西	江渭清(1972)	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
甘肅	冼恆漢	中將、蘭州軍區政委	甘肅	宋平(1977)	甘肅省軍區第一政委
河南	劉建勳	河南省軍區第一政委	河南	段君毅	河南省軍區第一政委
河北	李雪峰	北京軍區政委	河北	劉子厚(1970)	河北省軍區第一政委
湖北	曾思玉	中將、武漢軍區司令員	湖北	趙辛初(1975) 陳丕顯(1978)	湖北省軍區第一政委 湖北省軍區第一政委
廣東	黃永勝	上將、廣州軍區司令員	廣東	劉興元(1969) 丁盛(1972) 趙紫陽(1974) 韋國清(1975)	中將、廣州軍區第二政委 少將、廣州軍區司令員 廣州軍區政委 上將、廣州軍區第一政委
吉林	王淮湘	少將、陸軍第16軍政委	吉林	王恩茂(1977)	中將、吉林軍區第一政委
江蘇	許世友	南京軍區司令員	江蘇	彭沖(1974) 許家屯(1977)	南京軍區第二政委 江蘇省軍區政委
浙江	南萍	少將、浙江省軍區政委	浙江	譚啟龍(1972) 鐵瑛(1977)	浙江省軍區第一政委 少將、浙江省軍區第一政委
湖南	黎原	少將、陸軍第47軍軍長	湖南	華國鋒(1970) 毛致用(1977)	湖南省軍區第一政委 湖南省軍區第一政委
寧夏	康健民	少將、蘭州軍區副司令員	寧夏	霍士廉(1977)	寧夏自治區軍區第一政委
安徽	李德生	少將、陸軍第12軍軍長	安徽	宋佩璋(1973) 萬里(1977)	大校、安徽省軍區第一政委 安徽省軍區政委
陝西	李瑞山	陝西省軍區第一政委	陝西	王任重(1978)	無
遼寧	陳錫聯	上將、瀋陽軍區司令員	遼寧	曾紹山(1975) 任仲夷(1978)	中將、瀋陽軍區政治委員 遼寧省軍區第一政委
四川	張國華	中將、成都軍區政委	四川	劉興元(1972) 趙紫陽(1975)	中將、成都軍區第一政委、 司令員 成都軍區第一政委
雲南	譚甫仁	中將、昆明軍區政委	雲南	周興(1970) 賈啟允(1975) 安平生(1977)	昆明軍區政治委員 雲南省軍區第一政委 雲南省軍區第一政委
福建	韓先楚	上將、福州軍區司令員	福建	廖志高(1975)	福建省軍區第一政委
廣西	韋國清	上將、廣州軍區第一政委	廣西	安平生(1975) 喬曉光(1975)	廣西軍區第一政委 廣西軍區第一政委
西藏	曾雍雅	少將、西藏軍區司令員	西藏	任榮(1970)	少將、西藏軍區政委
新疆	龍書金	少將、新疆軍區司令員	新疆	賽福鼎·艾則孜(1972) 汪鋒(1978)	中將、新疆軍區第一政委 新疆軍區第一政委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文革中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主任〉、《「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及相關資料整理。

第三節 軍隊的重新整頓

共軍介入文化大革命，讓原先的軍隊訓練逐漸廢弛，而且為了推動「三支兩軍」，軍隊亟需投入大量人力，這也造成共軍規模快速膨脹。面對軍隊這種不正常發展，在林彪事件之後，共軍開始進行整頓，試圖將軍隊的發展拉回正常的軌道。共軍的整頓主要分成兩階段，首先是九一三事件後由葉劍英主導的改革；其次是鄧小平第二次復出擔任共軍總參謀長後主導的軍隊整頓工作，然而這項工作卻因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而告終。

壹、 軍隊訓練的荒廢

文革時期由於共軍要支援「三支兩軍」的工作，加上中蘇關係惡化到出現局部戰爭的情況，軍隊人員快速膨脹，在 1971 年全軍總人數比 1959 年增加 350 萬，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 20%，機關和非作戰人員也出現大量超額。⁵⁰

部隊人員大量增加，然而軍事訓練卻不斷下滑。這起因於 1966 年 8 月中共中央軍委常委會通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改革部隊軍政教育時間比例的決定（草案）》，此《決定》規定部隊的教育訓練上政治教育時間需佔 50%，在軍訓時間上，全訓部隊為 40%，半訓練半生產部隊為 20%，生產部隊為 10%，並要求「在給予部隊任務、安排工作時間的時候，一定要突出政治，一定要優先考慮政治教育的需要」，而文革時期許多主管軍事訓練的幹部或是曾主張加強軍事訓練的幹部都面臨被批鬥的命運。⁵¹在這樣情況下，共軍除了 1969 年在珍寶島事件後，進行了應急性戰備訓練，以及 1970 年毛澤東命令部隊進行千里野營拉練外，基本上軍事訓練處於停滯。

共軍總參謀部軍訓部在 1972 年 1 月向中共中央軍委提出《關於軍事訓練情況和建議的報告（初稿）》，提到文革開始以來軍事訓練的問題。以陸軍為例，共軍戰略預備隊 13 個軍、17 個特種兵師，1971 年沒有一個完整的師落實全訓；海軍部份，潛艇第 2 支隊按 1970 年的計劃，政治學習、軍事訓練、勞動生產的時間比例為 5:4:1，然而軍事訓練實際時間僅 17%；空軍在訓練飛行員上，1956 年共軍戰鬥機飛行員每人每年平均訓練時數為 78 小時，但從 1966 年到 1971 年 8 月止，每人每年平均訓練時數僅 38 小時。而由於不重視訓練工作，部隊對於維修裝備等相關技術日益生疏，以致某海軍潛艇支隊近 70%的潛艇不能出海。因為訓練不受重視，導致訓練彈藥、油料等供應問題無人重視，這種惡性循環的結果導致訓練更加低落，有的坦克部隊長期缺乏訓練，有近 50%的炮長沒有參加實彈

⁵⁰ 程中原、夏杏珍，〈鄧小平、葉劍英與 1975 年的軍隊整頓〉，《縱橫》（北京），2003 年第 8 期，頁 4。

⁵¹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史要》，頁 257。

射擊。⁵²

共軍培養各種階層軍官、技術人員的軍事院校，在文革時期也遭到大規模的整併、撤銷。共軍的最高軍事學府：高等軍事學院、軍事學院與政治學院，先是實施軍管、進而被撤銷。根據統計，1970年共軍全軍軍事院校僅剩43所，比起院校數量最高峰時有147所相比，共被裁撤了104所；而原先高等軍事學院、軍事學院與政治學院三所學校共有教員1060人，在三院校被撤銷整併為軍政大學後，僅留103人，這對共軍軍事院校教育無疑是重大打擊。⁵³張震回憶軍事學院被裁撤時，提到遣散這批教員打擊了軍事教育，而學院的教學設備、器材、各種教研資料與教材被破壞，都讓日後軍事教育的恢復增加不少困難。⁵⁴

貳、 九一三事件後的軍隊整頓

九一三事件後，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同時改組軍委機構，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以處理軍委日常工作。擺在葉劍英眼前的，是如何應對部隊訓練廢弛的問題。

恢復軍事院校的運作是提升軍隊訓練水準方式之一。1973年4月11日，中共中央軍委批准成立由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聯合成立的全軍院校調整領導小組，由共軍副總參謀長彭紹輝擔任組長。該小組經過幾次討論後，在1973年11月向中共中央軍委提出《關於全軍恢復和增建41所院校的報告》，其中恢復與增建指揮院校19所，軍醫學校12所，恢復專業技術學校10所。到了1975年10月，41所院校的恢復與增建全數完成，共軍的軍事院校數量達到84所，其中有指揮學校38所，專業技術學校44所，預備學校2所。⁵⁵

軍事院校的恢復有助於共軍軍隊幹部培養工作，以獲得軍隊建設所需的各種指揮及專業技術人才。然而在提升軍隊整體戰力上，仍需改變文革時期對軍隊基礎訓練的漠視，轉以加強軍隊各軍、兵種的基礎訓練。

各軍兵種的基礎訓練有各自的內容，陸軍步兵部份主要加強射擊等單兵訓練工作，並要求增加夜間訓練時間；炮兵、裝甲兵主要是進行火炮射擊訓練；工程兵主要是加強構築工事及搭建橋樑等項目；第二炮兵則是設法提高部隊專業技術並進行導彈實射。海軍部份主要著重在艦艇的專業基礎訓練，以提高技術與戰術水準。空軍部份則增加飛行員訓練時間、恢復空戰訓練項目等。經過兩年的加強訓練後，至1974年共軍野戰部隊全面落實表定90天訓練，並有79個陸軍師參

⁵² 轉引自劉志青，〈「九一三」事件後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的恢復〉，《黨史研究與教學》（福州），2005年第1期，頁26。

⁵³ 蘇士甲，《中國人民解放軍院校發展史》（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1），頁546-548。

⁵⁴ 張震，《張震回憶錄》，下冊，頁69-70。

⁵⁵ 王沂力，《獨臂上將彭紹輝》（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頁451-452。

加全訓；海、空軍有 80%以上戰鬥部隊、二炮 55%的發射營參加全訓。在訓練成果上，共軍炮兵的首發命中率，由 913 事件前的 20%上升到 85%；空軍戰鬥機飛行員數量也由 1971 年的 2.1%上升到 32%；海軍部份，東海艦隊水面艦隊正副艦艇長，能在複雜條件下進行指揮的，由 19.3%增加到 27%。⁵⁶

加強基礎訓練之餘，共軍也針對任何可能的威脅重點加強訓練。1970 年代中共國家安全最大威脅主要是來自蘇聯，雙方甚至在 1969 年黑龍江上的珍寶島爆發武裝衝突。為防範蘇聯的攻擊，共軍便針對蘇聯攻擊中國的任何攻擊模式進行研究，最後發展出「三打三防」的訓練方針。「三打」主要是針對蘇聯對中國可能使用的戰術，即地面進行機械化作戰、輔以大量戰鬥機、轟炸機，並利用直升機進行突襲，因此「三打」重點在打坦克、打飛機、打空降。而為應對蘇聯的核生化攻擊，「三防」重點在防原子、防化學、防生物武器。共軍推廣「三打三防」的訓練是繼 1960 年代「郭興福教學法」後，又一次在共軍內部掀起群眾性練兵高潮，透過這樣的做法，加強對蘇軍各種可能攻擊戰術的認識，提升共軍指揮官在面臨類似狀況的指揮應變能力。為了總結「三打三防」的訓練成果，共軍於 1973 年在張家口地區組織一次大規模諸軍兵種協同打敵集群坦克研究性實兵演習，這情況如同「郭興福教學法」所掀起的「全軍大比武」活動，都在共軍內部掀起練兵熱潮。⁵⁷

913 事件後，中共除了針對軍事訓練廢弛的狀況加以整頓外，對於軍隊領導體系亦進行整頓。首先是 913 事件後，一些軍隊的老幹部被「解放」出來，這些被「解放」的老幹部重新回到軍隊任職。⁵⁸其次，文革時期軍隊勢力過度膨脹問題引起毛澤東注意，為了抑制地方軍人的勢力，改變地方軍人久任其位的情況是相當重要的。毛澤東在 1973 年 12 月 12 日政治局會議提議全國各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他在會議上表示：

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員起不了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幾年了，主要問題是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政治委員不走。⁵⁹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葉劍英主持了這項中共建國以來大軍區領導人大規模調動的工作。具體做法是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與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對調，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與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對調，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對調，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與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對調。

⁵⁶ 劉志青，〈「九一三」事件後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的恢復〉，頁 28-29。

⁵⁷ 楊貴華編著，《共和國軍隊回眸：重大事件決策和經過寫實》（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頁 269-277。

⁵⁸ 如受賀龍冤案影響的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因賀龍被部份平反之後，被重新解放出來，並被任命為軍事科學院政委，見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頁 323-324。

⁵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下冊（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03），頁 1672。

透過這次對調，使原先兼任省革委會主任的司令員，不再兼任新職所在地的省革委會主任或省委第一書記，藉此削弱軍隊領導人對地方黨政事務的干預；此外，由於限制每位司令員只准帶秘書、警衛員等七人，這種不帶原有班底到生疏地區任職的做法，無形中也削弱了司令員的權力。

最後，則是透過司令員對調的方式，清查各大軍區與林彪的關係，如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丁盛、劉興元、杜平、李德生等人。江青等人也期望利用這個機會，鬥倒一些與江青等人意見相左之軍隊將領，但各大軍區負責人最終仍在毛澤東保護下過關，使江青等人不但沒有達到目的，還與各大軍區領導人出現嚴重矛盾，這也使得江青等人在毛澤東死後，無法取得軍隊一方的支持。⁶⁰

參、鄧小平的復出與整軍

毛澤東在 1973 年 12 月 12 日政治局會議除了提出要進行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任務外，他也在會議上透露要將鄧小平重新拉回中央領導崗位上：「我和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參加軍委，當委員。是不是當政治局委員以後開二中全會確認。」而在 14 日毛澤東與政治局部份委員的會面上，毛澤東明確指示鄧小平的職務：

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了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指鄧小平）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參謀長吧。⁶¹

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後，在政務上協助周恩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在軍事上則輔佐葉劍英在軍隊事務上的工作。依照 1975 年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共軍總參謀長，與葉劍英一同推動共軍整頓工作，召開了延宕 3 年的軍委擴大會議，確定軍隊整頓目標。

在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前，鄧小平藉由幾次與軍隊領導人會面的機會，宣揚「軍隊要整頓」的思想，統一軍隊內部不同意見。首先，在 1975 年 1 月 19 日各大軍區負責人座談會上，鄧小平根據毛澤東關於軍隊要整頓的指示提出：「軍委只準備兩個工作，第一是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其中一個大題目就是軍隊要整頓。第二是戰備，要準備打仗，解決戰備方針、裝備等問題」。1 月 25 日，鄧小平在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幹部會議上作了《軍隊要整頓》的講話，提出兩項最主要的任務：一是消腫、二是恢復優良傳統和作風，因此提高黨性、消除派性及加強紀律性成為軍隊整頓重點。⁶²

⁶⁰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 321-329。

⁶¹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頁 1067-1068。

⁶² 何立波，〈鄧小平與 1975 年軍隊整頓〉，《黨史博采》（石家庄），2004 年第 8 期，頁 11。

1975年6月24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召開，會議主要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軍隊員額及編制問題，提出要精簡整編；其次是解決部隊的派性問題，加強部隊的思想建設。⁶³在會議結束前一天，鄧小平發表《軍隊整頓的任務》的講話，提出軍隊的問題在「腫、散、驕、奢、惰」：

一是有點腫。這次會議研究精簡整編，就是解決腫的問題。不能說每一個師的部隊都是腫的，但整個軍隊確實有點腫。

二是有點散。主要表現在有派性和組織紀律性差這兩個方面。……這是軍隊在支左當中出現的新問題。軍隊支左，許多人也捲到派性裏面去了。一些人捲到這一派裏，另一些人捲到那一派裏。軍隊的權力大得很，變成了派的後臺，以後把派性帶回到軍隊，在軍隊內部不少單位也分成了兩派。現在，文化大革命已經九年了，軍隊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沒有擺脫派性，這一點影響了我們軍隊本身的團結。

三是有點驕。驕的問題我們軍隊歷來就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出現了新的情況。軍隊支左，權力大得很。大權在握，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在軍隊一部分人中，滋長了驕氣。……過去軍隊同志坐公共汽車，向來是給老人、帶娃娃的婦女讓座位的，現在有的不讓了。有個戰士坐車，一位婦女抱著娃娃，他不讓座，娃娃哭了他也不理。旁邊有位老人說，雷鋒叔叔不在了。

四是有點奢。上面講到有的人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他們有的鬧享受，鬧待遇，一切都向高級發展，住房子越多越好。有的甚至公私不分，沒有什麼界限了。

五是有點惰。惰性，不只是在一些人身上存在，甚至有些機關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高級幹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個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節。有的人小病大養，無病呻吟，官僚主義，工作不努力，不踏實，不深入基層，不親自動手，不動腦筋，靠秘書辦事，講五分鐘話都要人家寫成稿子照著念，有時還念錯了。這是思想懶惰。⁶⁴

1975年的軍委擴大會議最終通過了《關於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制體制和安排超編幹部的報告》，作為軍隊整頓的依據。共軍總政治部於8月7日發出《關於安排超編幹部的方案》，《方案》分析了幹部超編的情況，根據1974年底的統計，人民解放軍幹部共有152.6萬人，超編46.7萬人，在壓縮定額、調整編制體制後，還要多出10餘萬人，預計超編幹部可能達到60萬人。《方案》提出了安排超編幹部的意見，對各級各類幹部的安排原則、方法以及工作和生活待遇等問題作出規定。

9月7日，總參謀部發出《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制體制的方案》。這個《方案》規定全軍總人數精簡26.2%，其中陸軍步兵部隊精簡27.3%，工程兵與鐵道

⁶³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頁535。

⁶⁴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15-19。

兵精簡最多，佔陸軍兵種部隊總人數的 92.1%；海軍精簡 17%；空軍精簡 16.4%；各軍區及其直屬單位精簡 38%；總部及其直屬單位精簡 16.6%。然而這項計劃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之累而中途停止，使得精簡比例僅達 13.6%。⁶⁵

而軍委擴大會議後，也針對共軍高級領導進行調整，到 1975 年底，高級幹部的調配工作基本完成。經過這次調整配備領導班子，達到組織上精幹，幹部年齡相對年輕的目的。原來的班子一般在 20 人左右，多的達三四十人，調整後為十二三人。各大單位黨委常委原來大多在 15 人左右，調整後為 9 人左右。領導班子平均年齡由原來的 61 歲下降為 59 歲。

另外，全面加強軍事訓練也是會議結束後改革的重點。確定 1975 年訓練的重點是幹部訓練和諸兵種聯合演練；共軍三總部在 1975 年 10 月成立了以副總參謀長李達為召集人的總部訓練小組。到 1975 年 10 月底，共軍已集訓師以上幹部 2000 餘人，營、團幹部和參謀人員近萬人，野戰部隊基層幹部輪訓率達到 85%。1975 年全年，共軍各軍區和軍兵種共組織了 17 次軍事演習。⁶⁶

最後，國防科技單位的整頓也是軍隊整頓的重點所在。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國防工業受到很大衝擊，雖然 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共成功發射第一顆衛星—東方紅，但隨後幾年間的衛星發射都遭到失敗。因此鄧小平與葉劍英重新起用文革前即負責國防科研工作的張愛萍擔任國防科委主任，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張愛萍以派性問題最為嚴重的七機部 230 廠作為突破口，最後成功整肅該廠派系領袖舒龍山，恢復 230 廠正常運作。之後中共在 1975 年下半年連續成功發射三顆衛星，使中共成為繼美國與蘇聯後，第三個掌握衛星回收與航天遙感技術的國家，這三次成功的試射被稱為是「三星普照」。⁶⁷

軍委擴大會議後的軍隊整頓工作，對於糾正文革以後軍隊產生的各種弊病有相當重要的作用，然而更重要是，透過軍隊整頓，葉劍英及鄧小平牢牢掌握軍隊領導權，⁶⁸即便張春橋與毛遠新分別擔任總政治部主任及瀋陽軍區政委，但江青等人始終無法控制軍隊領導權，這也迫使王洪文等人到上海發展「第二武裝」的武裝民兵，以便在必要時刻進行武裝叛亂。⁶⁹而鄧小平所領導的整軍工作雖然因他第三次被鬥倒而告中止，然而這次的整頓為他第三次復出後領導的整軍工作立下基礎。

⁶⁵ 程中原、夏杏珍，〈鄧小平、葉劍英與 1975 年的軍隊整頓〉，頁 7-8。

⁶⁶ 何立波，〈鄧小平與 1975 年軍隊整頓〉，頁 13。

⁶⁷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頁 539。

⁶⁸ 如葉劍英在會議期間與各大軍區司令員「打招呼」，爭取支持，拔除四人幫在軍中的勢力，見《葉劍英傳》編寫組，《葉劍英傳》，頁 372-373。

⁶⁹ 毛澤東去世後，江青等人即想利用培植多年的上海民兵進行武裝鬥爭，然而華國鋒與葉劍英先將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召到北京，使上海民兵群龍無首；再派海軍政委蘇振華等人至上海控制局勢，同時調集正規軍至上海，江青等人試圖利用上海民兵進行叛亂的企圖終告失敗，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456-457。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晚年所發動的一場大規模政治運動，這場運動共軍無可避免被捲入，相較於前幾次的政治運動，軍隊在文革時期扮演的角色是更為重要的，軍隊甚至取代崩潰的黨、政機器成為維持地方事務正常運作的支柱。然而軍隊介入非軍事領域的後果是軍隊勢力急遽膨脹，讓國家運作出現不正常情況，因此在 913 事件後，在毛澤東的支持下，葉劍英及鄧小平先後發出「軍隊整頓」的呼聲，並且著手進行改革。

雖然葉劍英及鄧小平進行的改革略見成效，然而鄧小平因 1976 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所累而第三度被打倒，軍隊整頓工作被迫中斷，直到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逐步掌握大權，軍隊整頓的工作才又開展起來，先是因應武器裝備的變化而舉行華北大演習；其次是繼續 1975 年未完的整頓，提出百萬裁軍計劃，將 11 個大軍區縮減為 7 個，將原先擔負內部執勤、保衛各國使館、看押勞改犯的軍隊人員改編為武裝警察。這些動作代表中共逐漸轉變以往「人海戰術」的思維，體認到現代戰爭中「人」的因素不再是決定戰爭的唯一因素。





第六章 結論

本文旨在討論中共建國後的建軍路線問題，而中共建國後幾次的黨內鬥爭，是否對於中共的建軍路線造成影響；此外，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與革命化是否出現互斥的情況，也是本文討論的焦點之一。由於中共黨、軍菁英具備雙重角色特點，因此中共出現黨內鬥爭時，軍人基本上不可能置身事外；而黨內鬥爭伴隨而來的人事更迭與路線變化，都使得共軍的建軍方向受到程度不一的影響。

壹、建國後中共的建軍路線

中共自建國以後，在軍事建設上以現代化及正規化作為發展的主要方向，特別是共軍在經過韓戰的洗禮後，更加體認到軍事現代化與正規化的重要。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於 1952 年 7 月接替周恩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即開始一連串的軍事現代化、正規化進程。

在軍事現代化的部份，首先是改變純步兵戰鬥的型態，開始建設海、空軍及裝甲兵、炮兵、通信兵等現代戰爭出現的軍、兵種。尤其是中共參與韓戰後，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絕對空中優勢的打擊而造成相當大的傷亡，因此中共投入相當多人力、物力及資金在空軍建設上；海軍方面雖然經費遭到挪用，但這並非中共不重視海軍建設，只是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不能不有所取捨。

除了建立新的軍、兵種外，建立一套完整的現代國防工業體系也是軍事現代化重要一環。在老大哥蘇聯的幫助下，中共從蘇聯手中取得不少先進武器裝備甚至技術轉移，最後還與蘇聯簽訂包括火箭及核武器在內的先進武器的技術轉移協定（即《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這些協定對於中國國防工業的發展相當有成效。

在軍隊正規化方面，改造共軍存在已久的游擊習氣，是中共建國後亟欲解決的難題；同時，頒行統一的軍事條令、建立統一的制度，也很重要。然而一支現代化軍隊應該建立何種制度與頒行哪些條令規章，中共並不在行，只能求助於蘇聯。為了協助中國進行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蘇聯在中國派駐為數不少的顧問，據統計，當時在中國的蘇聯軍事專家與顧問總數大約有 1 萬人次之多。¹在這些顧問的協助下，中共軍事正規化有明顯的進展，除了建立義務役、軍銜、薪金與勳章制度，並以蘇聯現有條令為藍本制定自己的共同條令。

¹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 115。

以蘇為師的建軍路線是中共建國初期的基本策略，也是不得不然的策略，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共進行軍事現代化、正規化是相當順利的，然而學習蘇聯要到何種程度，共軍內部存在著爭議。這方面的爭議，原先僅止於學習蘇聯應秉持何種態度，最後卻演變成「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論爭。這股論爭隨著中共黨內開始反思蘇聯模式而逐漸擴大，最終使共軍內部出現「反教條主義」的路線鬥爭。這場發生在 1958 年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鬥爭，使得若干支持學習蘇軍模式的中共高階將領被冠上「教條主義」帽子而遭到批判、打擊，也使日後共軍軍官在面對軍事訓練的問題上漸漸採取保守的態度，對於軍隊的現代化、正規化無疑是很大的衝擊。而具有軍方背景的中共黨史學者叢進也認為，這場軍中「反教條主義」的鬥爭，「樹立了『兩條軍事路線鬥爭』的樣板。由此為開端，軍隊內部的所謂『路線鬥爭』接連不斷」。²

雖然共軍內部的「反教條主義」鬥爭對共軍的軍事現代化、正規化造成不小的挑戰，但是軍事現代化、正規化仍是共軍發展的方向，只是在中蘇關係破裂及「以我為主」觀念影響下，中共不論是在國防科技的發展及規章制度的編寫上，都需以「自力更生」的精神來突破限制，而共軍最終突破了重重難關，不僅編寫出自己的戰鬥條令，也成功試射「兩彈」，這些成就表明軍事現代化、正規化一直是共軍的建軍路線，並沒有因為黨內或軍內鬥爭而稍有止歇。

共軍的軍事建設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嚴重的挑戰，共軍直接捲入這場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在造反奪權的口號下，向來紀律嚴明、講求階級的軍隊亦無法倖免，多位高階將領被鬥倒鬥臭，逐出領導人行列；而各地的造反奪權，也讓地方黨、政機器徹底失靈，形成「天下大亂」的局面，這時毛澤東只能依賴軍隊來穩定地方秩序。軍隊介入後，中國各地造反派的武鬥逐漸被控制；但這也使得軍隊大舉介入地方事務，不僅勢力膨脹，更因為「三支兩軍」而怠於日常訓練工作，導致戰力下滑，這些情況讓中共處於新的危機之中。

這股危機隨著林彪「陰謀政變」失敗而出現轉機，在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即針對共軍內部各種亂象進行整頓，首先在 1972 年 8 月 21 日由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發出《關於三支兩軍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將參與「三支兩軍」的軍人陸續撤回部隊，結束 5 年的「三支兩軍」；其次則有計劃的恢復各級軍事院校，避免軍隊人才出現斷層；再次則加強軍隊訓練工作，將軍隊訓練的質與量恢復到文革前的水準。

隨後，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的鄧小平重新被毛澤東解放出來，除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以協助周恩來主持國務院事務外，同時也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來整頓軍隊。鄧小平與葉劍英的整軍內容有共通之處，即加強共軍軍事訓練的深度；此外，鄧小平整軍的另一個重點在解決軍隊過於膨脹的問題，內容包括精簡軍隊員額、壓縮軍隊各單位領導員額。雖然這股整軍略具成效，

²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 217。

但隨著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而告終。共軍進行新一輪的整頓一直到鄧小平重新掌權後，才又開始進行。

貳、軍事路線的變化與黨內鬥爭的關連

經過三灣改編及古田會議的召開，中共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透過「將黨支部建立在連隊上」及軍隊設立黨代表（政治委員）的辦法，牢牢控制著軍隊。這些作法使得軍隊的官兵大量加入中國共產黨，讓黨軍一體更為明顯。³因此，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與人民解放軍的高層領導幾乎是重疊的，呈現黨軍菁英一體，⁴因此中共的黨內鬥爭，軍隊高層將領很難置身事外。

中共建國後第一起黨內鬥爭是高崗事件。由於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在黨、政運作上的分歧，使毛澤東一度有以高崗取代劉少奇的打算，然而高崗活動過於頻繁的結果，使毛澤東的「以高代劉」計劃過早曝光而胎死腹中，最終也讓高崗身敗名裂而自殺。這起事件引發毛澤東注意的是高崗拉攏共軍高層將領，這與 1960 年代劉少奇與賀龍、羅瑞卿關係過於密切引發毛澤東的緊張是一樣道理。在高崗事件中，林彪本來已決定支持高崗，林彪的表態將可能使共軍陷於分裂，然而毛澤東最終決定保護林彪，派陳雲至杭州向林彪「交底」，這作法使共軍高層將領基本上未陷入高崗事件的政治風暴中；然而為了處理高崗事件所帶來的政治效應，使得原定 1954 年推動的三大制度被迫順延到 1955 年。

除了三大制度的推動被迫延後外，高崗事件也牽扯到共軍高層將領，本文第三章提到彭德懷及林彪同高崗的關係相當密切，因此高崗密謀鬥劉少奇與周恩來時，曾企圖拉攏彭、林兩人，為避免效應擴大，毛澤東急派鄧小平與陳雲分別做彭、林兩人的「工作」，這樣就避免共軍高層將領陷入「高饒反黨集團」的泥淖之中。然而高崗是陝北紅軍的代表，建國後曾任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與軍隊的牽連頗深，這使得共軍將領無可避免的受到影響。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軍銜授予上。

本文在第三章討論共軍進行軍事正規化的措施中，曾針對軍銜頒授做一詳實介紹，當時參與軍銜評定工作的宋任窮在所撰寫的回憶錄提到評定軍銜過程中所需注意到的各方面問題，⁵其中強調軍銜評定需要注意到「各個方面軍幹部的相

³ 毛澤東在軍隊內部發展黨員，加上面臨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使得黨和軍隊更加緊密結合在一起，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 5-7。

⁴ 以 1955 年中共首次授銜為例，原屬國民黨將領，後因起義投誠而轉任共軍將級以上的軍官僅 7 人，這 7 人分別為：陳明仁、陶峙岳、董其武，此 3 人授上將銜；曾澤生，此人授中將銜；鄧兆祥、張全珍、魏鎮，此 3 人授少將銜。除去此 7 人，共軍在 1955 年首次授銜少將級以上將領均為共產黨籍。

⁵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頁 322-323。

對平衡」。這也讓一些相關書籍在討論上將軍銜的評定問題上，都會提到陝北紅軍的問題，如徐平在《新中國首次軍銜制實錄》中提到，因為陝北紅軍領導人劉志丹、謝子長先後逝世，為了保留一席「上將」職位給予陝北紅軍的領導人，不得已情況下將已轉職到地方工作，並未參與 1952 年軍隊評級的原紅三十軍軍長閻紅彥重新安插到軍隊系統上，任成都軍區第一副政委，並在 1955 年的首次授銜上被授予「上將」。⁶

然而大多數中共現有文獻並未提到，除了閻紅彥之外，當時共軍現役高階將領中，還有一位名為賀晉年的軍隊幹部出身陝北紅軍體系，且在 1952 年的軍隊評級中被評為「副兵團」級，擔任過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副司令員。中共 1955 年評定軍銜的標準，主要是以 1952 年的軍隊評級結果做為授銜依據，1955 年 1 月中共中央軍委公布《關於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內容提到「副兵團、准兵團級，多數可評為中將」；⁷另外從資料上看，1952 年被評為「副兵團級」的共軍幹部中，之後被授予「上將」軍銜的有李克農等 19 人、被授予「中將」軍銜的有蕭向榮等 22 人，但有一個人非常特殊，僅被授予「少將」軍銜，此人便是賀晉年。

以賀晉年在共軍的資歷，1936 年即出任陝北紅軍系統的紅二十七軍軍長、解放戰爭時期擔任東北野戰軍第 11 縱隊（後改為第四野戰軍第 48 軍）司令員、四野 15 兵團副司令員，中共建國初期任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這些顯赫資歷讓賀晉年在 1952 年的評級中被評為「副兵團級」，該級別的將領，不是「上將」就是「中將」，以賀晉年的資歷加上派系山頭的考量，授「上將」軍銜是實至名歸的，然而為何最終僅被授予「少將」軍銜並特地將已不在軍隊任職的閻紅彥作為陝北紅軍的「上將」代表，這與賀晉年涉入 1954 年高崗事件有極大關係。1954 年高崗事件後，賀晉年被認為是「高崗線上的人」，被免去東北軍區副司令員，送入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因為高崗事件的問題，1955 年授銜時賀晉年最先是被評為「大校」，之後在經賀龍等人的說情下，毛澤東才說：「賀晉年怎麼能是大校呢？最起碼他也是個少將吧」，這才讓賀晉年進入「將軍」行列中，然而中共在 1955 年評定軍銜後，就再也未進行「中將」以上的人事晉升；1965 年中共便廢除軍銜制，即便後來查清賀晉年並非與高崗有直接的連繫，賀晉年始終是「少將」軍銜。⁸從賀晉年的例子可以看出，軍事正規化重要的四大制度不僅受「高崗事件」影響而延後推行，即便制度推行後仍因為黨內鬥爭等考量，未給予每個人應得的公平待遇。

廬山會議對中共政治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不僅使原定對「大躍進」運動的「糾左」轉變成「反右傾」，造成 1959-1961 年中國出現三年大饑荒；此外由於彭德

⁶ 徐平，《新中國首次軍銜制實錄》（北京：金城出版社，2007，第二版），頁 44-45。

⁷ 轉引自徐平，《新中國首次軍銜制實錄》，頁 38。

⁸ 〈關於開國少將賀晉年的軍銜問題〉，《新浪博客》，2010 年 12 月 22 日，取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608ac010007c0.html。

懷當時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處於敏感的位置，因此在廬山會議結束後，緊接著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重點即在糾出共軍內部的「彭德懷軍事俱樂部」成員，會議最終由林彪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林彪上任後雖對於共軍進行現代化、正規化仍表達支持，但相較於彭德懷，林彪更強調政治工作對軍隊的作用，並大力推廣學習毛澤東思想。這個轉變對於共軍的建軍路線影響深遠，藉由政治工作的加強，對於穩定「大躍進」運動失敗而造成軍隊內部思想混亂起了相當重要的功用，然而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及「政治掛帥」的結果，強化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成為日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基礎；而雖然林彪在談話中始終認為軍事訓練應當保持一定比例，但強調政治工作的功用、加上 1958 年共軍內部進行「反教條主義」運動，無形中都讓共軍內部對日常軍事訓練的進行感到遲疑，對共軍的軍事正規化是有一定傷害的。

文化大革命對共軍的影響更是巨大，在「造反有理」的思維下，軍隊各機關單位都出現造反派，許多高階將領被糾鬥，軍隊進行文革的結果是國防科技研發的延宕，以及軍隊日常訓練停滯、甚至倒退；而毛澤東下令軍隊進行「三支兩軍」的結果，使軍隊更不能專注於軍事事務上。而軍人大舉介入非軍事事務的結果，導致中共九大所選出的 279 名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中，現役軍人佔 123 人，在政治局 21 位委員中，軍隊勢力有 11 人，⁹這種不正常情況成為日後中共進行軍隊整頓的重點。

913 事件後，在毛澤東的授意下，葉劍英與鄧小平先後就軍隊的種種亂象進行整頓，內容主要在加強軍隊訓練以及精簡軍隊員額，試圖將軍事建設導向正常的發展方向，在將近 4 年的努力下，軍隊整頓略具成效，然而隨著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及毛澤東過世後中共內部出現權力繼承鬥爭，軍隊整頓工作暫時停止。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擊敗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後，才又開始新一輪的軍隊整頓。鄧小平主政後改變毛澤東「人民戰爭」的傳統思維，進行人員整頓、大量裁軍，「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成為 1980 年代共軍的建軍方向。

中共黨內鬥爭之所以對軍事路線產生影響，最大主因在於黨內鬥爭造成人事上的更迭，不同的軍隊領導人對於軍隊的建設方向有不同的解讀，從而造成軍事建設的方向出現變化。

⁹ 李厚生，〈「文革」時期共軍在地方的政治角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56。另外邁斯納在其書提到，軍隊幹部佔中委及候補委員的比例為 49%，見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 322。此 11 人為：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朱德、許世友、陳錫聯、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黃永勝、謝富治。

參、 共軍建軍路線中的現代化、正規化與革命化之

關係

中共現有文獻在討論共軍的軍事建設上，大多將彭德懷與林彪形容為兩個強烈對比，以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時強調共軍要加強現代化、正規化的廣度與深度，對比林彪主張「人」的因素第一、只重視軍隊政治工作。

然而要澄清的是，彭德懷在推動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過程中，仍強調軍隊革命化傳統，在共軍是否學習蘇聯「一長制」爭論上，彭德懷雖一度有所動搖，但最終仍堅持共軍的領導應以「黨委集體領導下首長分工負責制」為主；對於軍隊政治工作，彭德懷也表示肯定，並同毛澤東的看法相同，即認為「政治工作已經成為我軍的生命線」。¹⁰因此在對軍隊政治工作上，彭德懷與林彪的看法應是一致的，都認為在軍隊內部推展政治工作有助於軍隊的團結一致，也有助於提升部隊士氣，進而提高部隊戰鬥力。

林彪與彭德懷在推動軍隊政治工作方面，最大的差異在於林彪特別強調毛澤東思想的作用，為方便學習與推廣，林彪將毛澤東思想庸俗化，這對日後中共政治造成深遠影響，因此中共在審視林彪的罪狀時，便特別強調林彪鼓吹政治工作所帶來的負面效果；而當強調軍隊政治工作有負面的效果時，為避免造成混淆，彭德懷對於軍隊政治工作的看法便很少被提及了。

雖然林彪在 1963 年 9 月後因為身體因素而暫時休養，由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然而對於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部份，林彪是支持的，中共在 1960 年代導彈與原子彈試射（爆）的成功，以及撰寫出自己的戰鬥條令，林彪基本上扮演一定的角色。然而後來中共官方史書在書寫這段歷史時，則強調聶榮臻、葉劍英等人的功勞，甚少提到林彪的作為。

這些方式都使得外人在討論中共建國後的建軍路線時，容易將現代化、正規化與革命化分割開來，從而造成一個錯誤的印象，即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時，致力於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然而廬山會議上林彪展現其政治野心批鬥彭德懷，在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後，開始主張「政治掛帥」、強調軍隊政治工作，為日後陰謀發動政變立下基礎。在沒有詳實的資料佐證下，這樣的觀念便容易被接受，而使真相被埋沒在浩瀚的書卷之中。

但有一點要注意的是，共軍的軍事路線雖然是以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與革命化作為路線主軸，但這並不代表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與革命化三者間是彼此相容

¹⁰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彭德懷軍事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 562。

而不相互排斥的。彭德懷與林彪在主持軍委工作期間，對於革命化的「紅」與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專」兩者間比重有所不同，彭德懷相較於林彪而言，主張提高軍事訓練的比重，而林彪則認為，政治教育等「紅」的作法應當佔整體軍隊工作的三成、甚至是四成。因此在討論共軍的軍事路線時，爭論的焦點不是在於執行的路線究竟是「紅」的路線或「專」的路線上，而是在「紅」與「專」兩者比重上，孰輕孰重的問題，「紅」與「專」之間的比重沒有一個明確標準，所產生的結果是：共軍高階將領不堅持或忽視「紅」的建軍路線者，往往被鬥倒，淪為黨內鬥爭的犧牲品。

肆、軍事路線與路線鬥爭的關連

中共建國後軍事路線的開展，主要是以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輔以革命化的方式進行，這條軍事路線，是吸取蘇軍經驗，再配合共軍自建軍以來的傳統加以融合而成，無論是彭德懷或林彪，在領導中央軍委日常工作期間，有關軍事建設上都沿著這條路線來進行。

但中共歷次黨內鬥爭，涉及到軍事部份，都會提到共軍在軍事建設上面臨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如 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的會後決議上，不僅將向蘇軍學習與「教條主義」連繫起來，同時把它形容為「與黨的軍事路線相對抗的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這個作法將中共建國以來的軍事建設幻化成「無產階級軍事路線與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鬥爭」，並稱「這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貫穿著我軍 30 多年的歷史」。而中共軍隊內部存在著兩條路線鬥爭的說法，並未隨著蕭克等人遭受打擊而結束，彭德懷、羅瑞卿以及林彪遭到整肅、批鬥時，也都被指為在軍隊內部推展「資產階級軍事路線」。

但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與「無產階級軍事路線」兩者間如何區分，中共似乎沒有一定的標準，「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儼然成為對黨內鬥爭失敗者所安置的罪名，因為在中共「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下，從資產階級意識型態發展的事物都被看成是敵對的概念，也是中共階級敵人具有的想法，這些資產階級敵人所推動的軍事路線，就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也成為被指為是資產階級的共軍將領所擁有的罪名。由此可看出，「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與「無產階級軍事路線」兩者間不存在著實質的概念，完全依據黨內鬥爭的情勢發展而調整。

本文根據中共官方史料與學者研究資料進行整理後發現，中共建國後到毛澤東過世期間，對於共軍內部是否存在著「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與「無產階級軍事路線」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基本上是可以否定的。彭德懷、林彪等一眾中共高階將領，在共軍內部任職時，對於共軍進行軍事現代化、正規化是抱持肯定的看法，但同時也重視共軍的「傳統」，即軍隊的政治工作、並堅持共軍傳統的黨委制、政治委員制等制度，或許在軍事訓練與政治工作的比例上，不同負責人有不

同的作法，然而在軍隊領導態度上卻是一致的，即強調黨指揮槍、黨委領導。因此筆者認同齊茂吉所指出的，共軍的軍事路線不存在路線鬥爭的說法，共軍的軍事建設仍沿著軍事現代化、正規化、革命化的發展步調。

所以中共的軍事路線與路線鬥爭問題相牽扯，與中共黨內高層之間的權力鬥爭是有相當的密切關係，但即便是黨內權力鬥爭後造成人事更迭的情況出現，共軍的軍事建設路線並未因此受到影響，現代化、正規化、革命化仍是共軍的軍事路線主軸。

伍、毛澤東對中共軍事路線的影響

通過延安整風所形塑的「一貫正確」形象，加上中共在絕對劣勢的情況下贏得內戰的勝利，這使得毛澤東在共軍行伍中有著崇高的聲望，對於內部山頭林立的共軍而言，毛澤東是唯一能夠有效統領者，因此一直到毛澤東去世前，一直擔任共軍最高領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因此毛澤東對於共軍軍事路線的影響無疑是相當巨大的。

共軍在推行三大制度的過程中，毛澤東對於兵役採義務役制，施行幹部薪金制與推動軍銜制是有相當意見的，即便共軍在 1955 年時正式施行三大制度，毛澤東始終對於三大制度提出質疑。在毛澤東的運作下，共軍軍銜制甚至在 1965 年時被取消，直到 1988 年時才在鄧小平的支持下重新推行軍銜制。

而共軍對於學習蘇聯過程中產生的教條主義進行批判，最後提出「以我為主」的建軍路線，在這過程中毛澤東亦扮演重要角色。最明顯的例子是共軍編寫軍事條令，在毛澤東的要求下，共軍的戰鬥條令的編寫，擺脫了照搬蘇軍經驗、作法的情況，大幅添入共軍原有的經驗與「毛澤東軍事思想」。這些「以我為主」的作法，若無毛澤東在背後大力支持，恐將以發共軍另一輪的爭論。而在武器研發的部份，因大躍進失敗而造成中共經濟發展陷入停滯，造成中共內部對於是否繼續核武器研製工作展開爭論，雖然經濟困頓，但毛澤東基於各種考量，仍然堅持核武器研製工作不能中斷；在毛澤東明確表態之下，中共核武器的研製才未受到外在因素影響而中斷，繼而在 1964 年 10 月成功試爆核子彈。

從上面的幾個例子可看出，毛澤東對於中共軍事路線的發展是有相當深遠的影響，在討論共軍的軍事路線時，對於毛澤東當時的意向仍需兼顧。

由於本文主要討論的重點在中共軍事建設部份，即便撰寫的時間已是五、六十年的歷史往事，當涉及敏感部份，許多作者仍隱晦不言或直接略過，而官方文獻則未解密類似文件，這種資料上的限制造成的是研究上的困難，也容易造成研

究上的盲點。另外就是中國大陸出版的作品中，「為尊者諱」及「妖魔化」的情況是相當普遍的，這都需要逐步的抽絲剝繭，才能找出被隱藏的事實真相；即使是能公開的事項，個別學者的著作與官方出版物仍可能出現些微差異，這都是在找資料及寫作過程中須特別注意的事。





參考書目

壹、中文

一、文件、文集

1. 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12. 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附卷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1949.10-1997.0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13.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選》，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1。
14.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版。
15.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版。
16.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版。

17.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 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 版。
18.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 5，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9. 江山主編，《共和國檔案：影響新中國歷史進程的 100 篇文章》，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
20.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1.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彭德懷軍事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22. 劉伯承，《劉伯承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23.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二、年譜、傳記、回憶錄

1. 《徐向前傳》編寫組，《徐向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第 2 版。
2. 《葉劍英傳》編寫組，《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第 2 版。
3. 《粟裕傳》編寫組，《粟裕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
4. 《賀龍傳》編寫組，《賀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第 2 版。
5. 《羅瑞卿傳》編寫組，《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第 2 版。
6. 《羅榮桓傳》編寫組，《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第 2 版。
7. 丁盛口述、金光談話紀錄、余汝信整理編註，《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香港：星克爾出版，2008。
8.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一代名將—回憶粟裕同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上、下冊，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03。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11.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粟裕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12.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13.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14. 王沂力，《獨臂上將彭紹輝》，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
15.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16. 王新亭，《王新亭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8，第 2 版。
17. 王箴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8. 向守志，《向守志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
19.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9，第4版。
20. 吳殿堯主編，《朱德年譜》（新編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21.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
22. 宋德金，《真實的林彪—林彪秘書最後的回憶錄》，香港：皇福圖書，2010，第4版。
23. 李烈主編，《賀龍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4. 李逸民，《李逸民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5. 李德、舒雲編著，《林彪日記》，下冊，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
26.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27. 李銳，《廬山會議會議》，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09，最新增訂版。
28.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9. 洪學智，《洪學智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第2版。
30. 徐向前，《徐向前元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
31. 張宗遜，《張宗遜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
32. 張勝，《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
33. 張震，《張震回憶錄》，上、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
34. 陳錫聯，《陳錫聯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第2版。
35.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36.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7. 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8. 萬毅，《萬毅將軍回憶錄》，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8。
39. 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
40.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第2版。
41.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2. 鄭文翰著，王焰、王亞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43. 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
44.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4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8。
46. 鍾期光，《鍾期光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
47. 聶榮臻，《聶榮臻元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
48. 羅東進，《我的父親羅榮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

三、專書

1.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第2版。

2. 中共研究雜誌社、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中共建政暨兩岸分治 60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法務部調查局，2009。
3.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簡史》，上、下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4. 中國共產黨兩條路線鬥爭史講義編寫組編，《中國共產黨兩條路線鬥爭史講義（修改稿）》，廣州：廣東省高等院校政治理論課，1975。
5.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臺北：時報文化，2001。
7.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8. 何思因、吳玉山主編，《邁入廿一世紀的政治學》，臺北：中國政治學會，2000。
9. 吳遠平等著，《新中國國防科技體系的形成與發展研究》，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6。
10. 宋永毅、丁抒編，《大躍進—大饑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與思辨》，九龍：田園書屋，2009。
11. 李谷城，《中國大陸政治術語》，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
12. 李英明，《中國大陸學》，台北：揚智文化，1995。
13.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14. 周陽山等著，《巨變下的中蘇共》，臺北：新中國，1991。
15. 林弘展，《中國人民解放軍 X 檔案》，臺北：本土文化出版，1996。
16. 林長盛主編，《解放軍的現狀與未來》，臺北：桂冠圖書，1993。
17. 林蘊暉等著，《凱歌行進的時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19. 姜華宣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20. 洪陸訓，《武裝力量與社會》，臺北：麥田，1999。
21.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圖書，2002。
22.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圖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3.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史要》，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
24.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
25. 徐平，《新中國首次軍銜制實錄》，北京：金城出版社，2007，2 版。
26. 徐焰，《六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27. 袁偉等編著，《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
28. 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台北：天下文化，1998。
29.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
30.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31.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臺北：五南，2005。
32. 張嘉中，《權力鬥爭與軍人的政治角色：1949-1973 年的中國》，臺北：揚智文化，2008。
33.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34. 陳大蒙、劉史，《落井下石—重審高崗案》，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第 2 版。
35.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下冊，臺北：聯經，2001。
36. 舒雲，《林彪畫傳》，紐約：明鏡出版社，2007。
37. 楊貴華編著，《共和國軍隊回眸：重大事件決策和經過寫實》，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
38.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上、下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
39. 廖國良等著，《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
40.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故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
41. 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臺北：新新聞文化，1997。
42. 滕敘究，《陳賡大將與哈軍工》，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
43. 鄭義，《中共軍頭點將錄：與國軍對峙的 42 名悍將》，臺北：開今文化出版，1996。
44. 鄧禮峰，《建國後軍事行動全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45.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6.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著，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臺北：左岸文化，2009。
47. 蘇士甲，《中國人民解放軍院校發展史》，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1。

四、期刊及研討會論文

1. 《紅旗》半月刊，第 14 期（1966 年 11 月）。
2. 丁樹範，〈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的中國黨軍關係〉，《中國大陸研究》（臺北），2003 年第 46 卷第 2 期，頁 57-80

3. 尹家民，〈廬山會議後蒙冤的開國四將〉，《報刊薈萃》（西安），2007年第12期，頁56-58。
4. 白洁，〈從國防部五院到七機部—王秉璋將軍談中國航天事業〉，《黨史博覽》（鄭州），2005年第3期，頁14-19。
5. 吉元，〈《毛主席語錄》出版內幕〉，《炎黃春秋》（北京），2009年第10期，頁46-49。
6. 朱啟友，〈毛澤東與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黨史研究與教學》（北京），2007年第194期，頁23-36。
7. 何立波，〈鄧小平與1975年軍隊整頓〉，《黨史博采》（石家莊），2004年第8期，頁10-14。
8. 佚名，〈粟裕與陳毅、聶榮臻、彭德懷的分歧與誤會始末〉，《報刊薈萃》（西安），2009年第5期，頁20。
9. 李意根，〈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上將們〉，《文史精華》（石家莊），2009年總第231期，頁18-24。
10. 李意根，〈大將許光達的「文革」歲月〉，《黨史文苑》（南昌），2008年第5期，頁36-40。
11. 沈志華，〈援助與限制：蘇聯與中國的核武器研製（1949—1960）〉，《歷史研究》（北京），2007年第3期，頁110-131。
12. 沈志華，〈蘇聯歸還旅順海軍基地內幕〉，《文史博覽》（長沙），2006年第9期，頁47-49。
13. 孟東，〈軍委訓練總監部的建立與撤銷〉，《黨史博覽》（鄭州），2002年第10期，頁49-52。
14. 林蘊暉，〈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紀實〉，《黨史博覽》（鄭州），2005年第3期，頁4-9。
15. 洪陸訓，〈中共文武關係研究途徑之探討〉，《東亞季刊》（臺北），1995年第26卷第4期，頁82-109。
16. 洪陸訓，〈共黨國家文武（黨軍）關係的理論與研究途徑〉，《共黨問題研究》（臺北），1994年第20卷第8期，頁28-41。
17. 孫國，〈空軍傳奇司令員—馬寧訪談錄〉，《黨史博覽》（鄭州），2007年第3期，頁43-46。
18. 高民政，〈軍政現象與軍政關係探微—兼論軍事政治學的研究物件與核心問題〉，《軍事歷史研究》（上海），2009年第1期，頁152-157。
19. 高民政、趙景剛，〈政治學與軍隊政治工作學—兼論構建中國軍事政治學之可能〉，《軍事歷史研究》（上海），2006年第2期，頁113-121。
20. 高連升，〈淺析1958年解放軍反「教條主義」的鬥爭〉，《軍事歷史》（北京），1994年第1期，頁7-10。
21. 張蜀誠，〈中共海軍研究觀點探討〉，《展望與探索》（臺北），2010年第8卷第2期，頁60-82。

22. 梁丞，〈粟裕大將的蒙冤與平反〉，《領導科學》（鄭州），2002 年第 2 期，頁 42-43。
23. 陳先瑞，〈廖漢生、楊勇被抓與所謂「華北山頭主義」問題〉，《百年潮》（北京），2000 年第 4 期，頁 19-24。
24. 郭洪祥，〈許光達大將關於裝甲兵部隊建設的理論與實踐〉，《軍事歷史》（北京），2009 年第 4 期，頁 66-68。
25. 陳虹，〈總參「八二五」事件真相〉，《黨史博覽》（鄭州），1999 年第 9 期，頁 20-22。
26. 郭華倫，〈論中共之派系〉，《匪情月報》（臺北），1979 年第 22 卷第 2 期，頁 9-10。
27. 斯夫、鹿海燕，〈林彪在譚政冤案的台前幕後〉，《黨史縱覽》（合肥），2003 年第 5 期，頁 20-24。
28. 程中原、夏杏珍，〈鄧小平、葉劍英與 1975 年的軍隊整頓〉，《縱橫》（北京），2003 年第 8 期，頁 4-10。
29. 舒雲，〈劉伯承和南京軍事學院〉，《黨史博覽》（北京），2001 年第 6 期，頁 12-19。
30. 葉青松，〈「導彈元勳」王秉璋首任人民解放軍第十七軍軍長〉，《黨史博覽》（鄭州），2009 年第 7 期，頁 34-38。
31. 董保存，〈關於 1958 年反教條主義對蕭克將軍的訪談〉，《黨史博覽》（鄭州），2001 年第 2 期，頁 9-15。
32. 董晶，〈建國初期的大行政區制度始末〉，《中共鄭州市委黨校學報》（鄭州），2007 年第 1 期，頁 51-52。
33. 趙陽輝，〈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籌建與蘇聯援助〉，《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哈爾濱），2006 年第 8 卷第 5 期，頁 1-6。
34. 齊德學，〈彭德懷與 1958 年反教條主義鬥爭〉，《軍事歷史》（北京），1998 年第 5 期，頁 45-46。
35. 劉志青，〈「九一三」事件後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的恢復〉，《黨史研究與教學》（福州），2005 年第 1 期，頁 25-35。
36. 劉志青，〈20 世紀 50 年代人民解放軍學習蘇軍的爭論與結局〉，《黨史博覽》（鄭州），2005 年第 1 期，頁 4-10。
37. 劉炳峰，〈中國人民解放軍「三支兩軍」的前前后后〉，《黨史縱覽》（合肥），2006 年第 1 期，頁 4-8。
38. 劉統，〈彭德懷與 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黨史天地》（北京），2001 年第 2 期，頁 10-14。
39. 慕安，〈空軍司令員張廷發的「非常歲月」〉，《黨史博覽》（鄭州），2006 年第 10 期，頁 11-15。
40. 鄭曉時，〈政體與軍隊：台灣文武關係（1950-1987）的一個分析架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臺北），1992 年第 5 卷第 1 期，頁 129-172。

41. 鄧禮峰，〈「三支兩軍」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北京），2001年第6期，頁39-52。
42. 曉農、疆文，〈彭德懷劉伯承的誤會與糾葛〉，《黨史文苑》（南昌），2005年第1期，頁26-32。
43. 閻明復、朱瑞真，〈我瞭解的赫魯雪夫權力鬥爭〉，《炎黃春秋》（北京），2005年第7期，頁19-24。
44. 鍾延麟，〈1958年鄧小平在解放軍「反教條主義」運動中之角色與活動〉，《中國大陸研究》（臺北），2006年第49卷第4期，頁77-103。
45. 鍾延麟，〈大躍進運動中的軍方活動〉，《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2003年總第106期，頁57-68。
46. 關向光、王瑞婷著，〈大躍進政策研究中的毛澤東權力圖像〉，發表於第四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2008年12月25-26日。

五、學位論文

1. 王志嵩，〈中共中央軍委會變遷之研究（1949-1976）〉，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2006。
2. 李厚生，〈「文革」時期共軍在地方的政治角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3. 俞雨霖，〈中共軍人的政治角色：比較與歷史的觀點〉，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
4. 施哲雄，〈江西蘇維埃時期中共黨軍關係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
5. 黃忠信，〈林彪的歷史形象—戰神、叛徒、騎虎者〉，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6. 齊茂吉，〈五〇年代至八〇年代由中共內部派系鬥爭探討其軍事路線之影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85。
7. 譚瑞茂，〈我國的文武關係與政戰制度〉，臺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8. 關向光，〈論中共大躍進時期的「毛澤東路線」〉，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

六、網路資料

1. 〈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新華網》，2010年6月19日，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994.htm。

2.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2003）〉，《政工網》，2010年7月17日，取自：<http://www.allzg.com/n1541c136.aspx>。
3. 林蘊暉，〈朱可夫事件與彭德懷廬山罷官〉，《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2010年7月25日，取自：<http://coldwarchina.org/zgyj/dyjjrmgs/000957.html>。
4. 蔡和順，〈象徵性軍事領導機構—國防部〉，《幼獅文化》，2010年9月24日，取自：<http://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1001/m980218-r.htm>。
5. 羅榮桓，〈繼續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人民網》，2010年10月2日，取自：<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99988/100014/9080074.html>。
6. 葉劍英，〈軍事科學院籌建經過及工作方針〉，《人民網》，2010年10月2日，取自：<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118416/118419/6995091.html>。
7. 葉劍英，〈編寫合成軍隊戰鬥條令的意義〉，《人民網》，2010年10月2日，取自：<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118416/118419/6994958.html>。
8. 葉劍英，〈深入開展全軍軍事科學研究工作〉，《人民網》，2010年10月2日，取自：<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118416/118419/6994937.html>。
9. 葉劍英，〈關於軍事訓練問題向軍委的報告〉，《人民網》，2010年10月2日，取自：<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118416/118419/6994199.html>。
10. 吳東峰，〈邱會作：老師大鬧懷仁堂的重要導火索〉，《歷史千年》，2010年10月6日，取自：<http://www.lsqn.cn/ChinaHistory/other/201002/206369.html>。
11. 〈軍隊新任務〉，《中國網》，2010年10月21日，取自：http://www.china.com.cn/book/txt/2009-07/27/content_18213316.htm。
12. 〈文革中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主任〉，《新浪博客》，2010年10月22日，取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1104ee0100avw1.html。
13.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網》，2011年1月17日，取自：<http://cpc.people.com.cn/GB/4519184.html>。
14. 〈關於開國少將賀晉年的軍銜問題〉，《新浪博客》，2010年12月22日，取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608ac010007c0.html。

貳、英文

一、專書

1. Bernstein, Thomas P. & Hua-yu Li, eds.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0.
2. Cheek, Timothy &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3. Herspring, Dale R. & Volgyes Ivan, ed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System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8.
 4.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5. Jencks, Harlan W.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1945-1981*.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2.
 6. Joffe, Ellis. *Party and Army: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Chinese Officer Corps, 1949-196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7. Joffe, Ellis.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8. Kolkwicz, Roman. *The Soviet Military and Communist Par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9. Mulvenon, James C. & Andrew Yang N.D., ed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 Retrospective on Chinese Military Studies in the Post-Mao Era*.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1.
 10. Mulvenon, James C.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Senior Chinese Officer Corps: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97.
 11. Nelsen, Harvey W. *The Chinese Military System: An Organizational Stud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2nd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12. Schurmann, Franz.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13. Swaine, Michael D. *The Military &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China: Leadership, Institutions, Belief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92.
 14. Teiwes, Frederick C. &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N.Y.: M.E. Sharpe, 1999.
 15. Whitson, William W.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71*. New York: Praeger, 1973.
 16. Zhu, Fang. *Gun Barrel Politics: Party-Army Relations in Mao's Chin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

二、期刊

1. Cheng, Li & Lynn White. "The Army in the Succession to Deng Xiaoping: Familiar Fealties and Technocratic Trends," *Asian Survey*, Vol. 33, No. 8, Aug. 1993, pp. 757-786.

2. Jencks, Harlan W.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 in China: Tiananmen and After,"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y/June 1991, pp. 14-29.
3. Odam, William. "A Dissenting View on the Group Approach to Sovie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4, July 1976, pp. 542-567.
4. Parish Jr., William L. "Factions in Chinese Military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56, October 1973, pp. 667-699.
5. Perlmutter, Amos & William M. LeoGrande. "The Party in Uniform: Toward a Theor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6, No. 4, December 1982, pp. 778-789.
6. Shambaugh, David.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in China: 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7, Special Issue: The Individual and State in China, September 1991, pp. 527-568.

